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艾伦·格林斯潘

 **eBOOK**
网络资源 中文版

一生走运 心想事成

尽管格林斯潘年幼时家境并不算富裕，求学时也不得不中辍，但是从他这里似乎看不到什么逆境之中的苦苦挣扎，对抗命运的坚忍奋斗，更看不到接连遭受厄运打击的彷徨、沮丧；你倒是会对格林斯潘绝顶的聪明、过人的眼光，他无论在事业上做什么就能成什么印象更为深刻。

幸运之神好像永远与他相伴永远眷顾着他，使他永远处于顺境之中：需要导师时，导师出现在他面前；需要合伙人时，合伙人出现在他身边；需要舞台时，舞台就出现在他脚下——虽然他的第一次婚姻很快失败，四十多年所期盼的命中注定的伴侣姗姗来迟，毕竟在他的晚年翩翩来临，把他重新带到青春岁月。

或许正因为如此，格林斯潘的心境一直比较平和，坚定，从容，不时冒出一点幽默的火花——如果说，这种心理类型对于从事艺术并不适宜，那么对于从事金融和政策，倒最为合适。格林斯潘早早就放弃音乐而转向金融，实在是明智之举。

编者导读

谁是美国最有权势的人？总统吗？国会议长吗？许多美国人却说，美国最有权势的人，其实是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席。

联邦储备体系这个名称有点奇特的机构，其实就是美国的中央银行。在美国这个“大银行、小财政”的国度，联储会主席虽说是被总统任命，但是拥有很大的不受行政干预的独立权力，“他离华尔街近，离白宫远”。他做出决定把利率上调或下调百分之零点几，都足以影响每一个美国人买房、买车、求职、结婚或投资的人生决定和生活品质，足以影响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格局、走向和幅度，甚至会影响到总统的宝座稳不稳。

不管里根、布什和克林顿这三任白宫主人喜欢不喜欢联储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这位72岁的老头在这个宝座上已经稳居11年。他上任伊始，美国股市就爆发了震惊全球的“黑色星期一”大崩盘，他力挽狂澜，宝刀初试；而后美国经济虽历经起伏，但终入佳境，数年来一直呈现高增长率、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的良好势头，格林斯潘功不可没，也由此树立了他牢不可破的权威，“格林斯潘金口一开，全美国都得侧耳倾听”。

本书两位旅美作者搜集和查阅大量关于格林斯潘的资料，并得到格林斯潘及其助手的帮助，写出了这位美国金融强人的第一部传记。透过他腼腆的外表，作者追溯了他由音乐转入金融、找到自己辉煌舞台的人生轨迹，同时也缕述了美国联储体系及运作机制，及历届联储会主席的功过，并从一个侧面涉及西方经济中的两条路线之争。在走向经济全球化、自由化的时代，在中国越来越深地与国际接轨的今天，对于渴望了解真实的美国有关制度内幕的中国读者，本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内容简介 ·

人们说格林斯潘（也有译为“葛林斯潘”）在美国是仅次于总统的大权在握的人，实际上他的权威还超过总统。克林顿蹙蹙脚，打颤的不过是白宫，可这老头一打喷嚏，全球就得下雨。同时，格林斯潘不受总统们更迭的影响，从里根、布什到克林顿政府，他都是联储会主席。有了对经济趋势高人一筹的眼光，有了华尔街拥护和信任，即使白宫对他的货币政策时有不满，也没法不让他来当这个主席。

美国联储会是超级金元帝国中枢的巨大迷宫。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九日纽约股市“黑色星期一”后，格林斯潘挽狂澜于既倒，使华尔街和白宫佩服得五体投地，使他在迷宫中成为一尊金融之神。

一九九四年时，格林斯潘一次接一次地提高利率，被人视为“简直疯狂”。结果美国经济平安“软着陆”，开创了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经济上升时期之一。

现在，在经济动荡的起落中煎熬的全球民众，都对这个戴着黑框眼镜的瘦老头拭目以待。

本书是第一部关于格林斯潘的传记，不仅有他在联储会的中军帐如何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描述，对他的人生经历、思想轨迹、性格塑造和婚恋生活等也多有披露，而且写到他领导全球摆脱金融危机的最新策略。

引子 格林斯潘仗剑出山

【1987年10月19日纽约股市大崩盘的“黑色星期一”，为星期二格林斯潘时代的到来做了有声有色的铺垫】

“黑色星期一”

美国金融史上最难忘的一天是哪一天？

华尔街上的每一个股票商、经纪人都会毫不迟疑地告诉你：是1987年10月19日。

1987年10月19日，史称“黑色星期一”：这一天纽约股市爆发了大崩盘，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Dow Jones）狂跌了22.62%——将近四分之一！

不知是机缘凑巧还是冥冥之中真有什么定数：星期一，对于股市来说，真有点“黑色”的味道。历史上十个最大的道·琼斯指数狂跌日，竟有一半发生在星期一。这次更是登峰造极。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道·琼斯指数，前一个星期已经显示了凶险的预兆，下跌了235.48点，跌幅达9.49%；仅仅10月16日星期五一天之内，道·琼斯指数就急泻108.35点，跌到了2247点。紧接着，亚洲从东京、香港到新加坡，股市跟着大跌。

这一切仅仅是前奏，还有些人自欺欺人地安慰说：这大概是“技术性调整”。然而，真正的灾难10月19日终于降临：股市开盘，人头攒动，荧屏闪烁……说时迟，那时快，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在3个小时之内，直线下坠508.32点，跌到1738.40点，创造了一个下跌的历史记录：与此前的历史记录，1929年10月下旬的那次股市大崩盘相比，这次的损失几乎多了一倍，超过5000亿美元的美国股票价值随风而逝，相当于美国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八分之一。

《时代周刊》1987年10月26日这一期的特别报道追述说：“星期一早上，以往的焦虑不再隐隐约约，而以实实在在的形式出现了——成堆的纸片撒满经纪人的办公桌，每一张都是急速写成的抛出股票的指令；电脑屏幕上，一排排数字不断地急速闪耀，送来所有股市价格都下跌的消息：东京、香港、伦敦、巴黎、苏黎世……然后纽约的交易开盘，无法想像的一切发生了……”

华尔街上一名经纪人兼名不见经传的诗人艾德蒙·斯台德曼，曾经写过一首题为《黑色的星期五》的诗：“仿佛撒旦也参与游戏/每一分钟提高一个百分点”，用来形容“黑色星期一”也一样贴切。

全球金融界一片惊呼惨叫。这一天造成的大危机和大恐慌，给华尔街金融史，乃至整个美国历史，留下了极为惨烈的一页，成为今后多少人都记忆犹新、会反反复复提起的一个指标性日子。

牛熊决斗场

人们常常提起华尔街（Wall Street）。纽约曼哈顿岛下城这条只有半公里长的、被夹在摩天大楼里的小街，成了美国金融业的代称。

街名叫“墙”（wall在英语中就是“墙”），顾名思义，应该有堵墙，但是当初只有一道荷兰人筑的篱笆，防止牛羊走失；后来英国人改成木板墙，防止印地安人来袭。印地安人被杀得差不多了，木板也就被人拆了去烧火，

沿着原址，就空出来成了一条小街。

附近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已有两个世纪的历史，它肇始于1792年，乔治·华盛顿总统首届任期的第三年。华盛顿就是于1789年4月30日，在斜对面不远处的华尔街26号联邦大厦，手按着《圣经》，宣誓成为美国第一任总统的。

联邦大厦周围，就是美国最开始的股市，几个相互交换证券的商人，天晴在露天，下雨找酒馆。这一年5月17日，其中24个特别能捣腾的大户，决定选一个固定的地方，在固定的时间，以方便交易。他们在离现在的纽约股票交易所几条街的地方，找到了一棵枝繁叶茂、可以遮阳避雨的悬铃木。24个交易家就在这里，议定了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悬铃木下协议”，开始了互买互卖政府债券的交易史。后来每逢风和日丽就来这儿，刮风下雨就到附近一家咖啡馆。当时的纽约市区，范围还主要就在曼哈顿岛，只有4万人口、占地5平方英里的港口，岛上还到处搭着篷子，“车辚辚，马萧萧”，卖着毛皮、土地、烟草，还有刚刚运到的黑奴，起价喊价，吵吵嚷嚷，就像个大乡村集市呢。

两百年过去，如今，一群森然的大厦代替了那棵大树，头顶的天空被挤成了一条蓝色的细条；24位交易家身后，已经有了成千上万家公司的股票、数以千计的交易员，而不变的，只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生意：仍是证券拍卖——所谓“股票交易”，说到底，就是一群经纪人，为股民与企业公司充当一个中介，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进行证券的买卖，这一点从华盛顿时代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

纽约证券交易所被人称为“金融神庙”，这一来是指它的建筑式样：两根石柱托一根横梁，上面隐隐约约地刻着“纽约证券交易所”；二来是指它在美国乃至全世界金融业执牛耳的地位，正因为这种地位，它的门口高挂着3面旗帜，美国的星条国旗和纽约州的州旗分挂两边，倒是交易所的所旗，当仁不让地飘在正中间。但是正如旅美作家孟慰彦调侃地铺排的：这是“全球最大的拍卖场，全球最大的没有货架的商场，全球最大的成人游戏场；美国最大的金融中心，没有宝藏的藏宝地，没有黄金的金库，伊索寓言里腹内空空却能每天生金蛋的鹅，‘美国梦’的起点，一脚踏空成千古恨的楼梯口”。

然而，历史又怎么走到了“黑色星期一”？

股民们习惯地将股市上升称做“牛市”，把股市下降称做“熊市”。牛熊相争，就成了股市上下翻滚起伏的象征。曼哈顿下城金融区的街心公园门前，塑有一个巨大的雄牛雕塑，那是所有的股票交易商的寄托所在。天天都有人前来摸一摸它，希望带来点好运气；到过年过节，人们也给它披红挂彩，让它“高兴高兴”，祈祷来年吉利——美国人也有不少通过图腾表达的迷信呢。

全民炒股炒糊了

从1982年起，股票市场进入了半个世纪以来最长的一段“牛市”：连续5年，股票价格在全世界19家最大的交易所里稳固上升。纽约股票交易所每天平均交易额，5年来几乎翻了3倍。然而，这种过于美好的形势底下，危机四伏，已经令很多分析家大感不安，觉得“好景不常在”了。

事实上，在“黑色星期一”之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不祥之兆。后来的金融史家分析得头头是道：利率攀升，通货膨胀，债券市场萎缩，企业表现

不佳，华尔街的价格交易出现无规律、不稳定现象，美国国家预算和国际贸易两大赤字都在上升，美元贸易逆差急剧增加，已经达到美国无法承受的地步，美元亦难以维持高汇率，持续汇价下跌了 10%左右，白宫领导能力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然而，在事先，能够清醒地预计这一切并能够未雨绸缪的人，却是凤毛麟角。

到 1987 年时，全美国直接持有至少一种股票的人，已经达到 4800 万，占美国人口总数的 20%。但是私人投资只扮演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80 年代，他们拥有的股份不过仅占 10%。在华尔街起决定作用的，是那些拥有数十亿美元债券的大型投资公司，占 90% 的交易额，是在他们中间进行的。

“黑色星期一”里，这些大型投资公司的一败涂地，几乎毁灭了整个西方金融体系。次日的《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刊登了一幅漫画，真实地说明了当时人们的心态：画面上有一头牛倒地而毙，手拄利剑的斗牛士面对突然死去的牛百思莫解：“我们正炒得起劲，它怎么突然死去了呢？”

“黑色星期一”，用创纪录的股价崩溃的方式，校正了股价过高和股利低落之间的差距。不到一年，华尔街 16000 人失业。美国进入了长时间的经济萧条期。不少有识之士说，这一灾难的影响是历史性的、国际性的。

水深火热盼救星

“黑色星期一”的下午。

白宫已经乱了套，里根总统的顾问们已经被接二连三的坏消息弄得焦头烂额，不知如何是好。在道·琼斯一个劲儿泻落，情况越来越紧急之际，不少人昏了头，丧失了理性，有人甚至慌不择路，催促总统破例动用紧急权力，关闭金融市场，宣布银行“放假”——但这显然是个非常不聪明的馊主意。在一片惊惶绝望的气氛笼罩下，只有里根总统还镇定，乐观地对众人说，“并没有到世界末日”，不过此时此刻，空空洞洞的宽心话又顶什么用呢？

几条街以外，联邦财政部也成了作战室。偏偏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几天前飞往斯德哥尔摩了，这会儿正和瑞典国王在打猎呢。瑞典财政部长告诉他，股市下跌了“五”，他还以为是 5 点呢，压根儿没想到这个“五”后面的意思是“百”。他一听哪里还有心思打猎？赶回住处饭店，通宵不眠地往美国打电话。

所有人的指望都转向惟一的救星——“联邦储备委员会准备怎么办？”

现在，能拯救华尔街免于更大灾难的，只有联储会了。危急时刻，人们的目光在搜寻着联邦储备委员会新上任的主席艾伦·格林斯潘。

格林斯潘倒是早有不祥的预感，几个星期前就警告他的手下，要防备这样一场危机的出现。不过他毕竟没有预见到会在星期一这天爆发灾祸，便按原来日程安排，奔赴德州达拉斯市，出席美国银行家协会年会去了。

由于时差的关系，纽约证券交易所下午 5 点收盘关市时，达拉斯正是下午 3 点。格林斯潘抵达后正要离开飞机场，碰上了火速赶来给他报信的一位达拉斯联邦储备地区银行的代表。格林斯潘有与贝克同样的经历：他被告知，纽约股市以道·琼斯指数下降“508”收盘，还以为是下降 5.08 点，刚要松一口气，谁知那人说：“不，是 508 点呢！”他这才惊悚：纽约股市的灾难，比预想的要糟糕得多。

晚间 6 点 30 分，格林斯潘从达拉斯的饭店，拨通了在华盛顿像热锅上蚂

蚁的联储会副主席的电话。几番电话之后，他对华尔街的局势再清楚不过：市场上需要更多能流通的钱，以应付股票的抛售，否则就将陷入灭顶之灾；而银行担心更多的失血，拒绝更多的贷款。

关键时刻，一个盲动决策必将加剧股市的崩溃。

联储会新主席成为众矢之的？

格林斯潘深知问题的严重性。在某些人看来，如果说，这一次大崩盘的后果极为复杂深远，难以看清，而这次大崩盘的直接起因，则一目了然：千怪万怪，主要就怪他——联储会主席格林斯潘，是他新官上任三把火，投下第一把柴就砸了锅！

格林斯潘接过权柄仅仅两个月。

前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是民主党人保罗·沃尔克(Paul A. Volcker)。沃尔克先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在哈佛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获得政治经济和政府学硕士学位，又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过一年多，深谋远虑且博识多学。他曾为从民主党的肯尼迪到共和党的里根等5位总统工作过，1979年，被民主党籍总统卡特提名，出任联储会主席。1983年，他又被共和党籍总统里根提名连任。他上台前后，正是美国通货膨胀最严重之时，一度高到20%，他上任时为13%，联储会的利率也竟高达两位数。他在任期内，成功地遏制了通胀势头，被人尊称为“打断通货膨胀脊梁的人”。这一非同小可的功劳，使他赢得了商业界、金融界的极大尊重。

有人说，当时一些人在里根面前对沃尔克和他的政策颇为不满，于是里根有了换马之意；也有人说，他的第二届主席即将期满的时候，如果打算再次连任，向当时的里根总统提出来，里根一定会应允的——结果沃尔克并没有提出来；而里根似乎也并非“离了这块云彩就不能下雨”，并未三顾茅庐、礼贤下士殷勤挽留，沃尔克也就更不恋栈了。或许如他自己所说，“与通货膨胀作战，实在已经干够了”。

不论怎样，既然他要辞职了，里根总统就必须尽快找到另一位合适的人。

在新的人选问题上，里根本来打算找一个经济学家。然而以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为首的里根内阁红人们，一致向总统提议，这个位置非格林斯潘莫属。格林斯潘在为福特等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助选的时候，与贝克交往甚多，俩人成了好朋友，贝克熟悉格林斯潘的本事与理念，更主要的是，贝克非常清楚华尔街和美国商界对格林斯潘评价甚高，所以“内举不避友”。他对里根说，要想找替代沃尔克的人，没有比格林斯潘更能被金融界、商界接受的了。

白宫幕僚长霍华德·贝克，以及沃尔克本人等温和派顾问，也都劝里根任命可以领导反通货膨胀战斗的实干家，而不要找一个理论家来担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当时“伊朗门”丑闻和美元的下跌，弄得里根心力交瘁，既然说是市场要求如此一个人选，他也违拗不得，便顺水推舟，这个位置就非艾伦·格林斯潘莫属了。1987年6月2日，里根总统宣布了对他的任命，对格林斯潘褒扬有加，称他是“一个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

沃尔克离职消息一出，美元在全球市场上骤跌，可见沃尔克作为美国经济和股市的晴雨表，分量有多重了。要达到他那样的威信，格林斯潘面对的

挑战很不轻松哩。

三年半以来首次提高利率

不过，格林斯潘马上就使国内外投资人重拾信心——他的就任演说实在不能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格林斯潘自己说，他只用了“一毫秒”，就接受了这个重要职位的提名。7月21日，在长达3个半小时的参议院任命听证会上，格林斯潘面对参议院银行、住房和都市事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侃侃而谈自己的施政纲领，其战略目光和雄辩口才，令所有的人都感到无懈可击。

他说，他认为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首要工作是“实现（经济）稳步的、最大程度的增长，同时又不让通货膨胀的恶魔从魔瓶里冒出来”，在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和控制通货膨胀之间，他“看不到有什么可视做对立冲突的”。而前任联储会主席沃尔克的政策“从根本上是准确的”，自己不打算改变，将努力“遵循（前任的）脚步走”。他还表明，依他本人看法，经济衰退尚没有出现苗头，第三世界的债务形势也有了改善；然而联邦预算赤字的任何增长都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不赞成通过提高税收来降低赤字；他又预言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很快就会大大下降。

在与密歇根参议员唐纳德·李格的冗长意见交换中，格林斯潘毫不含糊地表示，他有能力顶住来自里根内阁关于不要实施紧缩政策的政治压力。今后如果实践证明他有决策失当，那也一定不是出于政治考虑，而是出于在经济上思谋欠妥。

一个星期后，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投票，一致同意了对格林斯潘的提名，并向媒体对他进行了高度评价，说他“具有高度智慧”，“受到了解他本人及其工作的商界的尊重。他是一位杰出的公民和正派绅士”。8月3日，参议院全体投票，以91比2的票数，通过了任命格林斯潘为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8天以后，在副总统乔治·布什的主持下，格林斯潘在白宫东厢宣誓就职。

要说格林斯潘上台的整个过程，真是干脆利落、毫不勉强；然而刚刚上台，他却让许多观察家吃了一惊：1987年9月4日，上任仅仅24天的格林斯潘宣布，将联邦优惠利率提高半个百分点，从5.5%提高到6%。提高利率这样的举措，自1984年4月以来还是第一次，一点不含糊地表现了格林斯潘对通货膨胀预兆的严密注视和高度警惕。在华尔街，格林斯潘顿时也获得了一个“通货膨胀斗士”的名声。

当时，美国的贸易逆差已节节增长到165亿美元，这不仅使美元疲软不堪，而且还引来了抬高进口商品国内价格的阴影。另一个不祥的趋势是，低失业率加上额外生产能力的下降，使人们听到了新一轮通货膨胀加速到来的隆隆车轮之声。

格林斯潘把提高优惠利率一举，看做反通货膨胀的一服“小剂量药剂”，非如此不可，是为了避免将来被逼得不得不使用更大剂量的猛药。金融界许多人解读他的良苦用心，认为提高优惠利率也并非一个“很激烈的政策改变”，《财富》杂志登出经济学家米基·利维的看法说，“那（提高利率）只是个一箭之远的射程，不是联邦要进一步收紧的信号。”但也有些观察家把格林斯潘的举动解释为他“急于摆脱沃尔克的影子”，以显示自己的独立。

像《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就引用经济学家戴维·琼斯的话说，“格林斯潘想要表明：一切在他的控制之下，在反通货膨胀的战斗中他是一条硬汉”。

或许格林斯潘确实有打算通过运用权柄，来树立自己的决策权威和风格。然而，弄好了，功德碑由此树立，弄坏了，责任也得落到他的头上。这一次恰恰就是灾难随之而至：新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便遇上了“黑色星期一”这样上任后的第一次重大危机。

格林斯潘时代在星期二来临

新上任的联储会主席，怎么对付这个棘手局面？

当天夜里，格林斯潘像通常一样睡了5个小时——幸亏如此，因为接下来的48小时里他就没工夫睡了——但是他这一夜不光睡了觉。格林斯潘经过反复思考，做出了可以称为他这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之一。第二天即星期二凌晨，他取消了原定在银行家协会年会上的演讲，火速飞回华盛顿。

“黑色星期一”的蘑菇云正在急速向全球扩散：伦敦、东京、巴黎、法兰克福、多伦多……所有股市跟着下跌。10月20日，星期二，东京证券交易所的开盘锣声余音未尽，股票价格就直线下跌，到收盘时，跌幅达14.9%，虽然没有赶上前一天纽约股市的惨剧之烈，但也创下东京证券交易的下跌记录了！10月26日，为避开这股风头而宣布闭市4天的香港，一重开股市，恒生指数竟狂泻了33.5%！有人估计，在两个星期一之间，股票买卖双方因股市狂跌而损失的财富高达2万亿美元之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直接和间接损失总和3380亿美元的5.92倍！

所有的报刊头版头条都是触目惊心的血红标题：“血溅华尔街！”“十月大惨案！”“失控的大屠杀！”权威性金融杂志《富比士》在仅仅一个月前，9月15日出版的一期上列出的美国400位最富有的富豪，一下竟有38人被抹去了；当时美国首富，华顿连锁商场的老板萨姆·华顿的财产瞬间缩水31%，损失高达21亿美元；华裔电脑大王王安仅“黑色星期一”这一天的下午，即损失了3100万美元；迈阿密市一个从百万富翁沦为负债近千万的中年男子亚瑟·凯恩，开枪打死、打伤了美林证券公司的副总经理和经纪人之后，对准自己的脑袋扣动扳机……

格林斯潘在如此这般万分危急的时刻，没有工夫也没有心思去想推卸责任的遁词。作为联储会主席，他的当务之急是力挽狂澜，拯救美国经济。好一个格林斯潘，举重若轻，一言九鼎，他已经成竹在胸。用爱弗纳·阿贝尔和阿尔伯特·凯夫所著的《坠毁：十月里的十天》里所叙述的话来说：

“他用一句话，发表了一个历史性的声明，字面上意思很简单，但意义却极深远：

“‘联邦储备体系，本着它作为这个国家中央银行的责任，在这里宣布，它会作为一个流通货币的来源，对所有经济和金融体系提供援助。’”

“星期二，格林斯潘来到舞台中央。”

星期二股市开盘之前50分钟，联储会的这一句声明，立即传遍全美国和全球。

格林斯潘在一夜之间，决定立即改变他奉行的紧缩政策，转为向市场提供充足的资金，保证股票市场所需之流通资金的供应，并向一切面临资金难题的主要金融机构提供援助。用《商业周刊》的话说，格林斯潘“向市场打

开了货币水龙头”，使整个市场犹如大旱逢甘霖。

星期一的乌云压城欲摧，为格林斯潘时代在星期二到来，做了有声有色的铺垫。

上 篇
入主联储会之旅
(1926 年—1987 年)

联储会主席这个担子，不会落到一个只是安安静静地等待着的肩膀上，一个无论怎样有成就的经济学家，一个市场上无论怎样百战百胜的成功者，都是远远不够的。

他一定得有藏而不露的野心，在“适当的时间”、用“适当的方法”、学“适当的知识”、认识“适当的人物”、朝着“适当的方向”迈进——自然，还得把握一个“适当的时机”

AlanGreenspan : A Biography

第一章 醉心音乐的小纽约客

【格林斯潘一只脚跨进了音乐圣殿……但他想好了：音乐才能是与生俱来的，要么有，要么没有。如果达不到专业艺术家的水平，那就把这只脚再缩回来】

格林斯潘何许人也？

在“黑色星期一”之后，这个名字频频出现在媒体。然而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人们却都茫然不知。关于格林斯潘个人的记载极少，无孔不入的记者简直就没有什么可以挖的东西，即使他担任了联储会主席这么重要的职位，关于他的报道多了起来，书也出了好几本，但全是关于他在联储会的“中军帐”里如何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描述，而对格林斯潘个人的从童年到少年乃至成年的人生经历、思想轨迹和性格塑造等等，绝少见诸文字。

艾伦·格林斯潘 1926 年 3 月 6 日生于纽约市的曼哈顿，他是父母惟一的孩子。

灰色的童年

小艾伦的父亲赫伯特·格林斯潘 (Herbert Greenspan) 是一个股票经纪人，大概没有什么成就与特色，名不见经传；母亲罗斯·戈德史密斯·格林斯潘 (Rose Goldsmith Greenspan) 是个零售商人。在小艾伦只有 4 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他一直跟着母亲罗斯生活。他们母子俩，还有外祖父、外祖母，一道住在曼哈顿的华盛顿高地 (Washington Heights)。那时的曼哈顿，还远远不像今天这样，被成片成片的摩天大楼分割天宇，密密麻麻的街道切割大地；当年的华盛顿高地这里，举目葱茏，野趣盎然，哈得孙河从北边群山中迤迤而来，从山坡下从容地流过，碧波在阳光下熠熠闪闪。即使是今天，华盛顿高地这一带还是曼哈顿岛上最富有郊区风光的地区之一，只有西北方向不远处从蓝天上掠过的乔治·华盛顿大桥，那上面来来往往于新泽西州和纽约的车流，日日夜夜无止无休——尤其是晚上，白白红红的流星密集得就像奔泻的银河。

然而格林斯潘的童年，却是灰色的。小艾伦的父母为什么离异？他虽然当时很小，还不懂事，但也不会毫无所闻，不过他对外界却讳莫如深。

家庭的变故发生时，正是 1929 年股市大崩溃之后。从 10 月 21 日开始（无巧不成书：那也是 10 月，也是个星期一），一连数星期，股市价格宛如高山上滚落的石头，直砸得人头晕眼黑。

10 月 24 日“黑色星期四”，一天抛售的股票就达到 1290 万股，经纪人闭眼作业。到中午时分，大批人群拥入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楼厅，观看人们的疯狂奇观，挤在人群中的一个英国游客，后来做到英国首相——他就是温斯顿·丘吉尔。华尔街上挤满了步履蹒跚的人，其中有不少佝偻着腰的老婆子。失控的人们占领了附近的大楼，摩天大楼上出现了第一个神情恍惚的人，在檐边徘徊。下边街上的人对着他狂呼乱叫，有的要他快跳，有的要他别傻……自杀的消息铺天盖地而来，英国记者发电报回去：“百老汇大街堆满尸体。”这当然是言过其实，耸人听闻，但是谁又能一一核实？

中午时分，华尔街的大亨们集中在摩根的办公室，紧急商量对策，却一

筹莫展。摩根倒是有点侠义气，拿出了 2.5 亿美元来救急，但是杯水车薪，兵败如山倒，谁也挡不住了。大混乱直到下午 3 点：华尔街成了大兵营，400 名警察荷枪实弹，各就各位，准备应付可能的骚乱，哪里还会有骚乱？经纪人办公室里坐满了客人，他们不哭不笑，不吵不闹，任何消息都无动于衷——他们已经血本无归，呆若木鸡。仅仅到 11 月中旬不到 3 星期之内，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全部有价证券贬值 50%，折合损失 260 亿美元！

美国是在大危机的阴影下跨进 30 年代的，随后是长达 4 年的世界性大萧条。这是一些骇人听闻的数字：美国的工业产值下降了 55.6%，下降到 1905 年的水平，国民生产总值由 1044 亿美元剧降到 410 亿美元，对外贸易额缩减四分之三，14 万企业宣告破产。

1929 年到 1932 年，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股票价值由崩溃前的 87 亿美元降到 13 亿美元，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了 89%，直到 1954 年 11 月即时隔 25 年之后，才重新爬回原处。当时纽约很有名的一家戈德曼·沙齐斯公司(Godman Sachs & Company)的股票，在股市崩盘之前的荣景中，以每股 104 美元的价格上市，几个月后涨至 222.5 美元，但是到 1932 年暮春，跌到了 1.75 美元！

失业者遍地都是。股市崩溃之前的 1929 年 5 月，失业人数是 150 万人，失业率为 3.1%，到 1932 年危机最低点时达到 1700 万人，每 4 个人就有 1 个人失业，100 万农民破产。而在格林斯潘所在的纽约有些地方，失业率高达 75%。侥幸没有失业的人，工资也降到了相当于 1929 年的 6 成。整个西方有 5000 万人失业。

格林斯潘不知对当时的美国领导人是何想法。《时代周刊》1998 年对 20 世纪美国所有的总统按政绩和历史地位排了一个名次，1929 年 3 月 4 日入主白宫的胡佛总统，是 17 名总统中的最后一名——美国人将之视做最无能的总统。他对上任之后仅仅 7 个月就爆发的这场特大危机缺乏思想准备，认为通过市场的自行调节，国家就可以安然无恙地渡过难关。1930 年 7 月，当一些工商界代表要求总统采取紧急措施挽救经济时，他不耐烦地说：“先生们，你们来晚了 6 个星期，危机现在已经过去了。”

但是当然没有过去——一直到他任期届满，被罗斯福总统取而代之，危机还没有过去。

1997 年 10 月 20 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重登了一张摄于 1929 年的档案照片，记录了破产者的惨景：一辆看上去很高档，七八成新的轿车停靠在路边，车上挂着一个醒目的牌子：“100 美元就可以买走这辆车，必须付现金。在股票市场失去了一切。”围观者不少，但盯着牌子看的只有一个人。

大萧条的年月

回顾这一切，我们会对小艾伦一生中“有幸”在这个最无能总统领导下度过的最初几年，有了个大体猜想，对于格林斯潘父母为何离异，也就有了一个不算太离谱的推测：他父亲作为在华尔街搏风击浪的“股市弄潮儿”，即使在最初的股市崩盘中幸免于难，在随后股市凄凉的年代里，也鲜有可能免于—蹶不振。而母亲的零售小生意，又怎么经得起这样的毁灭性摧残？大难临头，家庭发生变故，在当时可是太常见了。

格林斯潘后来对朋友回忆说，他母亲是个“乐观、聪明的女人”，虽然

绝谈不上富有，她却“乐善好施”，永远是快快乐乐的，哪怕是在家庭财务窘境毕露的时候，她也保持了笑口常开。

格林斯潘小时候是个害羞的孩子，他母亲的性格则正相反，开朗爽快，能歌善舞。格林斯潘记得，她不管去哪里参加派对，必定会往钢琴前一坐，毫不拘束地又弹又唱，反客为主。哪次聚会有了她，哪次聚会就气氛热烈。母亲是这么个脾性，真不知道小艾伦怎么却总是显得拘谨得很。

话说回来，母子俩虽然性格相距甚远，但格林斯潘与母亲的感情却一直非常亲密，即使他后来长大成人，翅膀硬了搬到华盛顿去，也还是天天——天天！——打电话，给妈妈请安，陪妈妈聊天。周末时，他也经常坐火车回住在纽约州的妈妈这儿来看望她。这样一直到母亲 1995 年去世。

天生爱好数目字

格林斯潘从出生，上小学、中学、大学，到开创自己的事业，直到进入官场之前，数十年来一直是在纽约这个大舞台上伸展腾挪，他算得上一个地地道道的“纽约客”。

能够有资格提及格林斯潘童年的人屈指可数，但这为数甚少的几个人不约而同都说，小艾伦给人最鲜明的印象，是天生对数字有一种早熟的喜爱。5 岁的时候，他就能心算多位数运算，这在不大擅长于数学的一般美国人中，算得稀罕了。一旦小艾伦表演出这个拿手好戏，总是令周围人啧啧称奇。

这一嗜好格林斯潘保持终生。他在金融界乃至政界升到高位之后，一直以对数据着迷、大量掌握各种数据著称，连外国的银行家也都知道他这一特长。前英格兰银行行长说过：“我们都当笑话说他的一点，就是他一到描述美国经济状况时，就会说，我在爱荷华州从吸尘器工业得到的数字表明，经济正在上升（或下降或别的什么）之类的。他对经济中正在发生的一切，有着深入最细枝末节的了解。”有一次，这位行长与格林斯潘一道，在一个星期六去拜访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聊天中，格林斯潘对美国经济的状况和前景进行了一番详尽分析，让铁娘子听得津津有味。过了几天，撒切尔夫人问到她手下这位行长：“那人（格林斯潘）对美国经济的运行，一切都了如指掌，你怎么就没有对我们英国知道得那么多？”

克林顿也知道格林斯潘的“数据狂”。1996 年一次白宫招待记者的晚宴上，总统开玩笑说，格林斯潘带着他相交多年的女友米切尔一进门，在存衣间交了 1 美元小费后，马上就说，去年的价钱是 75 美分。

小艾伦在曼哈顿的乔治·华盛顿中学一直读到高中毕业。这所高中出了几个著名校友，中国人最熟悉的，大概是比小艾伦高几届的师兄，前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基辛格是个德国犹太人，出生于 1923 年，比格林斯潘大 3 岁。1938 年，为了逃避纳粹对犹太人的残酷迫害，小亨利随着父母逃离德国，来到纽约，也住在华盛顿高地，也进了这所中学。

少年时的格林斯潘喜爱棒球。他是个左撇子，这一特点使他打起球来很占上风——我们记得，美国左撇子的名人甚多，最奇特的就是，1992 年 3 个总统候选人：布什、克林顿和佩罗，竟然清一色都是左撇子。这中间有点什么奥秘？

母亲还给小艾伦启蒙，教他学着打网球。不过他真正打得好，是到了华盛顿、出入政坛以后了。

沿着五线谱前进

你再也猜想不到，格林斯潘往下的成长轨迹，竟是沿着五线谱，走上了音乐道路。

如果说，他后来从事金融是继承了父亲的基因；那么，他爱好音乐，这一点或许是继承了母亲的基因。母亲的歌声琴声，使他小时候耳濡目染，训练出很强的乐感，他喜欢那种在旋律的涟漪中随波荡漾的感觉。据他的亲戚回忆说，年轻时的格林斯潘不仅音乐素质好，舞也跳得不错呢。

不过他倒不是当歌唱家和钢琴家的料，格林斯潘迷上了吹萨克斯管和单簧管。这与比他小 20 岁的克林顿总统有同一种爱好，克林顿总统也爱吹萨克斯管。

不光是玩玩而已，格林斯潘相当认真地要跨进文艺女神缪斯的领地。高中毕业，格林斯潘竟然申请纽约那所名人辈出、在音乐界名声极其响亮的茱丽亚音乐学院（Juilliard School），又竟然被录取了！

格林斯潘在那里学习和声、对位的理论和音乐史，也苦练更多的器乐曲目。学习之余，他进了“职业爵士乐团”——亨利·杰罗姆乐队（Henry Jerome band），吹萨克斯管和单簧管，随乐队四处演奏。

茱丽亚音乐学院主要是教授和训练学生学习正统、古典的音乐，而他在这个乐队里从事的爵士乐，当时还没有进入古典音乐的行列。不过格林斯潘不管那些，他在课堂上听老师讲望之巍然的古典音乐巨匠，苦钻那些“阳春白雪”；在学校外面对着闻乐起舞、摇晃身躯的听众，大奏那些“下里巴人”——乐队在全美国各地漫游巡回演出，也在被誉为“世界的十字路口”的曼哈顿中城时代广场，在儿童派拉蒙餐厅里演奏。他不能老靠着母亲的收入，他已长成大小伙子了，该自己挣钱了。

只是好花不长开。一年之后，乐团财力不支，关门解散了。

音乐是格林斯潘一生的赏心乐事。即使到了晚年，他对音乐始终着迷，最喜欢的是古典音乐，亨德尔、莫扎特、舒伯特、勃拉姆斯、拉赫玛尼诺夫……都是他终生愿意倾听的大师。他最拿手的乐器是单簧管，有时候兴致来了，他还会应朋友的请求演奏一曲爵士乐。

不过，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幸运的是，我在音乐方面没有好到优秀的程度”。格林斯潘对自己身上究竟有多少音乐细胞还挺有自知之明：“我是个还算不错的业余音乐家。但是，要按专业音乐家来衡量，我就太一般了。我当时就意识到了，因为你很快就会看到，真正的职业音乐家们是什么水平的才能。我认识到：那种才能是天生的，你要么有，要么没有。所以，我早就想好了，如果我达不到那种水平，我就是选错了职业。”

从爱读书的乐手到爱音乐的读书人

乐团还没有解散的时候，格林斯潘一边继续参加演出，一边就在发掘着自己的真正兴趣所在。他们的乐团在舞厅里为跳舞的人们伴奏，那时的舞会，每跳 20 分钟，就会休息 20 分钟，乐手们也就会歇一会儿。格林斯潘在乐队里有一位同事叫列奥纳多·加门特（Leonard Garmant），他也不是个等闲人物，当时在乐队里担任经理，后来被尼克松总统聘为顾问。据加门特回

忆说，格林斯潘那阵子，“一到休息的时候，就坐在一个角落的桌子旁边入迷地读书”，对舞厅里的人声喧哗充耳不闻。

他读的书，都是他从当地的公立图书馆借来的。乐队巡回演出，走到哪里，格林斯潘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哪里的图书馆借书。也多亏了美国的公共图书馆这种文化设施，给一个想成才的人提供了优越的起步条件。

19岁的格林斯潘那时读得越来越多的，是关于金融和股票市场方面的书。那时正值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到了尾声，借助战争刺激了军火工业，美国已经从大萧条中恢复了过来，股市也又重新勃发了节节上升的生机。格林斯潘回忆这一段时说：“我觉得这些东西太有意思了！”

他不光是死读书。格林斯潘注视着身边的种种金融现象，试着分析和理解政府经济政策的云起云飞和市场的潮涨潮落。有机会他就理论联系实际，将所学到的东西运用一番。他从身边做起，很乐意地帮助乐队里的同事们填报税单——人人对着那些密密麻麻的表格栏目都脑瓜子疼得要命呢，格林斯潘助这一臂之力，对他们来说，简直太是雪中送炭了。加门特还回忆说，格林斯潘是一个出色的记账员，极为细心地保存着他的账本。

他们可绝没有想到，这个乐于助人的小伙子未来有一天，将左右着他们的生活品质和国家的经济成败！

一年后，格林斯潘想清楚了。他在一只脚踏进了音乐圣殿之后，醒悟到自己并不具有音乐天赋，而达不到专业艺术家的水平，就应该及早抽回脚来，好好地对缪斯女神说声再见，向另外的方向迈步——格林斯潘毅然从茱丽亚音乐学院退了学，就此结束了音乐生涯。

他进了纽约大学——去学商业金融。

跨进纽约大学校门，格林斯潘多姿多彩、作为经济奇才的这第一生的第一幕，才正式开启。

第二章 高徒出自名师

【比起名校，名师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才更是决定性的因素】

纽约大学新鲜人

在曼哈顿林立的楼群之中并不起眼的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始建于1831年，是由当时几位社会名流发起建立的一座私立大学。

说起来，纽约大学的建立，是美国教育史上一个历史性事件。19世纪早期，美国虽然有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这样的“长春藤盟校”等许多名牌大学，但高等教育的重点，是向诸如希腊语和拉丁语之类古典知识的研究倾斜，而对近代、当代科技和人文发展的新领域，则并不甚重视。而纽约大学的这些创始人，痛感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这个缺口，他们策划扩大高等教育的研究领域，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工业、商业、科学、法律、医学，以及艺术等领域，培养更为实用的人才。

1828年从英国传来了伦敦大学创立与剑桥、牛津等古老学府抗衡的消息。在这一消息鼓舞下，本着“教育要跟上时代”的信念，这群“纽约客”在大西洋此岸也如法炮制，建起了这所强调综合性、实用性的纽约大学。第一任校长是阿尔伯特·夏拉丁(Albert Gallatin)，他曾经出任过托马斯·杰弗逊总统的财政部长和顾问。可想而知，他是不会不把经济学放在重要位置的。在这样一所已有了近120年传统的大学里学习经济，格林斯潘庆幸，自己算是进对了门。

年轻的格林斯潘在学了一年音乐之后激流勇退，当机立断，转上纽约大学学经济，这个时机也抓得准。这时正是1945年夏，欧洲的战火已经熄灭，而亚洲、太平洋战场，虽然大和民族的“神风突击队”还在拼命进行自杀式攻击，虽然当时谁都不知道美国正在秘密准备投掷原子弹，然而谁都看得出来日本大势已去，顽抗败局已定。美国大批的军人将要复员回家，战后重建工程即将大规模展开，再迟一点，恐怕报名申请读纽约大学经济系的年轻人会铺天盖地而来了！

整整3年，格林斯潘在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动力经济学、美国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统计学和高等数学……浩瀚的学海书山里苦钻苦学。这些知识，引领着他进入了他命定“好到优秀的程度”的领域。

1948年，格林斯潘以“最优异成绩”获得纽约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他马不停蹄，又在这所大学开始攻读他的硕士学位。他在这里首次遇到了战后初期最有影响的经济学派——凯恩斯主义的老师：他听阿尔温·汉森的课，汉森被公认为是凯恩斯理论最好的诠释者和传授者，格林斯潘在他的课上也成绩出色，但是他却没有成为凯恩斯主义者。

两个寒暑之后，格林斯潘的姓名前面又顺利地冠以“经济学硕士”的头衔了。

进入长春藤盟校

24岁的格林斯潘硕士并不满足，他读书读上了瘾，欲罢不能，还要继续深造。

再读就得读博士学位了。到哪里去读呢？老师们劝他将目光转向同样位于曼哈顿的长春藤盟校——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

格林斯潘心想事成，在朝鲜战争的炮火骤然响起，使整个地球冷战浓云密布之际，他又跨进了哥伦比亚大学，在这里他又度过了3个春秋。说起来也挺有趣：格林斯潘从小学到中学，从读大学本科到读硕士、博士，读书20年，求学的这几个地点，竟然没有超出方圆3公里！

哥伦比亚大学不仅是一所在全美国名列前茅的名校，而且非常有特点。

有一个著名的轮流调侃长春藤盟校的“换电灯泡”的笑话：“需要几个人换一个电灯泡？”在哈佛，是“只要一个人换，所有世界围着他转”；在耶鲁，是“没有人，因为耶鲁所在的纽黑文市在黑暗中看起来顺眼些”；而在哥伦比亚大学呢，竟是“需要76个人：一个人换电灯泡，50个举行集会要求争取不换电灯泡的权利，另外25个举行反要求的示威”。这相当贴切地传达出了校园里思潮翻卷、各持己见的气氛。

哥大坐落在有“人种试验室”之称的曼哈顿岛北部的哈莱姆区。尽管要再过十多年，这里才成为激进主义的温床，以在1968年爆发激烈的学生反抗运动著称于世；尽管要再过二十多年后，校园多元化才成为醒目景观，让学生自豪地吹嘘“我们的校园让诺亚方舟都显得单调”；而在格林斯潘就读的那个年代，这里却还是相对平静的。住在学校周围的黑人们还是“循规蹈矩”，服从着“白人”和“有色人种”这些随处可见的种族隔离的标示。但是这里比起哈佛、普林斯顿，尽管同样有着非常严格的学术训练规范和标准，但无疑更贴近现实社会的脉搏。

格林斯潘是来读博士的，这使他得以免遭本科学生所遭的那种罪：被哥大号称美国大学中最严格的一组基础课“核心教纲”整得水深火热。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系，一直被人批评为“重研究生而轻本科生”，但是这个缺点对于博士生格林斯潘来讲，倒正是得其所哉。何况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美国国家银行的创始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也是哥大的著名校友，在他的余阴之下，经济系颇受重视。

哥伦比亚大学校园有虽然不高峻却起伏有致的山丘，有虽然不浓密却枝叶扶疏的树林，一层层一排排红砖铜顶的校舍，随处点缀着塑像和雕塑，哥大图书馆的藏书量在长春藤盟校中位居第三……这一切，构成攻读书山的清雅环境，格林斯潘如饥似渴地尽情享用。

然而，通往博士的脚步，还是中断了。

1953年，格林斯潘中辍了学业，进入实业界——原因只有一个：缺钱。

他暂时离开了哥伦比亚大学，但他还会回到书山学海的——他最终将是“格林斯潘博士”。

亦师亦友伯恩斯

在哥伦比亚大学，格林斯潘虽然很遗憾没有得偿夙愿，一气呵成地戴上博士帽，但对他来讲，最幸运地是在这里遇到了他第一个杰出的导师，对他一生事业的轨迹，发生了无与伦比影响的亚瑟·伯恩斯教授（Arthur Burns）。

伯恩斯当时年近知天命之年，已经是美国赫赫有名的经济学家之一了，他的“商业周期”理论（business cycle），在全球的经济学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政界也产生广泛影响——就在格林斯潘离开哥大之后不久，伯

恩斯应邀出任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1970年，他又被尼克松总统提名，接替威廉·马丁，出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伯恩斯1904年4月生于奥地利，与格林斯潘一样，他也是父母惟一的孩子。在他还很小的时候，就随家人移民美国，定居在与纽约曼哈顿一河之隔的新泽西州。

伯恩斯自幼聪颖过人，6岁时，就曾把犹太教法典（Talmud）译成德文。在学校里他成绩优异，高中毕业后，顺理成章地获得奖学金，于1921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就读。

虽然学费不用发愁了，但还得解决食宿的费用，青年伯恩斯课余时间“无所不为”：在餐馆当过侍者，推销过鞋子，刷过房子，在邮局工作……等等；他还时常为《纽约先驱论坛报》撰写商业评述文章，不仅以那点润笔稿费稍稍填补了囊中羞涩，更使他锻炼了眼光、积累了知名度。

在考虑过建筑、法律、戏剧评论等等专业之后，一个多少有点偶然的机缘，使伯恩斯选定经济为自己攻读的专业和终身志向：他选修了著名商业周期理论分析家卫斯里·米切尔（Wesley Mitchell）的一门课。伯恩斯的博士学位还没拿到，就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和新泽西州的州立罗格斯大学担任了讲师；博士毕业之后，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教授。他和导师米切尔合作出版了研究商业周期衡量理论的专著，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伯恩斯认为：经济运行，有着发展阶段和收缩阶段交替的周期，通过对数据变化的研究，这些发展阶段和收缩阶段，都是可以被预测、描绘出来的。

格林斯潘后来毕生所从事的事业——不论是在纽约创办咨询公司，还是到华盛顿出任总统的幕僚、入主联储会——正是对伯恩斯这一理论的实践：了解经济的运行及其动因，对改善这些运行提供建议。

前联储会主席培养接班人

从哥伦比亚大学时代起，伯恩斯与格林斯潘二人建立了终生的友谊。格林斯潘服膺比他大22岁的伯恩斯的学术成就和理论体系，也感激老师的悉心指点，从自己得以初窥经济学恢弘楼宇的堂奥；伯恩斯则青睐这个才智过人的门生的锋芒与潜力，相信他未来必将鹏程万里，期待着他青出于蓝，成为自己一家之言的嫡系传人。这一亦师亦友的密切关系，对后来格林斯潘施展才华，走向命定的目标，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伯恩斯1970年赴华盛顿到联储会履新时，在纽约的住房就得卖掉。他希望能有一位朋友住进来，而不想卖给银行，交由完全陌生的人去处置。格林斯潘就贷款买下了伯恩斯空出的房子，在这里，他感到每天与恩师仍然朝夕相处，促膝磋商。

不知是对格林斯潘的遥远未来有了某种预感，还是存心要早早让爱徒兼密友做好“天将大任”的各种准备，尽管美国并没有所谓“培养第三梯队”一说，伯恩斯却把入主联储会时所遇到的一切，一五一十都告诉格林斯潘。从这时起，格林斯潘就逐渐越来越了解联储会的体制结构和运行机制，有时还出出主意呢。

接替尼克松的美国前总统福特，对他的这位联储会主席伯恩斯，赞扬备至。他在卸任之后所写的回忆录《康复的时代》（A Time to Heal）中这样描绘道：“如果说格林斯潘是华盛顿的新手的话（当时格林斯潘也在他手下

工作），亚瑟·伯恩斯则是战场老兵了。伯恩斯是个灰头发、衣冠不整的人，很少见他叼着自己的烟斗。作为联储会主席，他是国家货币政策的决定人。他显得很随和，其实他对他根本的目标从来没有忘记过。我从没有见过哪个经济学家，更会与国会打交道的，也没有哪个比他更受国会山的尊敬。一般来说，总统与联储会主席的关系是很疏远的——联储会是要独立的，总统不应该对它的决定进行任何控制，所以我们之间能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是很令我高兴的。他对我十分坦率、直言，而我也来而必往，但我们极少对任何实质问题有不同意见，因为我们的经济思想很合拍。我刚当总统的日子里，他受到很多批评，说他的联储会对货币供应限制得太死了。由于他担心通货膨胀，他决定坚持他的政策，而我一向是支持他的。”

伯恩斯的形象确实是烟斗不离口，据说他有一百多个烟斗。闲暇时，他喜欢画油画，也喜欢看棒球比赛，读18世纪的英国小说和当代的侦探故事。这多少也影响了格林斯潘。伯恩斯与海伦·伯恩斯坦(Helen Bernstein)1930年结婚后，育有两个儿子。如果有时间，他们夫妇二人会到他们在佛蒙特的农庄去，伯恩斯在那里密林深处盖了一座小木屋。

有人曾经介绍说，伯恩斯是个两眼朝天、目空一切的傲慢的人。或许这是真实的，毕竟他不仅在学术上，而且在权位上，都是一个顶尖级的人物。有一位伯恩斯的门生还写文章批评他，说他对自己的学徒“十分傲慢无理”。不过，格林斯潘肯定没有这种印象：伯恩斯对格林斯潘似乎从没有如此过。观察他与格林斯潘的终生友谊，实在看不出他有一点傲慢不逊和生硬无理——或许他虽然自视甚高，但又爱才若渴吧。

第三章“教母”爱恩·兰德

【爱恩·兰德的“客观主义理论”，论证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合理依据：又有利，又有义，两全其美，“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因此吸引了许多当时最优秀、最聪明的年轻人，包括格林斯潘】

精神世界的导航员

如果说，伯恩斯教授是对格林斯潘一生的学术和事业影响最大的人，那么，对格林斯潘一生的心灵之路影响最大的人，则是爱恩·兰德(Ayn Rand)。从某种意义上说，兰德是格林斯潘这一辈子一个更为重要的导师。打个不甚恰当的比方：伯恩斯可以算是格林斯潘的“教父”，而兰德，则可以算是他的“教母”，教父教母各有分工，前者管在世俗事业上铺道搭桥，后者管在心灵精神上导航引路。

认识兰德，大概是在格林斯潘与伯恩斯结下友谊的同时。1952年，俄国出生的美国女哲学家、畅销小说家爱恩·兰德，出现在格林斯潘的人生里。像影响了很多美国人一样，兰德的思想以及她本人，深深地影响了格林斯潘。

要说起格林斯潘认识兰德的经过，就先得从格林斯潘的第一次婚姻说起。关于这次短命的婚姻，人们掌握的情况极少。26岁的格林斯潘在攻读博士期间，与琼·米切尔(Joan Mitchell)结了婚。米切尔是个先锋派画家，而格林斯潘，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提到的，因为他母亲的遗传和熏陶，颇有音乐细胞。尽管后来改学了金融，但他对于艺术还是天然有亲近感的。

不过，格林斯潘的这次婚姻却是昙花一现，仅仅一年就以离异而告终，也没有给他们留下子女。这次婚姻对于格林斯潘来讲，“船过水无痕”，惟一称得上重要的后果仅仅是，通过他妻子米切尔认识了她的朋友兰德。

米切尔带他来到兰德在纽约的沙龙，格林斯潘一下子就被兰德对自由资本主义那种毫不掩饰的捍卫精神迷住了。他感到，兰德激烈的观点，深得他的心。离婚之后，格林斯潘就独自继续与兰德交往，在整个 50 年代里，他都是兰德沙龙的常客，又是她创办的刊物的积极撰稿人。直到 1982 年兰德去世，在 30 年里，格林斯潘一直是她的忠实信徒和亲密朋友。她的“客观主义”哲学，对格林斯潘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俄国来的奇女子

爱恩·兰德是一个罕见的奇女子，有着不同寻常的一生。

她是俄国人，21 岁那年来到美国。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她大概可以算是一个“白俄”；而在她 77 岁逝世于纽约的时候，她却是美国的国际知名作家。在她一生里，她写下了大量剧本、畅销小说和哲学论文，建立了她自己的系统的哲学和社会思想，对很多美国人的心灵，包括格林斯潘的心灵，都产生了只能用“改造世界观”来形容的深刻影响。尽管不论从文学上还是哲学上，兰德都遭到过很多批评，可是她的追随者，既从人数上，又从他们对她思想忠实的程度上来看，都远远超过其他大多数作家的追随者。即使在她去世之后，她对美国人的生活和思想，仍有着令人惊异不已的强大影响力。

格林斯潘的这位“教母”比“教父”小 1 岁。1905 年 2 月 2 日，一个叫阿丽莎·罗森堡 (Alissa Rosenbaum) 的女孩，诞生在彼得堡。她的父亲是一位俄国化学家，共有 3 个女儿，阿丽莎是最大的一个。

沙皇时期，他们一家人生活安稳——当时拜门捷列夫发现了元素周期表之赐，化学家是非常受人崇敬的，何况他还自己办有工厂，生产化工产品。几个孩子都能受到很好的教育，夏季全家还可以出国去旅游。阿丽莎从小被送进了私立学校，6 岁起就开始学习读和写了，这比一般的俄国孩子要早两年。

阿丽莎十分早熟，她的精神世界时常处于躁动之中。这样一个孩子，觉得课堂上的功课很枯燥无味，就再自然不过了。她早早开始大量阅读小说，而且自己也试着动笔写。1914 年夏天，他们全家去伦敦度假期间，她第一次立下志愿，要当一名作家。那时，她才 9 岁。

她 13 岁那年，目睹了俄国 1917 年革命。那真是惊心动魄的大事件：沙皇被推翻，随后全家被处死，布尔什维克掌握了政权。在阿丽莎的记忆之中，随后就是清算、没收、镇压和年复一年的动荡。阿丽莎父亲的企业被收归国有，一家人安稳的生活，就这样突然之间随风而逝了。

阿丽莎永远不会忘记、也永远不会容忍这样的改变，她的家庭和她个人的经历，奠定了她敌视苏维埃政权的世界观。她觉得，马克思主义信条中“最荒谬的就是非宗教的利他主义”，也就是鼓吹为了公共目标牺牲个人利益。

但她当然无法将这样的思想大声说出来。在当时的环境之下，随着对人们思想的钳制日益加剧，人们在选择专业时，越来越倾向于把“安全”放在首位。阿丽莎要进大学了，家人、亲戚、朋友们全都主张她学工程，这样毕业后可以找到一份“平平安安的工作”。但是阿丽莎对念书和择业却有自己

的主见。她觉得，念书是为了武装一个人的头脑，深化对这个世界整体的认识，不是仅仅为了挣个饭碗，安安全全然而萎萎缩缩地度过一生。

阿丽莎自作主张，选择进了列宁格勒大学历史专业。

1924年，年仅19岁的阿丽莎就大学毕业，来到了彼得堡历史博物馆，当了一名解说员。

一年后，1925年，阿丽莎接到她在芝加哥的一位亲戚的来信，邀请她到美国访问。崇尚精神自由的阿丽莎顿时觉得，脱离“监狱般的”彼得堡——那时已经改名叫“列宁格勒”，但是在她心中，它仍然叫“彼得堡”——的机会来了！

当局竟然毫无留难地批给了她护照——尽管她并没有敢指望会有好运气能这样顺利。她来到了新大陆。

能到美国，阿丽莎觉得自己的生命将重新开始，索性连姓名也“弃旧换新”。她给自己改了个名字，叫“爱恩”，这是一个她所仰慕的芬兰作家的名字。用这个名字，她踏上了去西方之路。她心里明白，她这一次，将一去不复返。

到美国不久，她又把姓改成了“兰德”——这是她从打字机上的公司名称得来的灵感。

心灵世界的时空跨度

爱恩·兰德这一生，在时空上的跨度极大。她于俄国尼古拉二世王朝的第十一年出生，到美国罗纳德·里根总统任职的第二年辞世；她从欧亚大陆交界处的彼得堡，来到当今西方的文化之都纽约；她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治下国土，来到自由资本主义的超强帝国……

这种跨度，使她具有了一般人很难具有视野，极大地扩展了她的心灵世界的广度。

爱恩·兰德从此后再也没有见过父母和大妹妹，他们后来都死在俄国。15年后，她在美国见到了她的小妹妹，但是俩人已经合不来了。

兰德一心要成为一个作家，一个美国作家。

凭着不屈不挠的闯劲，也凭着她写作的天分，当然，还得加上她的幸运，她在好莱坞获得了成功。她为派拉蒙、米高梅等著名电影公司撰写电影剧本，有的被拍成影片。

1929年，24岁的兰德，嫁给了美国演员弗兰克·奥康诺（Frank O' Connor）。1931年，她归化成为美国公民，入了美国籍。

在好莱坞的成功，使她满怀信心，于是又转而进军纽约百老汇。1935年，她来到纽约，也获得了成功。后来她又返回好莱坞，直到1951年，她又一次移居纽约。这一次，直到1982年3月6日去世，她一直生活在纽约——巧合的是，她的忌日正是格林斯潘的生日。

兰德比较著名的论文集有《致新知识分子》（For the New Intellectual，1961年），《自私的美德》（The Virtue of Selfishness，1964年），《资本主义：未知的理想》（Capitalism: The Unknown Ideal，1966年）。影响较大的小说有4部：《我们活着的人们》（We the Living，1936年），《颂歌》（Anthem，1938年），《源泉》（The Fountainhead，1943年），《阿特拉斯擢挑子》（Atlas Shrugged，1957年。阿特拉斯是古希腊神话中

顶天的巨神)。

兰德的每一部小说，都有一个重要的哲学主题。她影响最大的小说，是于1943年，在经过6年艰苦努力后，写下的《源泉》。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孤独的建筑师，不肯苟且放弃自己的原则，在当局没有经过他的许可，就修改了他的设计之后，他就把那座建筑炸毁了。这部小说相当畅销，并被改编成了电影，并由著名影星加里·古柏主演。

“客观主义”的鼓吹者

兰德是个并不算特别动人的女子。她既没有大手笔的公众表现，又没有倾国倾城的美貌（年轻时的她还颇为清秀俊逸，但是当她为人们注目时已经早过了不惑之年），也肯定没有把一套哲学理念体系化的天分。可是这样一个女性，却对人们的思想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这应该归功于她有着超凡的信念，超凡的精力和热情。

50年代初，正是在格林斯潘认识兰德那个时候，她成为自己所倡导的客观主义运动（Objectivist Movement）的中心。

“客观主义”说起来并不复杂。兰德崇尚的是自由资本主义，为之找到伦理学上的依据，因此提倡“合理自私”，其信念是：在人们积极地追求他们各自自身的利益，而不是追求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的时候，所形成的合力，才能最有效地对社会发挥推动作用。

这套理论与其说是哲学，倒不如说是伦理学——虽然她也从人的心理动机深处去寻找人们社会行为的终极根源——并由此而形成一种社会改造的蓝图。这种客观主义理论，提出了一种试图判断道德善恶的新角度，为自由资本主义找到了“充分的辩护依据”，简单一句话：只有利己，才能利他（社会整体）——自由资本主义不仅从利益的角度来讲是最符合经济法则的，而且也是最符合善的道德标准的。

60年代初，美国正是各种思潮风起云涌、辩驳消长的年代。黑人民权运动和反对越南战争，使美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了猛烈的冲击；而世界各种文化包括东方古老民族的神秘宗教，也在美国吸引了众多信徒。兰德的客观主义的理论，论证了自由资本主义又有“利”，又有“义”，既对人们论证了利己的合理性，让之名正言顺地追求自身利益，又赋予其崇高名义，让他们为“利己行为”发掘出推动社会的功能，两全其美，“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因此吸引了许多当时“最优秀、最聪明”的人们，尤其是大学生们。

格林斯潘一下子就成了兰德的追随者和忠实听众之一：“我刚认识爱恩·兰德的时候，是个亚当·斯密式的自由企业家，满脑子理论结构和市场效率。经过与兰德长时间的讨论，和多次争论到深夜，她使我思考，为什么资本主义不仅是有效率的和可行的，而且是合乎道德的。”

尤其使格林斯潘兴奋的是，他一下子发现：兰德激烈的反政府干预的观点，深得他的心。后来，他在给总统当各种职务的顾问时，被一些评论家认为，他既不能被划为“凯恩斯主义者”，也不能被贴上“货币主义者”的标签，宣扬的实际上是“经济原教旨主义”：以较少政府开支、平衡预算、稳定的货币政策，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

兰德的信徒们后来创办了月刊《客观主义者通讯》，格林斯潘作为兰德最信赖的“内圈”里的一员，经常为这份月刊撰文。1966年，通讯又改成了

杂志。在 1966 年 7 月号上，格林斯潘撰文斥责由政府执行的社会福利制度，“只不过是政府没收社会成员的财富的一条途径”——可见他当年一向对社会福利制度嗤之以鼻。

兰德与格林斯潘私人之间的交情也十分深厚。1974 年，格林斯潘应聘担任了福特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年近古稀的兰德，特地赶到华盛顿来参加他的宣誓就职仪式。

值得指出的是，也有人并不认为格林斯潘在思想上接受了兰德很深的影 响。例如，与格林斯潘相交较深的美国企业协会的经济学家伯特·斯汀，就认为格林斯潘的经济思想是自己形成的，并未受惠于任何特定导师，不能简单地认定他就是一个兰德的客观主义门徒，“我认为他更是一个实用的、温和的、能了解对方的人”。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罗伯特·梭罗（Robert M.Solow）更明确地说“我认为在他（格林斯潘）心灵深处，对那些东西没有丝毫相信——他不相信那些。”

然而，我们从格林斯潘的主要经济思想的渊源看，兰德的痕迹是明显的。在兰德思想影响下，格林斯潘对自由市场的信奉几乎到了极端的地步，不断批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甚至走到反对反垄断法、累进所得税、保护消费者立法的程度。也正因为如此，他对担任公职，多次表现得犹豫不决。他常常为必须根据某种政治需要、有时甚至是某种很狭隘的政党利益来作经济决策，而感到与服从客观经济规律之不相容的内心冲突。

第四章 从公司主管到总统顾问

【起先，“教母”兰德的力劝，使格林斯潘将一只脚插进政界；而后，“教父”伯恩斯的力劝，使格林斯潘把整个事业的重心转到政界】

初出茅庐

格林斯潘身高 6 英尺，体重 180 磅，褐色眼睛总是露出几分迷茫的笑意，黑色头发稀稀疏疏。他经常穿着一套深色西服，胸前有一个很小的他的姓名开头两个大写字母 AG 的标志。据说不出席国会听证会的时间里，他穿的衬衫“几乎看不出颜色”。但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格林斯潘，给人以莫测高深的印象，总是戴着一副威严的黑框眼镜，用“好像木管乐器发出的音色”讲话，出言审慎，令人望去像一个“陷在装满产量报告的大卡车阵里”的经济学究。

今天人们看到他这副尊容，决不会想到他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预测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产品的市场需求。

1953 年，格林斯潘中断了学业，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寻觅一个饭碗。

他在美国国家工业联合会 (National Industrial Conference Board) 得到了一份工作，任务是利用官方在朝鲜战争中订购飞机的数字，来预测市场上对钢铁、铝和铜的需求。就从这个时候起，格林斯潘的天分开始展现了，他知道怎么样喝令支离破碎的数字集合列队，前后左右地端详它们，得出对市场趋势的整体把握。

格林斯潘虽然离开了学校，仍与学术界保持着关系。最密切的当然是与两所母校，从 1953 年到 1955 年，他曾当过纽约大学的经济学讲师。

在工业联合会干了一年，28 岁的格林斯潘打算另闯天下了。1954 年，他与资深商业顾问威廉·汤森 (William Townsend)，在纽约合作建立了汤森—格林斯潘经济咨询公司 (Townsend-Greenspan)，汤森从 30 年代起，一直活跃于商业咨询界，他可以算格林斯潘的长辈，担任总裁，格林斯潘在公司里充当他的副手。

汤森在债券交易上老马识途，富有经验。他把在书本中学不到、从债券市场上摸爬滚打中得到的许多切身经验教训，一一传授给格林斯潘。格林斯潘与他合作得非常愉快。汤森 4 年后 (1958 年) 去世，格林斯潘继任公司总裁，并拥有公司主要资产，独立地支撑这一门户。

当家做主

格林斯潘领导这家咨询公司长达 30 年，是他在自己一生中最年富力强的 30 年。

这家公司规模并不大，却在金融市场上很有影响力。对这一点，最有说服力的一个论据是：它从来不必像其他咨询公司那样，主动地到处联络，寻求客户；它只需要“守株待兔”就可以了：找上门来要求提供经济研究、预测等各项服务的客户，源源不断。

这当然不是靠什么运气。用一句中国的俗语来说，叫做“酒好不怕巷子深”，在金融市场这一高手辈出、各擅胜场的武林，格林斯潘只有技高一筹，

才能脱颖而出。到 1987 年格林斯潘因为就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而无暇顾及自己的生意，只好关门歇业之时，这家只有 25 位雇员的公司，已拥有将近 90 个长期大客户，多半是工业界和金融界巨头。

格林斯潘往往应用一种“折中的经济分析方法”。他对繁琐的统计数据着了迷地喜好，为伯灵顿工业公司（Burlington Industries Inc.）和赖德系统公司（RyderSystem Inc.）这一类工业巨头当经济顾问，提供咨询，经常用一种所谓“底朝天”的方法——翻箱倒柜、以“地毯式轰炸”般的彻底，找出上千统计数字，来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一个经济意义相当广泛的结论。

鸡生蛋，蛋又生鸡。因为他身怀绝技，才使得经济预测和经济咨询业务蒸蒸日上；而在这些业务中打滚，不仅使格林斯潘财源滚滚而来，成为百万富翁，而且又使他继续积累了美国经济各个层面的丰富知识。

一条腿插入政界

很长时间，格林斯潘埋头于自己公司的业务，乐此不疲，无暇旁骛，没有介入政治。

1966 年的一个下午，一个偶然的机，在他面前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这天格林斯潘偶然碰上了早年在纽约乐团里的老朋友列奥纳多·加门特。加门特弃乐从政，当上了理查德·尼克松竞选总统的顾问。故交相逢，一向器重格林斯潘的加门特把他介绍给了尼克松。共和党人尼克松和格林斯潘对经济发展和社会政策，有许多看法非常相近，俩人一拍即合，1967 年，尼克松约请他出任自己次年总统竞选的顾问。

如果接受，这就意味着要担起相当繁重的责任，要投入相当多的精力。加门特当然是希望格林斯潘接受的，而对格林斯潘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兰德，也极力怂恿——在她看来，这是一个将自己的理论主张付诸实施、对美国政府的政策施加影响的开端。格林斯潘经过一番盘算，做出了一个对一生命运有重大转折的决定：接受尼克松的任命，进入政治领域。他担任了总统候选人尼克松的国内政策研究小组主任。

尼克松在政坛上屡仆屡起，算得一个传奇人物——他自己写有《六次危机》的回忆录，津津乐道遭受的各种困厄。但这一次他竞选达到了其辉煌的顶峰，如愿以偿跨进了白宫。格林斯潘又在新旧政府交接时期，成为尼克松驻联邦预算局的代表，和尼克松对外贸易政策方面的顾问。

顾问也罢，政策研究小组主任也罢，都只是半职工作，有事则来，无事则归，格林斯潘还是将其主要精力花在经营自己的公司上。但即将接过白宫钥匙的尼克松，考虑组阁人选，希望格林斯潘担任一个政府中的全职职务。

这时的格林斯潘，自己领导的公司正在正轨上运行，还没有打算全身心地转入政界发展。他婉言谢绝了尼克松的邀请。1969 年元月，在尼克松宣誓就职之后，格林斯潘返回了他在纽约的咨询公司。不过，他并不想把插入政界的一条腿抽回来，所以继续非正式地为尼克松提供咨询，出任一些半职性的顾问，比如担任政府经济增长问题研究委员会的工作，金融结构与法规委员会的工作，等等。

此外，1971 年至 1972 年，格林斯潘参加过商业部长顾问委员会的工作；1972 年，参加过联邦证券与交易委员会的中央市场委员会的工作；1974 年，参加过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工作。

尼克松走了，福特来了

1974年初，当选连任的尼克松，又一次找到格林斯潘，请求他出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一职。格林斯潘先是照旧拒绝了，但后来看到尼克松的内阁中，“的确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就渐渐动摇了决心。终于，在7月间，他不再坚持初衷。后来他回忆说，“我对他们说，就是我来干，也不会改善什么的，可是华盛顿那些人就是不听。”

如果说，他第一次同意出任尼克松竞选政策主任，是“教母”兰德的话起了作用；那么这一次，除了白宫办公室主任黑格的力劝，更是他的“教父”，原来哥伦比亚大学的恩师、当时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恩的话起了作用：他也多次来劝说这位昔日的学生，说是出于“对国家的负责”，他也应该站出来，与正在威胁着资本主义的通货膨胀作一番斗争。

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这一机构，是1946年由杜鲁门总统决定成立的。其职责有别于其他政府机构，不是职能部门，不管具体杂务，也没有从上到下的行政系统；它超脱于官僚机构的琐事之上，专门从宏观层次研究与预测整个国家经济的大趋势，就联邦政府的计划对最大限度地促进就业所起的作用进行估价，向总统提出“全国性的经济政策，以鼓励与促进自由竞争，避免经济被动与缩小所造成的影响，以及保持就业、生产和购买力”。总统每年1月向国会提交的经济报告，主要就依据经济顾问委员会提交的资料来起草。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还要担任总统对国会和公众的“经济政策发言人”这么一个角色。

这个顾问委员会，是一个微型的智囊班子，只有“一官两兵”共3人组成，由总统提名，参议院批准。当然，官不是普通官，兵更不是普通兵：委员会主席不用说，另两名委员也必须由有建树的经济学家担任。在格林斯潘任这一职务时，他率领的两名委员，是著名经济学泰斗米尔顿·弗莱德曼（Milton Friedman，一译弗利曼）和查尔斯·舒尔茨，他们俩人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后者还担任过卡特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总统顾问委员会主席这个职务，对白宫来说意义究竟有多么重要，可以从一个说法得到印证。从50年代中期艾森豪威尔当总统之时，关于白宫进行经济决策的人，就流传着“三驾马车”的说法：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财政部长和联邦预算局长，构成总统宏观经济决策的核心。这3个人定期举行碰头会，交换情况，沟通意见，协调立场。

除了“三驾马车”，还有所谓“四人会”，就是在以上3人的基础上，再加上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不过，联储会主席与以上3人比起来，与白宫的关系要相对独立得多。

1974年8月，参议院通过对格林斯潘的任命。在讨论任命的听证会时，有人提出质疑，理由正是针对他所受到的爱恩·兰德的影响。格林斯潘在答辩时表示，他反对反托拉斯法、反对累进所得税的见解，确实与兰德的主张有关——与她一样，他将这些看成是“对自由经济的限制”。但是，这些观点不会影响到他作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行使职责。

没有想到，在他预定于9月1日走马上任之前的两个星期，也在这个8月里，美国政坛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震动：尼克松因水门事件面临弹劾！他权衡再三，黯然辞职，副总统福特按照宪法继任总统。

“一朝天子一朝臣”，福特完全可以取消对格林斯潘的任命。但是他没有这么做，而是继续维持原任命。他甚至打电话来，敦请格林斯潘按期上任。新总统对格林斯潘印象特别好，格林斯潘向新总统提供咨询的范围也由小到大，由此及彼，不仅在经济问题上，而且在政治问题上——夸张一点说，甚至在一切大小问题上，他都成为福特乐于垂询的顾问。有人说，格林斯潘花在考虑政治问题上的时间，一点也不亚于他花在考虑经济问题上的时间。那时候，格林斯潘和福特总统的关系竟密切到这种程度，甚至和总统一起去看足球。

为福特对抗通货膨胀献计献策

福特并不是个懂经济的总统——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总统都对经济是“半瓶醋”，他们是吃政治饭的，都欠缺经济背景，福特也不例外。他与后来的布什和克林顿是校友，1941年在耶鲁大学法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然后开业做律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应征入伍。福特连续12次当选为联邦议员，在政治上是个“老油条”，但是在经济上堪称门外汉。不过，他有一个可贵的优点：颇有自知之明，承认自己不懂经济，又真心实意地想弄懂经济。他肯花很长时间与他的经济顾问们讨论——更正确地说是请教。很多时候，谈论的问题并不是当前经济政策，而是基本的经济概念。他自己后来承认，正像在外交上得益于基辛格一样，在经济上受教于格林斯潘。

福特在当副总统时，就声称“通货膨胀是美国的头号公敌”；在接替尼克松入主白宫第3天，他又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宣布，强调恢复对政府信任和战胜通货膨胀的必要。他决定压缩政府预算，减少开支，并以紧缩的货币政策支持治理通货膨胀。这些政策获得了民心，当时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超过70%的民众支持福特的政策。

但是，刚刚上任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却出来对福特泼冷水，他委婉地告诫总统，不要以为少量削减政府预算就能使经济大幅度增长，而是应该对联储会施加压力，迫使它放松紧缩的货币；也不要相信失业率下降会使通货膨胀率大大下降的说法。格林斯潘还进一步要求结束“对经济的过时的束缚”，如进口限额、公平贸易法，以及“对铁路和航空的过度管制”。格林斯潘认为，如果能做到这些，促进了竞争，会导致价格的下降，从而有助于抑制当时的通货膨胀。

后来的事实证明，格林斯潘的这些看法是有道理的。

格林斯潘在担任这一职务期间，不断给福特写下简明扼要的备忘录，其主题从“造成衰退与繁荣的原因”，到“通货膨胀的原因及通货膨胀——失业的平衡”；从“货币政策，联邦储备系统的工具”，到“储蓄、投资和资本形成”。格林斯潘向总统反复力陈，应该“把抑制通货膨胀当做国家的首要经济任务”。他认为，要想建立一种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就业信心的模式，一个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是最首要的条件。他作为福特国情咨文的起草班子成员之一，围绕这一思想作过详尽分析并提出具体对策，多半得到了福特的采纳。格林斯潘刚上任时，美国的通货膨胀率高达11%，经过3年的努力，到他1977年因福特被卡特击败而随之离任时，通货膨胀率已降到了6.5%。这其中当然就有格林斯潘的一分功劳。

后来，格林斯潘曾经总结过在总统面前树立威信的经验：阐明正确

的经济政策；对经济的数据要有事实作依据；所提交的报告要简明易懂；注意避免繁琐；最后提出的建议必须有助于实现总统追求的全国目标。

经济政策委员会的主心骨

由于当时经济决策的任务日益吃重，福特的亲信助手、总统经济事务助理威廉·塞德曼(William Seidman)提出，在协调和决策机构上要有新着数，要成立一个直属于白宫的“经济政策委员会”。塞德曼的理由相当振振有词：一大堆互不隶属、互不买账的部委办，实际上很难全面协调运转，最好将之全部放进一个单一委员会。

总统发布行政命令，赋予这个经济政策委员会3项广泛的职责：一、就国际国内的所有经济政策向总统提供咨询意见；二、监督美国所有经济政策的制定、协调和执行；三、发挥经济决策核心的作用，同时，行政命令还规定这个政策委员会下面统辖一个“执行委员会”，对这两个委员会的构成、主要人事安排和分工、与联储会的关系等等具体问题，行政命令中都做出了明确决定。

按照福特行政命令，财政部长威廉·西蒙(William Simon)任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兼任政府的经济政策发言人；而塞德曼和格林斯潘则担任执行主任，负责协调。福特称这3个人——他还往往将格林斯潘放在第一——为“我的经济顾问们”，在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决定经济政策方面，对他的作用很大，在他的回忆录中多次提及格林斯潘对他的经济决策方面的提醒。这实际上形成了西蒙主外，塞德曼和格林斯潘主内的框架。这倒正中格林斯潘的下怀：他本来就不喜欢抛头露面，而热衷于在幕后埋头工作；塞德曼也是如此，而西蒙则很满意自己的政府经济发言人的形象，也就无意过多干预委员会的组织结构和执行程序。3个人正好形成互补，配合默契。

人们原来有些担心，让西蒙担任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会使这个委员会更多地向政府财政部倾斜，但后来并不如此：由于各种议程、会议安排都由塞德曼来做，而给总统的备忘录、选择草案都由格林斯潘主持起草和转呈，使各机构、各部门的要求都能得到比较平衡的体现。这个委员会居然一下子显示出了效率和权威，它召集起会议来，相关部委都乐于参加。

经济政策委员会的14名成员有点像经济小内阁，包括了除联邦司法部长之外的所有内阁成员，甚至还包括主持外交事务的国务卿基辛格。刚成立时每月开一次会，4个月后，大约每年在一起开3至4次会，主要讨论一些长远战略性的课题和发展趋势。

经济政策委员会的实际工作，都是由该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来推动。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最初有5人：西蒙、塞德曼、格林斯潘，还加上白宫预算与管理局长罗伊·阿什，特别贸易谈判代表和国际经济政策委员会执行主任威廉·埃伯利——本来还应加上基辛格，但这位国务卿到处进行穿梭外交，实在忙得分身乏术，他又另有接触总统以进言的机会，所以就不参加执行委员会会议了。

经济政策委员会中，对于履行所承担的责任最为重要的两人，就是格林斯潘和塞德曼。他俩有个分工：格林斯潘为总统提供各种主要的经济指标、数据，同时还要提供他本人对这些指标的动态分析；塞德曼则通过经济政策委员会的周报、备忘录，为福特提供每日进展。大凡外贸进出口额、企业界

或劳工领袖的讲话摘要、有可能发生的工潮和市场波动，重要劳资谈判的进展以及纽约的金融股市，等等，都得在他们统揽全局的思谋之中。

从战略全局来衡量，对福特政府的经济政策影响最为深刻的人物，公认还得数格林斯潘。但是，他与尼克松时期的两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麦克拉肯和斯坦利不同，他宁愿采取“低姿态”，躲在幕后运筹帷幄。他与西蒙和塞德曼这两位同事，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他与西蒙有些经济政策上的观点分歧，但俩人的身世有很多共同之处：格林斯潘的父亲是股票经纪人，西蒙的父亲则是一个保险经纪人；格林斯潘主持过咨询公司，在金融界声名鹊起，西蒙当过华尔街维登经纪公司的副总裁、萨罗蒙兄弟公司的合伙人，有“最精明的证券商”声誉。在根本性的保守主义哲学方面，俩人有很多共同语言，所以分歧归分歧，并不妨碍他们俩人的交情。

尽管他可能是最为保守的一个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但是连那些以自由主义著称的各届前任主管也都承认，他们对格林斯潘在政府中所起的作用表示敬佩。

无意间造成福特竞选连任失利

要预测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就必须正确判断形势。而这谈何容易！由于信息来源、理论流派和利益等多种原因，在最高决策圈中对经济走势和应该采取的对策，常常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互不相让。如果遇到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二者并存——经济学上有一个名词称之为“滞胀”——就让人拿不定主意该重点对付哪一个。例如，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经济政策，就为70年代中期进入“滞胀”埋下伏笔，弄得足有十年左右，美国经济举步维艰，尼克松、福特等几届总统都为之大伤脑筋。但许多美国经济学杂志在回顾这一段岁月时，都肯定是格林斯潘别具慧眼，从蛛丝马迹中看出了经济将陷入衰退，他估计到了人们在经济衰退中的心理，甚至也正确地预测了复苏的时间。当现实的发展一一验证了他的推测，当然更加重了他在福特心目中的分量。

有人认为，格林斯潘在福特政府中的活动，远远超出了起研究和预测作用，而具有了奠定理论基础的功能。

不过，格林斯潘始料未及的是，他在无意之间也造成了福特的失败。

1975年，格林斯潘劝福特减税，以帮助国家走出严重的经济衰退。然而当减税造成的经济勃发于1976年放缓下来时，格林斯潘却认为经济很快会自我调节，建议福特“无为而治”，不要再采取任何行动。尽管他确实有先见之明，到年底时经济确实反弹回升了，验证了他关于政府应该尽量减少干预经济的一贯立场；但福特总统在经济发展缓慢时期的“无所作为”，还是导致了美国公众质疑他的领导能力。据一些观察家的意见，很可能正是这一点，造成了他竞选的失败。

然而，即使格林斯潘真是导致福特失败的“罪魁祸首”，至少福特对此并没有一丝怨言。在福特回忆录《康复的时代》一书里，对格林斯潘在经济上的作用大加赞扬，口气也十分亲密：“在采取何种特殊步骤支持经济的问题上，我极为幸运地有聪明绝伦的如格林斯潘和伯恩斯等人做我的顾问。格林斯潘是个轻声慢语的单身汉，他到华盛顿是来接替赫伯特·斯特恩原来担任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一职的。他从小在纽约长大，与基辛格上同一所高

中，那时候他想当一个音乐家，还随着乐队到处去演出。后来他上了纽约大学，成为令经济学家刮目相看的人物，还办了一家极为成功的顾问公司。他本人不愿意进入政府，只因为黑格以国家需要他为理由，说服了他。我很快就开始欣赏他的顾问能力了。没有人比他更有能力把坐在一起开会的人们的观点归纳总结出来，然后给我列出所有可以采取的办法。

“对于一个大半时间都关在象牙塔里，坐在沉重的桌旁，对经济趋势进行统计和预测的人来说，格林斯潘在把握公众意见方面具有不可思议的本领。他确信广大美国人对通货膨胀比对失业问题更关心，他认为，公众在内心深处，对国会山那些关于要他们掏钱的‘联邦计划’的宣传，是不买账的。当我处在增加经费、促进什么计划的压力之下的时候，或是他觉得我可能受政治因素影响的时候，他都会提醒我：别出线。他一般都能说服我——因为他是正确的。”

格林斯潘是谁的代言人

参与决策使得福特政府降低通货膨胀获得成功，是格林斯潘身为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最耀眼的表现，大受好评；但他还有一次“耀眼表现”，却大受挞伐。

那是由他在上任不久的一次政府会议上所讲的一句话引起的：“大家都受了通货膨胀的害。如果你想看看谁受害最重，那就是华尔街的经纪人。”

华尔街的经纪人受通货膨胀的害“最重”？顿时舆论哗然。

格林斯潘的本意是说，股票经纪人因为通货膨胀的打击所失去的收入，其绝对金额要多于本来家财就少的穷人所失去的收入，后者损失一千两万美元，前者可能损失十万二十万。这当然也是实情，但是通货膨胀造成的危害，对富人来说，是“锦上添花”，对穷人来说，则是“雪中减炭”，二者怎么能相比？这反映出格林斯潘在感情深处与谁亲、与谁远。舆论纷纷指责说，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竟作如此评论，“表现出他缺乏对下情的体恤”。

格林斯潘认识到自己的说法得罪了許多人，后来就改了口说：“很显然，穷人是受害最多的。”

1977年元月，民主党籍的吉米·卡特就任总统，他要用他的人，推行他的治国方略。“前朝旧臣”格林斯潘“解甲归田”，离开华盛顿，返回了自己在纽约的咨询公司。

这一段首都的政坛生涯虽然没有让他挣到什么大钱，却让他挣到了政治资本和社会声望。他在此时建立的广泛丰厚的人脉关系，为他日后在共和党人重返白宫时又重返政坛，埋下了坚实的铺垫。

回到纽约后，格林斯潘继续扩大他的公众影响。他活跃于大众媒体之间，频频接受电视台的采访，并到各处进行讲演。而且就在这一年，他在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学业24年之后，终于完成了学业，戴上了纽约大学经济学博士帽，名片上可以堂堂皇皇地印上“格林斯潘博士”了。

他的这一博士头衔当然是实实在在的。摆脱了繁忙的政务之后，他有了机会仔细审视美国货币政策，系统地整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成套思路。他认为，过去的货币主义的贡献是：强调了实际利率和名义利率的区别，在政策行为以及它们对经济的滞后影响方面有独到的见解，等等。但是，这一套货币主义不能解决中央银行内部的争论：究竟哪一种货币总量目标是最重要

的，或者说，货币政策调控的目标究竟应该是什么？格林斯潘认为，联储会传统的控制联邦借贷利率的做法，会增加金融市场的不稳定。但他并不能肯定，是否改成以控制准备金就能改善货币政策——这一点，他后来在当上联储会主席时，曾经在实践中探索过把准备金作为控制目标。

另外，他还认为，货币需求的不稳定是由于不能测定货币的周转速度，因此单独控制货币总量是危险的。中央银行应该根据经济失衡的具体情况来调整政策。

重返首都政坛

光阴荏苒。1980年，又到了大选之年。

非常“平民化”，甚至被称为“花生总统”的卡特，其施政耀眼处在于外交，中国人会记得是在他的任期内实现了中美正式恢复邦交。但是他在经济内政上却乏善可陈。大选之年，共和党对手罗纳德·里根提出了著名的竞选口号：“你比四年前过得好吗？”“美国人在世界上还受人尊敬吗？”这一下使卡特招架不住，也大大推动了美国民众的情绪向保守主义一端摇摆过去。

在推选总统候选人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一些党员曾经力促里根选择前总统福特为他的竞选伙伴，对福特了解甚深的格林斯潘也是其中之一。但是在里根后来否定了福特做搭档，而选择了乔治·布什之后，格林斯潘还是投了支持票。

1981年，卡特下台，里根上台，格林斯潘有了重返首都政坛的机会。

与卡特相比，好莱坞电影演员出身、以“伟大的演说家”著称的里根对经济更是一窍不通。他在竞选期间得到供应学派的支持，在执掌白宫之后，就任命了供应学派的主要人物斯托克曼作为主要经济顾问。他请格林斯潘重新出山，从这一年至1983年，格林斯潘在里根政府里，担任了国家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主席。

1982年1月7日，在白宫对面的布莱尔饭店，举行了一次研究经济形势的会议，里根总统和布什副总统，以及国务卿、财政部长、经济顾问等政要都出席了。格林斯潘在会上发表了对经济形势的看法，他的长处是注重事实、数据和经验证据，这恰好是供应学派之短。他的这次发言，后来被人形容为言辞“犀利与简洁”。不过后来当他回答别人的质询时，显得含糊——其实他是习惯了回答实质性问题时在语言上兜圈子。这次会议上格林斯潘强调说：利率不是由联储会而是“由市场力量确定的”，由此引起了与会者对当时的联储会主席沃尔克实行的金融政策的议论。

以他这样的学历和资历背景接受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主席这一职务，在中国人看来，好像跳了行——这不是他熟悉得像自己手心纹路的经济领域。但须知社会保障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他之所以被任命，正是因为总统在这个领域出了重大麻烦。

里根上任伊始，就在斯托克曼的劝说下，鉴于当时联邦政府债台高筑，要削减政府预算，决定对保险福利这一块也动刀斧。他的打算削减10%的计划刚一公布，立即掀起轩然大波，《华尔街邮报》发表大卫·布罗德的评论说：“里根做了任何前任不敢做的事——极力要求国会从最受珍爱、得到最广泛支持的福利计划中切下一大块来。”国会怎敢做这样得罪选民的事！民

主党议员们兴高采烈，抓住机会极力攻击，众议院议长称里根的计划是“可鄙”的；而本阵营的共和党却备感被动，如坐针毡，反过头来也大肆指责白宫的设想简直不合时宜，声称“共和党不支持这一计划”。两党都反对，事情就无可挽回了，1981年5月20日，这一议案被否决。后来评论家分析说，里根提出的社会保障改革建议，是“里根国内政策的主要失误，它是一个由斯托克曼等人做出的政治上有极大错误的判断”。

虽然里根后来毕竟从这场政治惨败中恢复了元气，但是他不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联邦预算的这一地盘轻举妄动了。然而，不敢动手术，病灶依然存在，社会保障体系由于入不敷出而接近崩溃边缘，一天比一天更为严重，拖到病入膏肓来个总爆发更不得了。里根在1981年12月任命格林斯潘来主持这一工作，就是需要借重这位理财高手来“妙手回春”。他领导为总统、众议院议长、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所物色的15位委员，负责对整个联邦社会保障体系提出改革方案。

我们都记得，格林斯潘在兰德的杂志1966年7月号上，指斥由政府推行的社会福利制度，“只不过是政府没收社会成员财富的一条途径”。这个问题也正涉及美国的两大党——共和党和民主党政策的基本分歧之一。民主党主张从社会公平着眼，加强政府对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权力，增加对富人的税收，收上钱来后增加对穷人和弱势族群的福利照顾，缓解贫富对立；共和党人则认为，福利照顾大多会鼓励懒人，收税太多会抑制竞争和进步，这正是对勤奋工作、创业成功者的不公平，因此主张政府应尽量减少干预，少收税，也减少福利。格林斯潘所长期信奉的正是共和党人的理念。

十多年后，格林斯潘延续的仍然是这一思路。但鉴于削减社会福利议案惨遭滑铁卢的教训，格林斯潘当然不能再次去碰这一硬钉子。斯托克曼忽视了政治限度许可，越过了民众所能接受的临界点；那么格林斯潘就要去探寻既能够贯彻总统本人也是他自己遵循的理念，又照顾到实际可操作性的中庸之道。

格林斯潘在钢丝上行走，领导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绞尽脑汁提出了改革方案，总的策略是妥协：增税开源与“细水长流”并举。他们建议：分两阶段增收雇主和雇员的收入税；逐步提高退休年龄，到2027年变为67岁；延缓退休者生活津贴上涨的幅度。这些措施，节约了1650亿美元的开支，被认为“能够确保了社会保障体系在此后25年收支平衡”，运行正常。实际上，这不过是采取一些权宜之计，将迫在眉睫的危机推迟到日后，由下一辈人去操心，问题并没有真正从根本上解决。但是他所主导下拟订的整个方案，被国会所基本上接受。这使里根大为高兴，他相信自己正视并且解决了这个令人头疼不已的难题。当然，格林斯潘作为经济的行家里手，除了更得里根信任，也树立了他在社会保障预算领域的权威地位。

格林斯潘与里根总统毕竟是同党，基本理念一致，对里根任内采取的大幅度削减预算之举大加赞扬，他曾经说过：“我们所有在华盛顿干过的人，都说成功率只有1%的事情，这个政府做成了。”

格林斯潘还被里根任命为经济决策顾问委员会主席。80年代早期和中期，格林斯潘在社会上也相当活跃。他到各地去讲演，还同时担任了好几家大企业的董事。1985年，为了给苹果二型电脑促销，他曾出现在电视和杂志的广告上。在此之前，他同几个朋友合伙，还建立过一家理财公司，不过由于没有吸引到足够的客户，于1987年又解散了。

第五章 二加二等于几？

【格林斯潘早上泡在热气腾腾的浴缸里的两个小时是他效率最高的时间。他的智商，在早上6点时，比下午6点时，要高出20点。他要大量阅读的，并不只是经济分析报告，还有政治和社会情况的报告】

拘谨其外 热情其内

有一次，格林斯潘在和老朋友一起打高尔夫球的时候，讲了一个笑话：一个精神病院里的3个病人要求出院。心理医生对他们进行测试，问了一个问题：二加二等于几？第一个病人回答，等于五。第二个病人回答，等于星期三。第三个病人回答，等于四。头两个病人被送回病房，第三个病人被允许出院。医生在这个病人要走的时候顺口问了他一句：你怎么知道答案的？病人答：这还不容易？把五加上星期三就是了。

这是一个老掉牙的笑话了，简单又直白，但它很可以说明格林斯潘其人：第一他对数字极感兴趣，第二他根本不是个刻板的人。

格林斯潘极少在公众场合刻薄人。尽管他的智慧和成就都是超出常人的，你却看不到他有傲慢无理的时候，不论是对部下，还是对记者，他几乎从来没有表现出优越感或是不耐烦。相反，他总是令他面对的人感到无拘无束。大家看到的，是一个说话和气，天性安静，喜欢思考的格林斯潘，不熟悉他的人会认为他拘谨得近乎羞涩，但深入一点与他交往，就会发现他一点也不乏味沉闷，时常妙语连珠。他也是个雄心勃勃、非常自信的人，不论是和总统坐在一起，还是面对国会的听证，他都不会有任何不自在。他可以轻松地与各种人闲聊，不论对方是外国大亨，还是在华盛顿或纽约炙手可热的名流。

格林斯潘更不是个孤僻、古怪的老头，或不近人情的“工作狂”。说起来，他这样类型的人，对于成熟的有头脑的知识女性，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格林斯潘与画家琼·米切尔仅仅1年的短暂婚姻宣告破裂后，40多年里，他由青年而至老年，一直是个单身汉。

格林斯潘的生活中，出现过不止一个聪明的女人。他的母亲是头一个，影响了他的心灵的兰德也是一个。这都是前辈，而他交往的同辈朋友中，也不乏女强人、女名人。

在担任福特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1974年，格林斯潘与美国头牌电视新闻女主播芭芭拉·华特丝(Barbara Walters)交往密切，走得很近。

芭芭拉·华特丝

华特丝不算天生丽质，却聪明过人，更是一个犀利的、雄心勃勃、具有进攻性的女性。她比格林斯潘小3岁，1929年9月25日，出生于一个在纽约和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开设了数家夜总会的老板的家庭。她在萨拉·劳伦斯学院英语专业毕业后，很快进入全国广播公司(NBC)下属电视台SNBT广告宣传部，为各种节目写新闻。在这个行业一路飞升，大红大紫。

华特丝创造了电视新闻史上许许多多的“第一”。她是新闻节目的第一

个女主播——70年代为NBC在“今天”(Today)节目当联合主播之一；她是第一个年薪达到百万美元的女电视新闻记者；她也是第一个拥有自己特别新闻节目的女主播。现在，华特丝虽然年近70，仍然处于她事业的最高峰：每星期五晚上的“20/20”节目，融新闻与娱乐为一体，集传播资讯和解颐舒闷于一身，具有名列前茅的收视率和无可争议的权威性——这是数年来一直在新闻杂志节目中收视率最高的节目；她在自己主持的特别节目中，一星期进行两次引人注目的采访，她采访过的名单，堪称一份国际名人录，不论采访谁，都被对方引以为荣。

华特丝结过3次婚，第一次婚姻比格林斯潘初次结婚也要晚三年，那是1955年5月1日。家庭建立了，可华特丝实在不想扮演50年代妻子的传统角色，当一个家庭里的贤妻良母，她还是想出去创立自己的事业。这段婚姻结束于1958年。从一个细节可以看出华特丝慧剑斩情丝，快刀斩乱麻的性格：办离婚就要办得利索，俩人各雇了律师，协议离婚，她选择了在美国离婚最容易、最快、最便宜的地方办理手续——亚拉巴马州。

后来她又结过两次婚，但都以失败而告终。认识格林斯潘的时候，正是她还没有从第二次婚姻失败的打击中完全恢复过来的时候。她和格林斯潘之间的交往似乎没有深到论及婚嫁的程度，但是显然彼此非常默契。华特丝后来说：“我们保持相会一直到我(第三次)结婚。而且我们一直还是好朋友。”

华特丝很乐于回答关于与格林斯潘关系的问题。用她的话说，格林斯潘“其实是个非常可爱和善良的人。我从来没听见他提高过嗓门，他耐心到极点”。她还描绘说：“他这个人有那么点儿心不在焉……他不是太急于表示热情，但是完全值得信任……他这个人其实一点不可怕，是个轻声慢语，很祥和的人……他自己说着话就会笑自己。我从来没有听到他打断过别人。不与任何人为敌。”对这一点，格林斯潘的其他朋友也都有同感：极个别场合他可能会恼怒，但当众失态发脾气，是从来没有过的。

女主人登场

对格林斯潘后半生影响最重要的女性，是80年代初出现的。

当时格林斯潘正担任里根政府的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主席。有一天，他接到NBC驻白宫记者安德丽·米切尔(Andrea Mitchell)的电话——又是一个米切尔。她奉命邀请格林斯潘主席谈谈“社会安全福利金”的问题，俩人头一次交谈，完全是为公事，但谈得很投机。

安德丽·米切尔是NBC以厉害著称的外交事务记者，她比格林斯潘小整整20岁，当时为36岁。米切尔也曾结过婚，但是早在70年代就离了婚。

俩人就这么相识了。两年之后，他们开始约会。第一次约会，是1984年12月的一个晚上，俩人在纽约的一家餐厅共进晚餐。

不过，俩人的感情并没有急速升温，并不显得十分火热。据毛为所著《格林斯潘》一书中介绍，其原因是格林斯潘说话含含糊糊，让米切尔摸不着头脑，不知他到底对自己是一种什么感觉。

两年之后，他们才开始比较认真地交往起来。1987年，他们开始一道在白宫的晚宴上共同露面——那时格林斯潘已经名气更响、权位更高了。从那以后，他们在华盛顿社交圈里开始频频出双入对。

朋友们都说，他们俩人配得十分合适。格林斯潘对女性很有好感，第一

次婚姻并没有使他对女性产生偏见，他从不以偏概全，贬低她们的价值。他对米切尔（此后除特别注明外，凡米切尔均指安德丽·米切尔）的影响，从米切尔的同事说的话可见一斑：“不论米切尔平时工作中多么咄咄逼人、铁面无私，只要格林斯潘打来的电话一响，她顿时就变成一个欢快的小妇人。”

米切尔对格林斯潘的优点也十分肯定：“艾伦的一个长处是，他与人都是面对面交往，从不在人背后捣鬼。他从知识上、情感上都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他对我做的一切总是兴趣盎然，他和我交换各自的想法……他是我认识的人中，最不傲慢、最没有优越感的人。”

只有一次俩人发生了不愉快。那次是格林斯潘第二次被提名连任联储会主席的头一天晚上，他正与米切尔设晚宴招待客人，克林顿总统打来电话找格林斯潘，邀请他们参加另一个晚宴，令米切尔感到十分扫兴。

格林斯潘素有“冷面机智”的名声，时时表现出一种令人喷饭的幽默感。有一次，在米切尔位于乔治城的家中，格林斯潘应邀来参加华盛顿上流社会的晚宴，有位新来者问格林斯潘：“华盛顿真诚的人都在哪儿？”格林斯潘眼睛盯着盘子里的羊肉，头也没抬地说：“根本就没有一个。”他的太太很欣赏他这种讽刺性幽默感：“他很喜欢一语双关。你必须能领悟双关意思才听得懂。”

格林斯潘面对批评，通常是毫不介意，据米切尔说，他甚至收集所有讽刺他的漫画。“对于出自政治原因对他进行的攻击，他是不会拿来自寻烦恼的。”格林斯潘是个保守的共和党人，他却可以与最著名的民主党人建立良好的友谊。

当然，两个人也是有他们截然不同之处。

米切尔是在一个宗教气氛很浓的环境里长大的；格林斯潘则什么宗教也不信仰，可他心中自有很强烈的道德规范。

还有饮食上的差异。格林斯潘虽说被批评为对下情体恤不够，但对吃东西表现得相当平民化，他没有很大的兴趣去讲究美味——他很贪吃，却不是美食家，对他来讲，似乎法式大菜还不及土豆泥更合胃口呢。

而米切尔就不同了，她喜欢讲究的食物。在一起的时候，都是她来“巧手调羹汤”。但是格林斯潘对饭菜好坏都无所谓，好也吃不出来，坏也吃不出来，弄得她“都忘了精美菜肴怎么做了”。

不过，格林斯潘也不是对口腹之乐完全不感兴趣，米切尔说，他早晨煮咖啡煮得相当棒呢。

白宫网球新星

格林斯潘对自己的体重问题很看重。前两年，他觉得需要减轻点重量了，便开始减肥，结果真的颇见成效，减掉了20磅之多。有了自己的亲身成功经历，他站在当时减肥大见成效也引人大加挞伐的杰拉尔德·科内嘉一边，为他辩护。格林斯潘现身说法，得意扬扬地抓着肥出来的衣服，向别人展示他“看得见摸得着”的减肥成果。有人便问他，要不要给他推荐个好裁缝，把衣服改一改。

“干吗？”他回答，“失去可以吹牛的权利？”

格林斯潘在家里，并没有哪个固定地方是他喜欢坐进去工作的。要说有，那就是他卫生间里的浴缸。他每天5点半起床，先要在浴缸里泡两个小时。

这个习惯其来有自：是 25 年前，他的医生为治疗他的背疼而提出的办法。格林斯潘发现，泡在热气腾腾的水里，不仅是肌肉放松，而且思路敏捷——而医生则为这种说法提供了科学依据，说热水能够使大脑血管扩张，加快血液循环。

这两个小时是他最出活儿的时间：他在这里构思数不清的备忘录和报告。格林斯潘告诉朋友说，他的智商，在早上 6 点时，比下午 6 点时，要高出 20 点。据米切尔说，他在浴缸里阅读各种数据图表，然后常常带着他那些湿淋淋的讲稿去上班，“联储会的无名英雄，其实是那个非得看懂他那些被水泡过的潦草字迹不可的助手”。

格林斯潘从小喜欢运动，闲暇时喜欢看棒球比赛，爱打网球和高尔夫球。白宫的网球场，向来是权力游戏的场所，是巩固盟友感情、加强人脉联系的地方。格林斯潘刚进入华盛顿政界的时候，网球打得并不怎么样，但是他很快就大大提高了水平，让人刮目相看了。

他在福特总统手下工作的搭档兼球友塞德曼回忆说，在福特时代，格林斯潘刚来首都的时候，都不知道该用球拍的哪一面。他看到网球在白宫圈子周围很盛行，便苦练球技。等到格林斯潘又回来当联储会主席的时候，塞德曼看到有人排列出了一支网球队伍的名单：“贝克，布什，格林斯潘，我，等等。我吃惊不小，老天！看这一组名单——这是打网球的人吗！格林斯潘？！他在这里干什么？”“显然，这八九年时间，他的球艺可是长进太大了。”

格林斯潘对此也时有自嘲，有一次他对朋友们说，“1974 年，我年纪一把了，才在白宫网球场真正开始打网球，自那以后我一直在苦练，提高我的球艺，一年年下来，我已经提高好多啦。照我的推断，到了 104 岁的时候，我可以加入职业网球队啦。”

天时·地利·人和

网球技艺的增进，可以从一个侧面微妙地透露出，格林斯潘在政治上的企图心。

格林斯潘坐在热气弥漫的浴缸里要大量阅读的，并不只是经济分析报告，还有政治和社会情况的报告。除了他经济上的奇才，他对参与种种政治方面的运作，具有很敏锐的见识，他能滔滔不绝、胸有成竹地讨论政治和社会方面的问题，这使他显得与其他经济学家十分不同，具有更宽广的视野和更深邃的思考。

格林斯潘离联储会主席的位置越来越接近了。

人们曾说过，保罗·沃尔克（1979 年至 1987 年任联储会主席）“天生就是”当联储会主席的料，但没太听到有人这么说格林斯潘。

没有人生来就注定当联储会主席，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没有谁是“偶然碰巧”坐上这把交椅。这个担子，不会落到一个只是安安静静地等待着的肩膀上。只是埋头搞经济预测，或是学术研究，即便是一个再有成就、再受尊敬的经济学家，或是一个市场上再百战百胜的成功者，都是远远不够的——他永远也当不上联储会主席。

他一定得有“野心”，要为争到这个对于美国经济举足轻重的位置而展开竞争——但又得讲究技巧，不能过于赤裸裸。就像所有权力场上的运作一样，格林斯潘得与所有前任们一样，在“适当的时间”、用“适当的方法”、

认识“适当的人物”、朝着“适当的方向”迈进——自然，还得在一个“适当的时机”。

他得拥有必要的政治、社会资源，包括他积累的知识、经验、过往的功绩及获得的名望……一旦联储会主席职位空缺，别人才会不约而同想到只有此人才是众望所归。这些，格林斯潘幸好全都具备。他使人相信在一旦危机到来，需要一整套应对措施的时候，政府遇到各种复杂矛盾、政策需要协调的时候，或者在新的经济形势发展下，法规法律需要豁免或修改的时候，他能够迅速地、有效地采取行动。

格林斯潘能在事业上步步攀升，大有作为，他个人的先天资质和后天努力固然至关重要，但不能不说，他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在东西两大阵营长达40年冷战的后期，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在社会矛盾暴露得越来越明显，一个又一个国家陷入困境，被迫不同程度地实行改革，但是成效并不显著，而其改革的路向，恰恰又是向资本主义竞争对手借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这使许多人相信：资本主义有比过去人们所认为的更充沛的内在潜力和自我调节修正的能力。美国经济发展尽管有波折起伏，也有内在隐忧，但总的来看，还是在盘旋上升。到80年代中期，除了日本让美国感到是经济上一个咄咄逼人的竞争者，有时穷于应付外，并没有真正值得担心的难题。而美国又处在格林斯潘所属的共和党的政策稳占上风的年代，民主党除了卡特总统的一届短暂任期，再没有能入主白宫。

地利：格林斯潘这大半生基本上活动舞台就是在纽约，其次是在华盛顿。他对纽约的一切可以说滚瓜烂熟，而纽约正是美国经济中心，是美国乃至全球的金融首都。什么信息该找谁能一问就准，办什么事找谁可以事半功倍，他心里都有一本账。

人和：格林斯潘三十多年来的工作，使他与经济学术界、金融界、政界……都有了全方位的大量接触。他深受几任总统的信任，深受前联储会主席伯恩斯的器重，在华尔街各家公司，在华盛顿各个政府机构，甚至在海外各个国家的同行，有极多知交。

其中尤其重要的是他与伯恩斯的友谊，使他对于联储会的工作早就不陌生：在这方面，没有几个人能比他知道得更多。对于如何负起制定美国货币政策的职责，格林斯潘感到心中有数。当了这么多年的经济顾问，与各大公司、各个行业的数据打了这么多年交道，使他对整个美国经济体系，可以说是洞若观火。他甚至还自信他对这个国家政治体系的运作，也具有相当程度的把握。

总统是不会“任命一个从来对华尔街没有号召力的人”来当联储会主席的。

1987年，水到渠成，格林斯潘受里根总统提名，出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什么事都得付出代价。或许，对于格林斯潘来讲，当上联储会主席后“最惨重”的代价，是他不再有任何精力去兼管他经营得非常成功的汤森—格林斯潘公司了。格林斯潘只好忍痛宣布出让，希望有行家能够来接手。然而，由于在规定期限内，没有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买主，格林斯潘无可奈何，最后只好关闭了自己的公司。

中篇
经济“卡桑德拉”
(1987年—1907年)

格林斯潘很珍爱用镜框镶着的一张漫画，把他画成希腊神话中特洛伊那个能预卜吉凶的公主卡桑德拉的形象，举着一条预言：“末日将至”

Alan Greenspan: A Biography

第六章 金元大迷宫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是超级金元帝国中枢的巨大迷宫。格林斯潘成为这一迷宫中最新一尊金融之神】

美国的中央银行

人们常常提到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会”又译作“董事会”，简称为“联储会”），是个让其他国家读者往往摸不着头脑的机构。尤其是有时中文译作“联邦储备局”，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物资总局”、“储运仓库”什么的。实际上，它是“联邦储备体系”（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中文又译作“联邦储备中央银行”或简称“联储央行”）的首脑机构。美国中央银行挂出的就是这个招牌——美国并没有一个叫做“中央银行”的机构，承担着美国中央银行重任的，正是“联邦储备体系”。美国人也同样图省事，“联邦储备体系”这么个长长的名称，他们叫来也觉拗口，在美国的报刊上，常常被习惯性地简称为“The fed”。

联储会在首都华盛顿的大本营，设在宪法大道（Constitution Avenue）和第20街交接处，两座大楼，分别以两位著名的联储会主席名字命名，一座叫马瑞纳·伊寇斯大楼，一座叫威廉·迈克切斯内·马丁大楼。

宪法大道是政府各部门云集的一条大道，联储会东边12街上有国税局，13街上是劳工部，再向北就是白宫，而19街上有内政部；联储会的西边22街上是美国国务院。在宪法大道上，国家美术馆、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和美国历史博物馆等几个著名的国家博物馆巍然矗立，高耸入云的华盛顿纪念碑也在这条大道的西侧。每年春季，大路两边的樱花怒放，如霞如云，是首都的一大胜景。

人们说美国是超级金元帝国，而联邦储备体系即中央银行体系，就是这个帝国中枢的巨大迷宫：里面楼阁密如麻，路径连成网，望之令人头晕，入之令人目迷。金元的洪涛在这儿以各种天文数字的规模喷涌、翻卷，集聚而后四散奔流……

比起欧洲古老国家来，美国中央银行体系从年龄上说，只是个小弟弟。这个体系是美国国会于1913年建立的。本来宪法授予国会铸币和调节货币的权力，但国会把这一权力转让给了联储会，旨在为全美国“提供一个更安全、更稳定、适应能力更强的货币金融体系”。联储会，是“银行的银行”。

按照联邦储备体系在互联网上的主页（homepage）中的介绍，作为中央银行，共有4大职能：

一、通过在经济中影响货币和信用的环境，来实施国家的货币政策，以达到最高程度的就业率，和稳定的价格。

二、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督和管理，以确保国家财政金融体系的安全和可靠，并保护消费者的信贷权益。

三、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控制金融市场上可能会出现的体系性的风险。

四、为美国政府、美国公众、美国金融机构以及外国官方机构提供一定的金融服务，包括在国家的支付体系中扮演主要角色。

控制美国经济的水龙头

以上的说法，多少有点学院气。简单地说，这个机构的任务，是决定国家的金融政策，通过3种方式来控制货币供应量和信贷。第一，提高或降低联邦储备体系中储备金的百分比，对经济领域中某些方面紧缩银根，某些方面放松银根，来调节经济运行的方向；第二，通过提高或降低联邦储备体系中银行或其他债务人的借款利率来操纵信贷；第三，开放的市场交易：联邦储备体系通过其下属的联邦开放市场委员会，买卖政府汇票与银行承兑票据，以此来管制经济。

联储会有调整贷款短期性利率的权力——这个权力可是非同小可，通货膨胀的幅度和股市价格的升落全都受之左右。打一个比喻，联储会是以贷款利率（借钱给所属成员银行的利息），作为“总闸门”或者说“水龙头”：时而拧松（调低利率），时而拧紧（调高利率），拧松以防止经济衰退，拧紧以阻遏通货膨胀。换一个比喻，调低利率，好比踩油门；调高利率，好比踩刹车，由此对美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进行间接控制。

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因为一旦它宣布提高对会员银行的贷款利率，各会员银行就会相应地提高他们借钱给公司、企业的利率，从而影响到各行各业的企业从事经济活动的运行效益。

从根本上说，所有的企业都必须通过向银行借钱才能发展，如果利率低，借钱就是个很便宜的事，企业家何乐而不为去借一笔款子来扩大企业规模，增强公司实力？这样一来企业成长步调加快，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也就猛踩油门，但通货膨胀的压力也就随之加剧。相反，如果利率偏高，企业家们借起钱来就不那么痛快了，其行为趋于谨慎，得左盘算右权衡贷款是否合算，自己是否有还债的承受能力，这样一来企业成长步调减缓，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也就好比轻踩了刹车，但通货膨胀的压力也就随之减轻。

提高或减低利率还会影响到证券市场的生态，使金融市场相应做出调节：利率相对高一些，会使其他种类的投资，比如债券和银行存款，对社会上的游资相对增强吸引力，使投资人提高把钞票投放于彼的兴趣，这就会造成股票失宠，股市自然也就下降。

联储会通过买卖政府短期债券，来影响利率。这其中的出入，最终会转嫁到借贷人，影响消费贷款，房屋贷款，和企业筹资。

联储会拥有这个权力，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美国经济是显而易见的，而他们责任之重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认为经济衰退的时候，联储会便下令降低利率，促使经济更快地复苏、成长；而在认为经济成长过快，有引起通货膨胀，也就是物价上升危险的时候，联储会便下令提高利率，以放慢经济的发展速度。而他们绞尽脑汁要做到的，正是要在两个互相限制的条件下做到两全其美：使利率定得恰到好处，“水龙头”拧得不紧不松，增之一分则太紧，减之一分则太松，既能有效阻遏通货膨胀，又能成功避免经济衰退。实际上，联储会每次调整利率，往往就是提高或者降低四分之一个百分点或者半个百分点。

从格林斯潘进入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生涯看，他最主要的精力是花在对付通货膨胀上。但正如他1998年4月29日于芝加哥在美国经济协会和美国金融协会发表演讲时所说，避免一般物价下降物价即通货紧缩，是也有“正当理由的”。因为即使物价跌幅不大，也会损害经济。他说：“跟通货膨胀

一样，通货紧缩也会使资源分配失常，导致经济无法发挥全面潜能。”

手握重权的天王们

80多年来，联邦储备委员会在美国的金融和经济中所扮演的这一“控制水龙头松紧”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然而，正如我们上面所说，要想松紧拧得毫厘不差，不是凭联储会主席口含天宪，随心所欲，信口一说的，而是有赖于整个庞大的联邦储备体系的周密运转。

整个联邦储备体系的结构，可以分成两大部分。

上层首脑机构，自然是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它的主席。

拥有12个地区银行、下辖7000个成员银行、拥有25000名雇员、年预算高达10亿美元的这么个庞然大物——联邦储备体系，其首脑机构联邦储备委员会，由1名主席和6名委员共7名成员组成，全部由总统提名，然后交参议院审议通过，每届委员会的任期为14年，而联储会主席的任期则是4年，但可以连任。

现任联储会委员有如下几人，均为一时之选：

艾伦·格林斯潘，现年72岁，纽约大学经济学博士。1992年2月起，被第二次任命为任期14年的联储会委员。是第三次连任的联储会主席，本届由克林顿总统任命后于1996年6月就职，到2000年6月期满。

爱丽丝·瑞芙林（Alice M. Rivlin），现年67岁，经济学博士，联储会副主席，也是联储会中惟一一位女性成员。她是格林斯潘政策的主要支持者。联储会副主席任期为4年，她1996年上任，2000年6月期满；其联储会委员的任期到2010年。她曾任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1994年至1996年），国会预算办公室主任（1975年至1983年），并曾在哈佛大学任教。

小爱德华·凯利（Edward W. Kelley, Jr.），现年66岁，哈佛商学院毕业，从1987年起担任联储会委员，本届是1990年上任，2004年届满。曾担任休斯顿地区一些工业公司的主席或总裁，先后任过3个银行的行长，以及莱斯大学等学校的校董。

劳伦斯·梅耶（Laurence H. Meyer），现年54岁，耶鲁大学毕业生，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1996年起担任联储会委员，曾任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多年，是全国著名经济预测专家之一，在宏观经济政策问题上，著述颇丰。

小罗杰·法葛森（Roger W. Ferguson, Jr.），他是联储会委员中最年轻的，现年47岁，哈佛大学经济学士，1997年上任，多年为金融机构从事各种研究，并担任哈佛校友会理事。

爱德华·格莱姆里奇（Edward M. Gramlich），现年59岁，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密歇根大学任教多年，担任过经济系主任，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和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在1997年出任联储会委员之前，曾多次就职于联邦政府各部门，同时在宏观经济、预算政策、社会保障以及职业体育中的经济等问题的研究方面，著述颇多。

中枢的中枢

说起来，联储会主席应该算是总统的属下，对总统负责，是每届总统统

率下的政府中的重要成员——尽管这一职务不算是内阁阁员，格林斯潘并无资格去参加白宫召开的内阁会议——他在美国政府中的重要性，仅次于总统，而超过了副总统、国务卿以及国防部长等等。

照这个说法，格林斯潘应该与白宫关系密切，随时请示汇报。然而，事实上，别看格林斯潘办公在华盛顿，他却离白宫“远”，离纽约的华尔街倒是更“近”。联储会最爱标榜的就是“决策不受党派和政府的左右和影响”，联储会主席最受尊崇的行为，是能顶得住来自白宫的压力——换句话说，他们是听从“市场导向”，而不服从“长官意志”。

联邦储备体系中的货币政策制定机构，是“联邦开放市场委员会”（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简称 FOMC）。这个委员会由 12 名拥有投票权的成员组成，其中 8 把交椅，归联邦储备委员会的 7 名成员加上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稳坐，其余 4 把有投票权的交椅，则由除纽约联储银行之外的其余 11 个联储地区银行的行长轮流坐庄，每人坐一年。联储会主席兼任 FOMC 的主席，纽约联储银行行长兼任它的副主席。没有轮到执掌投票权的各区域银行行长，也参加 FOMC 的讨论利率的会议，有发言权。

联邦开放市场委员会每年在首都华盛顿召开 8 次讨论利率的定期例会，并经常召开不定期的特别电话会议。这些会议的任务，是确定联邦储备体系对市场上买卖政府债券的规则，并制定在外汇市场上的运作政策。联邦开放市场委员会通过买卖政府债券来运作，以实现放松或是加强压力。每一次例会，都会审核国家目前的经济状况，来投票决定在下次会议之前这段时间，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可想而知，这些会议上做出什么决策，让投资人眼睛瞪得多大，耳朵竖得多高了！

说来也巧：联邦开放市场委员会的会议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被用做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作战室，在这间房子里，曾制定过盟军在欧洲战场上获得胜利的战略。现在，它竟成了“现代货币战争”的作战室。

每次例会通常有这么几项议程：由主席主持，检讨上次会议所采取行动的备忘录；然后讨论外币的交易；讨论国内开放市场的运行；接下来每个参加会议的成员就经济形势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每年 2 月和 7 月的会议上，还要评估较为长期的货币政策；之后，会议做出对现行的货币政策和国内政策的指令；最后是确定下一次会议的时间。

格林斯潘一仍旧例，兼任联邦开放市场委员会的主席。

迷宫的十二个分殿

联邦储备体系的基层骨干机构，是分布在 12 个大城市，覆盖全美国的 12 个联邦储备地区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s），下辖覆盖全国的 7000 多成员银行。联邦储备地区银行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各银行行长，由该银行董事会任命，再交联邦储备委员会批准，任期为 5 年，可以连任。每个逢 1 和逢 6 年的 2 月底，便是新旧行长交接的日子。联邦储备地区银行的主要功能，是发行钞票、处理汇款、管理美国以及设在美国的外国银行——在必要的时候借钱给他们。

目前联邦储备体系各区域银行覆盖地区及现任行长为：

第一区，波士顿（马萨诸塞州）区域银行。其下没有再设分行，覆盖缅因、马萨诸塞、新罕布什尔、罗德岛和佛蒙特州。现任行长凯西·麦翰（Cathy

E.Minehan), 51岁,是12个区域银行行长中惟一的一位女性,同时正轮值任联邦开放市场委员会委员。

第二区,纽约(纽约州)区域银行。在纽约州的水牛城设有分行,覆盖纽约州、康涅狄格州一个郡(county,一译为“县”)、新泽西州北部12个郡,以及波多黎各和维尔京群岛。现任行长威廉·麦克当诺夫(William J.McDonough),64岁,他同时还在联邦开放市场委员会里任副主席。

第三区,费城(宾夕法尼亚州)区域银行。没有再设分行,覆盖德拉瓦州、新泽西州南部九个郡、以及宾夕法尼亚州东部48个郡。现任行长爱德华·波耶恩(EdwardG.Boehne),58岁。

第四区,克利夫兰(俄亥俄州)区域银行。在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设有分行,覆盖俄亥俄州,肯塔基州东部56个郡,宾夕法尼亚州西部19个郡,和西弗吉尼亚州北部6个郡。现任行长杰里·乔丹(Jerry L.Jordan),57岁,同时正轮值任联邦开放市场委员会委员。

第五区,瑞奇蒙(弗吉尼亚州)区域银行。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和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设有分行,覆盖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和南卡4州,以及西弗吉尼亚的49个郡,和哥伦比亚特区。现任行长小阿尔弗莱德·布劳达斯(J.Alfred Broaddus, Jr.),59岁。

第六区,亚特兰大(佐治亚州)区域银行。在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佛罗里达州的杰克森维尔和迈阿密,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设有分行,覆盖亚拉巴马、佛罗里达和佐治亚州,以及田纳西州东部74个郡,路易斯安那州南部38个郡,和密西西比州南部43个郡。现任行长杰克·盖恩(Jack Guynn),56岁。

第七区,芝加哥(伊利诺斯州)区域银行。在密歇根州的底特律设有分行,覆盖爱荷华州,印第安那州北部68个郡,伊利诺斯州北部50郡,密歇根州南部68个郡,和威斯康星州南部46个郡。现任行长迈克尔·莫斯科(Michael H.Moskow),60岁。

第八区,圣路易(密苏里州)区域银行。在阿肯色州的小石城、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和田纳西州的孟菲斯设有分行,覆盖阿肯色州,伊利诺斯州南部44个郡,印第安那州南部24个郡,肯塔基州西部64个郡,密西西比州北部39个郡,密苏里州中部、东部71个郡和圣路易市,和田纳西州西部21个郡。现任行长威廉·普尔(WilliamPoole),61岁,同时正轮值任联邦开放市场委员会委员。

第九区,明尼亚波里(明尼苏达州)区域银行。在蒙大拿州的赫勒纳设有分行,覆盖明尼苏达、蒙大拿、北达科他和南达科他州,以及密歇根州部分地区和威斯康星州北部26个郡。现任行长加里·司登(Gary H.Stern),54岁。

第十区,堪萨斯城(密苏里州)区域银行。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俄克拉何马州的俄克拉何马市、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设有分行,覆盖科罗拉多、堪萨斯、内布拉斯加、俄克拉何马和怀俄明州,以及密苏里州西部43个郡,和新墨西哥州北部14个郡。现任行长托马斯·霍尼格(Thomas M.Hoenig),52岁,同时正轮值任联邦开放市场委员会委员。

第十一区,达拉斯(得克萨斯州)区域银行。在得克萨斯州的帕索、休斯顿和圣安东尼奥设有分行,覆盖得克萨斯州,以及路易斯安那州北部26个郡,新墨西哥州南部18个郡。现任行长小罗伯特·麦克提尔(Robert

D. McTeer, Jr.) , 56 岁。

第十二区，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州）区域银行。在加州的洛杉矶、俄勒冈州的波特兰、犹他州的盐湖城、和华盛顿州的西雅图设有分行，覆盖阿拉斯加、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夏威夷、爱达荷、内华达、俄勒冈、犹他和华盛顿州，并管辖美属萨摩亚、关岛等。现任行长罗伯特·帕里（Robert T. Parry），是联邦储备体系中的鹰派人物。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

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联邦储备体系中，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是一个地位特殊的地区银行。

说它特殊，不仅由于它是最大的一个地区银行，其行长是 12 个地区银行中，惟一在联邦开放市场委员会里有固定一席的行长；而且，除了所有地区银行共有的那些职能外，纽约储备银行占地理之优势，还负责在美国的证券市场上买卖政府公债，并在国际外汇市场上做买卖，以稳定美元的汇率。

人们还津津乐道：在这座银行大厦地下 5 楼的深处，藏有全世界 60 多个国家中央银行储存于此的 70 万块金砖，价值 1150 亿美元，是全球市场上黄金总量的三分之一。这么一批黄金当然引人垂涎三尺，而成为好莱坞制片人的绝好题材来源，也就不足为奇：美国著名影星布鲁斯·威利斯，就主演过一部出生入死挫败匪徒胆大包天地盗运所有金砖阴谋的惊险电影。

但据报道，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另有一座中心金库，主要储存纸币，设在离纽约 40 分钟车程的地方。金库的大门很平常，往往使人感到出乎意料的是，金库并不是建在地下，第一道门与一般办公楼的旋转门相似，第二道门、第三道门也是如此，只是多了一个不关前一道门，后一道门就不能开的装置。走进金库，映入眼帘的全是绿色的美钞，有的放在玻璃集装箱里，有的散堆在地上，很像一个现代化工厂的车间。宽大的走廊两侧，是各类工作室，彼此全是玻璃墙隔开，工作人员在里面整理商业银行送来的现钞。目前使用的 14 部德国进口的分检机，可以按照钞票的面额分类整理，对于残币或有污痕的纸币也能分辨清楚，并直接粉碎；机器的锐眼甚至能识别假币，将之吐出来，由工作人员再来人工鉴定。整理出一定数量后，机器人就会沿着走廊上设置的专用红色路线，来将其取走，送到牵引机上准备再一次投放市场。

这座金库共有 100 万立方米，分上下两层，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可容纳 4000 亿美元现钞——目前全世界市场上流通的全部美元现钞，这里可以统统接收。本来这里在设计时，是设想全部保密的，但是后来金库建成之后，国内外银行的同行都要求来参观，呼声甚高，于是当局决定开设一个参观金库的旅游项目。在来访者参观完所有流程之后，接待人员会送给每个人一份礼物：一包用透明塑料包起来的碎美钞：据说，在粉碎之前，正好是 10 万美元！

有读者可能注意到，联储会各种职位的任期长短不一，例如整个委员会的任期是 14 年，主席与委员的任期是 4 年——这 4 年的起止期还因人而异，而地区银行行长的任期又是 5 年。为什么不能定得整齐划一呢？其实，如此设计，正是为了保持联邦储备体系业务的稳定性与政策的连续性：将任期定得参差不齐，交替时间就可以错开，避免了一上都上，一下都下，以至于出现政策不能衔接、股市汇市大动荡的严重恶果。

这就是联储会——美国中央银行体系。这套世界上最为严密完备的银行体系，使中国总理朱镕基十分心仪：它不仅有效地监管着世界上最复杂的金融业，还有效地调节着世界上最庞大的经济体。在朱镕基心目中，中国金融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把中国人民银行，建成中国的“联储会”。

金元大迷宫的历届掌门人

联储会主席的权力和影响力是如此之大，可想而知，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坐这把头号交椅的。能被总统提名来担纲的人，定非等闲之辈。我们由远到近一个一个地看过来，联储会历届主席，无一不是全美乃至全球瞩目的出类拔萃之辈。

马瑞纳·伊寇斯（Marriner Eccles），1934年至1948年在任。

马瑞纳·伊寇斯，在当代联储会主席中被有些人评价为得分最高的一位，联储会华盛顿总部两座大楼中，有一座是以他的名字命名。他在位的时间，横跨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前、战中以及战后时期。他在任的所作所为，为其后的历届联储会主席，立下了一个评判的标准。

伊寇斯并没有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这在联储会主席中是绝无仅有的。他的父亲从苏格兰移民来踏上美国土地时，身无分文。但是，伊寇斯的伟大之处在大萧条时期便显露出来。他准确地看出，货币政策不可能在真空中实施。伊寇斯向罗斯福政府提议，在当时情况下，为了使经济摆脱大萧条的阴影，除了积极的货币调节之外，财政刺激，也就是超出税收的开支，也是非不可的。

伊寇斯还对1935年出台《银行法》产生过巨大影响。这个《银行法》的确立，重振了美国银行体系的信心，加强了联储会制定并且实施货币政策的权力。所以有人说，伊寇斯最大的贡献，就是他领导着联储会独立于政府影响之外、不受财政部左右的种种努力。的确，在伊寇斯的影响下，1935年的《银行法》创立了“联邦开放市场委员会”这个重要的经济政策制定机构，白纸黑字地明文规定了“财政部长和货币审计长不得同时成为联储会成员”，这就使白宫无法介入联储会的独立决策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联邦财政部长辛德要求联储会继续锁定利率，伊寇斯针锋相对，认为这种办法确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帮助了财政部调动支援战争的财力，但是并不适用于战后时期。用伊寇斯的话说，它会使联储会成为“一个通货膨胀的引擎”。相比之下，伊寇斯的后任麦凯布就显得软弱得多了。

托马斯·麦凯布（Thomas McCabe），1948年至1951年在任。

托马斯·麦凯布是由杜鲁门总统任命的，他的任期相当短，只有3年，朝鲜战争之后不久就卸任了。人们都觉得他是一个令人愉快、讨人喜欢的人。他曾担任过大公司的领袖，又当过费城联邦储备地区银行的行长，对经济的运作十分懂行。不过，作为联储会主席，人们对他的政绩评价则不太高，尤其在联储会抗衡财政部压力的问题上，麦凯布被视为过于软弱了。当时的财政部长辛德十分强硬，数年一日处心积虑迫使联储会如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样锁定利率，麦凯布与其铁腕前任伊寇斯相比，常常顶不住压力。而伊寇斯虽然不做主席了，仍在联储会里有一席委员之地，名义上退为次要角色，他的威望、资历、魄力，却往往在联储会内部实际上唱主角，足以掩盖身为

主席的麦凯布的光彩了。

小威廉·迈克切斯内·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 Jr., 出生于 1906 年 12 月 17 日, 逝世于 1998 年 7 月 27 日), 1951 年至 1970 年在任, 连任五届。

小威廉·迈克切斯内·马丁, 以预测之谨慎——甚至过分谨慎——著称。他不尚空谈的风格, 使他赢得了从杜鲁门到尼克松历届总统的信任, 先后竟连任了 5 届联储会主席: 1951 年, 他被杜鲁门总统任命, 之后又被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相继任命, 在任时间长达 19 年。马丁被视为一个传奇人物, 他创造了好几项记录: 不仅最长寿(享年 91 岁), 而且担任联储会主席时间也最久; 在他在位期间, 还有一项美国历史上经济上升最长时期的记录: 从 1961 年一直攀升到 1969 年。

小马丁生于密苏里州的圣路易。他的父亲老威廉·迈克切斯内·马丁, 也不是个等闲人物, 堪称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催产婆”之一: 他曾帮助威尔逊总统起草了创办联邦储备体系的法律文件, 后来又担任圣路易联邦储备地区银行行长长达 27 年。

小马丁本人毕业于耶鲁大学。子承父业, 他年仅 31 岁时, 就当了纽约股票交易所所长, 人送外号“华尔街神童”。他当联储会主席时期, 美国进入金融繁荣、经济成长、低失业率、低通胀、生活水平大提高的黄金时代。小马丁的名字之与联邦储备体系的关联, 正如埃德加·胡佛(Edgar Hoover) 之与联邦调查局(FBI) 的关联。1970 年在他退休的时候, 尼克松总统曾高度评价说, 小马丁在如此之长时期内, 对美国经济政策的影响如此之巨大, 是自美国建国以来“很难有人可以相比的”。联储会华盛顿总部的两座大楼, 有一座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1998 年 7 月 27 日, 小马丁以 91 岁高龄去世, 美国各大报刊都发表了或长或短的报道和专论, 对他主持联储会、领导美国经济的功绩大表赞扬。《时代周刊》称他“确定了联邦储备体系作为一个独立实体的存在”; 美联社的报道列举了他如何凭着魅力和机智, 化解了来自国会, 甚至来自总统本人的压力; 《华盛顿邮报》更是洋洋逾千言, 历数小马丁的丰功伟绩, 称他当年“已成为金融谋略和坚挺美元的一个国际象征了”。

亚瑟·伯恩斯(Arthur F. Burns, 出生于 1904 年, 逝世于 1987 年), 1970 年至 1978 年在任。

亚瑟·伯恩斯, 当了八年联储会主席。我们在上篇第二章中曾经介绍过这位美国大名鼎鼎的学者、格林斯潘的恩师兼挚友。他对格林斯潘的脱颖而出, 大有拉拔之功。

这位出生于奥地利的犹太裔当代著名经济学家, 1927 年至 1944 年曾任教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 1944 年至 1959 年, 又曾任教哥伦比亚大学。名师出高徒, 他的门生中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不乏其人, 比如后来当了尼克松和福特总统的经济顾问、曾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米尔顿·弗莱德曼。中国人对这位弗莱德曼也应不陌生, 80 年代他访问过中国时, 与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长谈过, 后来曾经对人感叹, 中国领导人是共产国家领导人中“最懂市场经济”的。伯恩斯先后担任过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尼克松总统的经济顾问, 在离开联储会主席的职位后, 他还出任过美国驻西德大使。

伯恩斯身为经济学界一代宗师, 一生著述等身。他的“经济周期”理论,

影响尤为深远。

没有人能质疑伯恩斯的研究成就和学术声望。但是，作为联储会主席，他得到的评价与学术声望并不太相称。不少人认为：他是“当代最政治化的”一位联储会主席，过于听命于华盛顿的政治需要了。另外，据说他那种生硬和高高在上的态度，以及他独断专行的管理作风，也与他的前任在联储会里造成的和谐气氛格格不入。

威廉·米勒 (G. William Miller)，1978 年至 1979 年在任。

威廉·米勒只是个过渡性人物，人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最无能的”一位联储会主席，只干了一年半。他的不成功，与其说是缺乏能力，倒不如说是缺乏兴趣：米勒的注意力似乎更多地放在了一些微观经济事务、枝节小事上，而对联储会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决策，则很少恢弘的大手笔。其实，米勒的商业感觉还是不错的，他曾把大型企业领导得有有条不紊。但是，在处理宏观经济决策方面，似乎确实非他所长。另外，米勒也被人认为过于屈服于政治上的压力，这也是他不受欢迎的一个原因。

保罗·沃尔克 (Paul A. Volcker)，1979 年至 1987 年在任。

我们在序言中介绍过格林斯潘的前任——民主党人保罗·沃尔克。毕业于普林斯顿和哈佛等名校，为 5 位总统工作过的沃尔克，连任过两届联储会主席，长达 8 年。身高 6 英尺 7 英寸半的沃尔克，51 岁出任联储会主席一职，此前他担任过尼克松政府中负责金融事务的财政部副部长，纽约联邦储备地区银行行长——这也就意味着他担任过联储会委员和开放市场委员会的副主席。有人说，沃尔克“生来就是当联储会主席的”，他对货币政策的精通，体现在大到货币策略、小到联储局日常工作的技术细节的方方面面。由于他在财政部和纽约联储银行任过职，沃尔克与许多外国中央银行的官员，以及世界金融界的重要人物有很广泛的私人交游。由于他成功地“打断通胀脊梁”，取得赫赫战果，有人对他在任期间总体表现的评分，甚至比给格林斯潘的评分还高些。

沃尔克担任联储会主席期间，最引起争议的是他在金融领域里的“革新”：通过一系列技术措施，将联储会长期奉行的以控制利率为目标的行为方式，变为以控制货币供应量为目标的行为方式。他认为通货膨胀是美国的公害，实行新的方针能更有效地对付这一公害。在里根政府头两年任期内，他起劲地进行这一试验，结果如何，至今经济学界评价不一。

1982 年经济极度紧缩，汽车销售额降到 20 年来的最低点。制造商和农场主们怨声载道。这一年 1/2 月号的田纳西州《专业建筑商》杂志在封面上怒火万丈地刊登对沃尔克及其联储会同事们的“通缉令”，控诉他们“预谋并冷血残杀数百万小企业”、“劫持房产主的美国梦”。而政府内部，如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 (Donald Regan) 等人，对他的政策也发出了最强大的反对声浪。

沃尔克一贯强硬地捍卫联邦储备体系的独立。他不仅认为自己的体系不受政治因素的左右，还认为地区银行相对于整个体系的特殊的独立的作用，也应该受到尊重。这一点，或许与他当过多年纽约联储银行行长有关。有一次，他甚至拒绝到白宫去见里根总统。而他的这一性格特点，使他颇得联储地方银行行长的敬重。

幸亏当时的里根总统对沃尔克的政策表示信任，对沃尔克坚持独立的态度也给以充分的尊重。他们之间一直保持了良好的沟通。

有一个故事说，沃尔克要求白宫发给他一张出入证，以使他在进入白宫时不必每次都要掏出驾驶执照给警卫看，来“验明正身”。白宫办公室助理打官腔说：每张出入证都要花费 3000 美元作安全调查，“所以很难办”。沃尔克一气之下，写了封短笺给总统的幕僚长：“我还不知道你们对我是如此不信任！”这下闹大了，一纸白宫特别通行证立即发给了沃尔克。

在为联邦政府工作 30 年后，沃尔克辞去联储会主席一职，到华尔街一家投资公司担任主席，并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国际经济政策教授。

格林斯潘进入的就是这样一个由经济学界的名人组成的系列，他不仅在名分上戴上了他们戴过的桂冠，而且在制定政策、推动经济的实际业务上，也被人视做堪与这些前任比肩。虽然他的货币政策也不是无懈可击，但整体说来，他处理宏观经济的头脑和手段深得赞许。

联储会观察家史蒂文·白克纳 (Steven K. Beckner) 从 80 年代起，便一直关注报导联储会的新闻，1996 年，他写了一本畅销书《摆脱危机：格林斯潘做主席的日子》(Back from the Brink)，历数了格林斯潘上任以来所克服的多次危机，赞扬之词溢于言表。现在，不论是列举“华尔街风云人物”，还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人”，几乎都不会漏下这个戴着窄边黑框眼镜的老头。

第七章 踏平险关成坦途

【人们都看见了这 11 年美国经济发展的曲线宛如稳步前进上升的坦途，没有大起大落，没有大弯大折；人们不会想到这条坦途的沟壑、坎坷，是格林斯潘一点一点地去铲平填实的】

一言兴邦 一言丧邦

笔者曾经听美国关岛华裔首席经济学家、李运奇博士半开玩笑地说过：人们说格林斯潘在美国是仅次于总统的大权在握的人，而他的实际权威，还要超过美国总统。克林顿跺跺脚，打颤的不过是白宫；可这老头一打喷嚏，全美国就得下雨。

这当然不是说，格林斯潘真的比身为美国最高元首的克林顿权力更大——毕竟总统有权任命他，也有权撤换他——但他确实比克林顿更对老百姓的生活有直接影响。他的职位、他的权柄，势必使得他的每次讲话和决策，会极大地影响股市，影响投资大众的心态。

尤其那些时常要捣腾天文数字的金额的理财经理们，可以说成天盯着格林斯潘：留意他的每一个举动，捕捉他的每一个表情，倾听他的每一个玩笑，从他的字里行间揣摩他的心理活动，从他的一颦一笑抖落出事关紧要、微言大义的信息。身为掌管美国货币政策的人，格林斯潘对短期利率的调整——哪怕是微调，字字千钧，瞬间就能把股票市场拎到半空，或是摔到地下。

联储会的开放市场委员会每年召开 8 次讨论利率的例会，就应该提升利率还是应该降低利率做出决策。每次会议在举行之前和进行当中，投资人就屏神敛息，高度紧张，各种媒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仅挖消息，更从各种角度分析和猜测这位被媒体冠以“在国际金融界呼风唤雨”、“主宰美国经济”的格林斯潘可能的动向，洋洋千言，头头是道。而这位格老对自己这种地位和威力又有充分的自知之明，知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于是分外金口难开：做出决策之前守口如瓶，不露口风，就是记者把问题顶到面前，他也能“王顾左右而言他”，让你不得要领；而做出决策之后向公众宣布时，他也字斟句酌，措辞极为严谨慎重。

模糊语言大师

格林斯潘发表讲话，不仅惜墨如金，更以晦涩含糊著称。

不到非说不可的时候，在提高利率还是降低利率这种问题上，你别指望看着格林斯潘开口露风说“加”说“减”。据《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说，格林斯潘从来不就联储会事务举行新闻发布会，也拒不接受将进行录音的采访——要想解读格林斯潘，甚至更是个难题：你“不可能总是肯定听懂了他所说的”，他的句法绕去绕来，是相当奇特的。

在一次对国会的讲话中，此老有一段绕口令一般的名言，其内容，其表述形式，都堪称最典型的“格林斯潘式警句”：

我知道你相信你明白了你认为我所说的，但是我不能肯定你是不是意识到了你所听到的并不是我的意思。

即便就像美国国会议员这样聪明过人的政客，乍一听这种连环套似的多层复句，也要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吧！

如果说中国的古典名著《红楼梦》由于处处是谜，以至古往今来无数人乐此不疲地从各个角度来解读它，形成蔚为大观的“红学”；那么若把破译格林斯潘之说的连篇累牍的评述、分析文章汇聚成书，一定也已汗牛充栋。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他一句话，可以有多种理解。推敲起来，又往往是他所说的话圆滚滚、滑溜溜，让你抓不住，攥不紧，更剖不开。争来争去，说形成“格学”，大概也并不夸张。

这个特点，自然不会被喜欢调侃名人的媒体放过。美国的《读者文摘》上曾刊登过这样一幅漫画：在餐桌上，一个男人对女朋友说：“你想知道艾伦·格林斯潘在想什么？嗨，我这人很棒，不过还没棒到那个程度！”

这当然决不是因为格林斯潘年事已高，思维混乱。事实上，这个当今之世美国最有权势的人之一，这个无可匹敌的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掌门人——这个体系，掌控着占世界三分之一以上的庞大财富——正是因为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又深知自己的位置重要，不敢稍有造次，才使他说话比任何人都更加小心谨慎。

以格林斯潘所具有的自知之明，他肯定心知肚明，人们抱怨自己说话含糊晦涩。1987年格林斯潘上台不多久，就在一次会上消遣了自己一番：“自从我就业于中央银行，我学会了语无伦次加含糊其辞。如果我令你觉得过于明白了，你一定已经误解了我的意思。”此言一出，听众爆发了一阵哄堂大笑。

其实，人们除了从他这番话体会到格林斯潘的幽默感，还可以从中体会到，身为联储会主席，格林斯潘不得不练就这种让人闻言如入五里雾中的“模糊语言”。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罗伯特·梭罗说过，格林斯潘在联储会主席里，并不是第一个说话闪烁其词的。“如果你回过头去看看威廉·马丁，甚至说话比较没有保留的保罗·沃尔克他们那些人，你就会发现，他们讲话差不多是一样的：他们都很精通没有含义的用词艺术。他们有点像乌贼鱼，吐出一阵墨汁之后便逃之夭夭了。”

还有一位熟悉所有这些联储会主席的人说，吸烟斗的伯恩斯和吸雪茄的沃尔克，无一不是“语言上喷云吐雾的能手”。

由于格林斯潘话说得含义不明，华尔街仔仔细细地奋力揣摩，有时也可能错了意。1996年12月，股市狂热上扬，格林斯潘在华盛顿一次晚会上，对此做了一番评论，说他觉得投资人是不是表现得热心过头，使股市出现“非理性的繁荣”了？这个评论实在太简略和太圆滑了，以至过敏的人领会得过了头，以为联储会主席是觉得市场过热、要泼冷水了，所以利率会提高。第二天，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猛跌了140多点，结果，利率根本没动。

评论家对格林斯潘这句话引起风波大为不满，有的怒火万丈地抨击，有的旁敲侧击地说：“联储会主席很少直接评论股市，而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最近一次发生同样的事是1965年6月1日。当时的联储会主席马丁将那时股市和20年代相比，结果股市连跌几个星期，到1966年2月间才终于大举反弹，使道·琼斯工业指数第一次达到1000点。而16年后道·琼斯指数还在那儿！”

后来格林斯潘确实对股市缄口不语。但对他的话分析微言大义的仍然大有人在。7个月后，格林斯潘对众议院银行委员会讲话时，预计在1998年，“将会持续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这一次，华尔街觉得，他的意思是没有必要提高利率。道·琼斯于是狂升155点，冲上8061.65点的新高度。

“一生都在为它做准备”

我们在引子中讲到了1987年，格林斯潘上任时与“黑色星期一”狭路相逢。

被人们视做“天生是干这个的”前任联储会主席保罗·沃尔克辞职，没有了谁，地球也要照样转，里根便听从阁僚、智囊们的推荐，任命格林斯潘来接任，格林斯潘立即接受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丘吉尔得知自己当上了英国战时内阁首相的时候，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这一生都是在为它做准备的。”格林斯潘此时大概也正有同感。尽管他从来不曾明确地把当上美国联储会这一金元帝国的掌门人作为自己事业的目标，但是没有人比他为这个职位所做的准备更充分了。虽不能说“轻车熟路”，但人是熟人，事是熟事，眼下不过像所有初履新者一样，只需要熟悉熟悉联储会内部“企业文化”，了解了解工作程序而已。

实际上，格林斯潘接手的联储会，面前难题已经逐渐积累如山：短视而不合理的国家财政政策，既导致政府债台高筑，又加剧美元长期性的疲软；政治压力一波接一波，不仅来自白宫，而且来自国会；还有自30年代以来最棘手的金融危机、企业大规模的裁员、军事基地丧失……后来又有波斯湾战云密布对美国经济所造成的阴晴不定。要应付这一切可不容易，一步走错，满盘皆输。

格林斯潘没有埋怨前任给自己留下了这么一个严峻局面，对沃尔克表现出了既尊重又体谅的风度。他有一次曾表示，他上台伊始所碰到的难关，与沃尔克跨越过的难关相比，实在不值一提，“他（沃尔克）碰到的难题，实在很严峻”。更何况，解决经济难题，本来就是联储会主席该做的日常功课。

“黑色星期一”对于新的联储会主席来说，是上任后第一次，但决不是最后一次重大危机。“星期二，格林斯潘来到舞台中央”，成竹在胸地发表一项只有一句话的声明，在一夜之间，决定立即把紧缩政策转变为向市场提供充足资金，“向市场打开了货币水龙头”。他还马上与“七国集团”的其他国家紧急磋商，协调行动向金融系统提供资金……

格林斯潘处理危机的果断举措，挽狂澜于既倒，赢得了《华尔街日报》等媒体的一片赞扬，也使白宫佩服得五体投地。

既要开源，更要节流

格林斯潘深知，在走向既定目标的长途跋涉中，要善于区分“重要事务”与“紧急事务”这两者。一般人往往被纷至沓来的急事牵引住目光，占去了精力，却分散了对重要事务的注意力。而作为联储会主席这样一个统率经济全局的主帅，决不能这样。

“黑色星期一”的危机终于缓解，股票市场开始回稳之后，格林斯潘立

即将注意力由“紧急事务”回到了“重要事务”，回复到采取他一贯坚持的保守方法上来。

“黑色星期一”之后6个月，看到股市的崩溃并没有给经济带来人们以为的那么严重的损失，格林斯潘又将注意力转到抑制通货膨胀去了。

他几次在国会发表讲话，都是忧心忡忡的警告：尽管经济发展的势头很强，通货膨胀的威胁正在减弱，但整个形势却“并非没有危险的”。“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仍然没有量入为出，我们每年都消费了比我们所生产出来的要多得多的全世界的产品，从我们现在的赤字，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每年不知不觉地陷入多么深的对其他国家的债务”。

格林斯潘并不相信降低美元与其他货币的汇率，就会通过减少贸易逆差，从而解决这个国家的经济难题。他说，即使美元贬值，美国还有个缺乏扩大出口所需的额外生产能力的问题。

那么怎么办？格林斯潘为美国经济弊端所开出的药方，是着眼于减少庞大的联邦预算赤字。

“黑色星期一”究竟起因为何？至今众说纷纭。可能是格林斯潘不该在这个当口提高利率，动摇了投资者的信心；可能如有的分析家认为，引发“黑色星期一”的直接原因，是早些时候财政部长贝克在全美电视节目上要求德国采取措施，增加进口美国产品，否则，美国就要进一步打压美元。如果美元再跌，美元资产将再度贬值，于是投资者恐慌情绪四起；也可能是非常简单的一条原因：过分膨胀的市场泡沫终于胀破了。而当崩溃刚刚发生后，人们反省时多认为：联邦预算赤字应算导致这个“黑色星期一”的罪魁祸首——前任财政部长、政府发言人和各大公司主管举行了研讨会，他们联合出资在《纽约时报》刊登的广告中，将危机的责任推给联邦政府的“巨额预算赤字”。

格林斯潘显然与他们抱有同感。他曾说，减少联邦预算赤字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按照美国相当低的存款利率，格林斯潘力促国会“不要简单地仅仅满足收支平衡的预算，而是要向实现预算盈余努力”。他认为，全面地增税并不明智，因为“可以征税的收入毕竟是有上限的”。同样地，他认为，一个“维持水平”的国防开支也是不能减的。

那么，几乎构成联邦开支一半的社会保障以及其他福利计划的经费，就成了格林斯潘力主白宫下刀削减的最大目标。格林斯潘还建议征收每加仑15美分的汽油税。我们看到，这与兰德的思想，与格林斯潘长期持有的思想，一脉相承。他在担任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主席时，之所以没有下狠手，主要只因为当时政治上的阻力太大。向社会保障和福利计划下刀，这与共和党人里根并不矛盾，或许总统之所以选中他来担任这一职务，也是对他这一见解表示认可。

状告财政部长的首席经济学家

然而格林斯潘一个劲地主张削减联邦开销，实行对货币的紧缩政策，这在把发展经济、增加就业从而显示政绩放在首位的白宫、政府听来，却不那么是滋味——这就像宴席中的某人，不停地对左右宾客大声疾呼：我们这席盛宴应该减少食客、减少美酒佳肴。这不仅是扫兴，更危及大家的利益，他们当然会对联储会明里暗里地给予影响、软的硬的施加压力。

格林斯潘不为所动。上任没到半年，他甚至采取了一个不太寻常的举动：1988年3月，格林斯潘一状告到参议院银行事务委员会，说联储会1月间收到了来自联邦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的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达比(Michael Darby)的一封信，达比在信中力促联储会放宽对货币的紧缩政策，以“避免一场经济衰退”。

达比此举被大多数观察家视为出于政治目的：那年正是大选年，里根总统的副手布什出马角逐入主白宫，达比的图谋是要联储会放松货币，防止经济下滑，危及正在台上的共和党形象——如果能够促使经济上升，使共和党更有点政绩可夸耀，就更求之不得了。

达比的这一意见，后来被财政部长否定了。但格林斯潘还是向参议院银行事务委员会告状，借此向白宫传达抱怨自己政策受到干预的信息。他向参议院这个委员会表示，“任何外部压力都不会改变联储会的方针”。

放放收收，两面作战

此后，投资人和公众眼看着格林斯潘及他领军的联储会，对利率这个“水龙头”时而拧紧，时而放松——何时拧紧，何时放松，端视当时是通货膨胀还是经济紧缩，哪一个造成的威胁更大。

联储会并不是铁板一块，联储会委员、开放市场委员会委员具有不同的学历背景，担负的具体职责不同，对于美国经济的看法也很不相同。以前，联储会在伯恩斯和沃尔克这样的人领导之下时，联储地区银行的行长被看做是晚辈，说话没有太大分量。但是到格林斯潘当联储会主席时，他的作风比较民主，于是每次讨论利率会议，争论就格外激烈。来自所谓“反通货膨胀前沿”的地区银行行长们，对通货膨胀态度强硬，被视做“鹰派”；而来自首都的委员们多半要求放松银根，刺激经济，被看成“鸽派”——在鹰派看来，鸽派有讨好一心追求经济增长率以夸耀政绩的白宫之嫌。不愿自居权威以势压人、更愿意用协商、说服办法的格林斯潘，在别人看来就显得决策优柔寡断了。

联储会中这一复杂人事关系，在1988年里显得特别纠缠难解，影响到联储会采取正确的步调。这是一个大选年。在地区银行行长们推动开放市场委员会提高联邦借贷利率，以遏制潜在的通货膨胀，但是华盛顿的联储会委员们不愿这样做——地区代表们私下里议论说，这些委员们是力图促成降低利率，以帮助布什赢得即将来临的大选。在8月5日举行的电话会议上，鹰派行长们摊牌要求实施紧缩政策，12个地区银行行长中的9个，都认为必须提高利率——很明显，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下星期的开放市场委员会就会变成炮火硝烟的战场。在电话会议后的非正式会议上，鸽派委员们多半表示愿意妥协，只有西格女士因事未参加讨论，会议决定要格林斯潘去做西格的工作。西格后来说：“我并不认为提高利率是必要的。但是选举日即将来临，格林斯潘要求大家同意提高利率以避免让别人指控联储会是政客附庸。”她还说，这是“格林斯潘当联储会主席以来第一次”要求她采取一致行动。

在鹰派压力下，联储会终于一致赞成提高利率。联储会的战争是避免了，但是这种金融形势对共和党的选举确实是不利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一星期之后举行，布什竞选班子的重要幕僚贝克对格林斯潘表示了不满，但格林斯潘也没有挽回之计。

布什当选之后，联储会又把利率提高了几次，最后一次是 1989 年 2 月 24 日，联储会在通货膨胀越来越大的压力下，应格林斯潘的要求采取一个“大动作”，将利率提高了半个百分点，提到了 7%。

时隔不久，到了 6 月，联储会多数委员终于确认美国开始进入经济衰退，通货膨胀的威胁终于暂时远了。因而联储会又得赶快松一松水龙头，将利率降了回去。格林斯潘在他提交国会的半年报告中说，美国经济成长将进入一段极大的缓慢期：眼下，经济衰退对美国经济的威胁，要大于通货膨胀的威胁，因此，联储会的货币政策的改变，是为了防止更大的经济衰退。

未能及时扭转经济衰退趋势

布什在执政任期的中段，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他在测算联邦赤字时低估了数额，后来又发现低估了拯救借贷协会所需的费用，使联邦预算出现了极大的窟窿。为了平衡预算，不得不违背在竞选时信誓旦旦许下的“不增税”的诺言，激起了选民的公愤。

经布什的智囊多次向格林斯潘和联储会委员做工作，他们倾向于稍稍放松银根，降低利率。但是鹰派行长们仍然着眼于严防通货膨胀，坚持紧缩。他们也是有理由的：尽管经济已经放慢，但失业率仍然较低，如果联储会降低利率，那么雇主会用抬高工资的办法对付劳动力供应不足，这就可能引起一场以工资为先导的通货膨胀。

为了说服鹰派，格林斯潘在 1989 年 5 月 31 日举行开放市场委员会的电话会议，敦促大家同意降低短期利率，但分歧双方谁也不肯妥协，没有能达成协议，格林斯潘只好将投票时间推迟到下星期。幸好星期五发布的统计报告支持了就业增长十分疲软的看法，鹰派的态度软化了。再次开会，大家终于同意降低联邦借贷利率四分之一个百分点。

联储会继续放松银根，但步子极为缓慢，每次都只降四分之一点，从 6 月到 12 月，才从 9.75% 降到了 8.25%，西格女士讥讽说：“这简直是婴儿的脚步”。

即便是“婴儿的脚步”，最后也停下来了。这是因为格林斯潘再也凑不齐赞成继续降低利率的票数：开放市场委员会中有两名委员，以前是放松银根的赞同者，后来却倒戈，一个从长期债券利率的上升，一个从对商品价格的观察中得出结论，认为金融市场的迹象表明通货膨胀可能正在到来。他们弃鸽投鹰，使反对进一步放松银根的力量占了上风，1990 年整个上半年，联储会不顾经济疲软的事实，坚持不降利率。

格林斯潘左说右说，好不容易才在 7 月份说服了同事，但也仅仅只降低四分之一点——这么小的步伐，近乎原地踏步。

1990 年 8 月 2 日，伊拉克突然千军竞发，并吞了科威特，这下搅得天下大乱，严重冲击了格林斯潘既消除通货膨胀压力，又提高经济发展势头，实现“软着陆”这一如意算盘。当时石油价格上涨，使人担心 70 年代的通货膨胀重演，但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又好像正在走向衰退。两者并发，就让人左右为难，联储会迟迟拿不出对策。

有人认为，格林斯潘当时过高估计了潜在的经济发态势，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消费者信心急遽下降之时，没有及时地降低利率，结果不得不进入一场经济大衰退，和一次缓慢得如蜗行龟步的恢复。但实际上，格林斯

潘是有苦说不出：他看到了问题所在，但是自己难以下手解决，得对联储会的同事大花唇舌；他对经济走向比较准确的预测，却得不到其他人的认同。

格林斯潘企图有所作为，但是鹰派抗命。在秘密举行的开放市场委员会上，格林斯潘站在鸽派一边，要求分两次降低利率，每次降低四分之一百分点，但是鹰派就是不松口。吵来吵去，格林斯潘只好妥协，开放市场委员会只同意降一次四分之一百分点——不仅如此，它还要求在白宫与国会达成一项新的削减赤字协议之后再执行，这一等就是一个月。这一延宕，使局势更加恶化。

把民主作风带入联储会

形势的发展终于使鹰派行长们相信放松银根刻不容缓了，1991年联储会总算连续调低利率，对衰退中的经济连踩油门。

后来对格林斯潘领导下的联储会在对抗经济衰退中的表现，评价两极。一种估价认为格林斯潘的作风太民主了——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太软弱了。保罗·塞缪尔森评价说：“你不能既是一个好人又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格林斯潘是一个好人。”有人甚至对“民主”侵入了“权威主义最后一个领地联储会”而大感惋惜。

但是格林斯潘的支持者却说，格林斯潘在相互冲突的观点中间进行平衡的技巧相当高明。在主要问题上，他能够说服同事按照他的想法办事。他自己回顾说：“我想不起来有哪一个重要决策是使我自己感到是错误的。”他还说，管理中央银行的最佳办法，就是容忍不同观点。

格林斯潘的谨慎作风深受华尔街赞许。不知不觉，格林斯潘联储会主席的任期届满，在进行民意测验时，华尔街对他的支持率竟高于对沃尔克的支持率。1991年7月10日，尽管白宫与联储会之间口角不断，布什总统还是提名格林斯潘连任联储会主席，以避免市场的动荡，很快就获得了参议院的通过。这一年12月间，随着经济不景气日益加重，格林斯潘率领联储会决定来一剂狠药，大幅度降低优惠利率，降了1%，降到3.5%，还降低了联储会的储备金。以期刺激经济的成长。

经济的曲线经过一番挣扎，终于在白宫主人更换前夕，有了上升的势头。对执政者来说为时已晚，在海湾战争中大胜班师，享有崇高声望的布什大势已去，眼睁睁看着经济复苏这一个大甜果实，落到了名不见经传的阿肯色小子克林顿怀里。

警惕通货膨胀怪影重来

现在轮到克林顿与格林斯潘发生摩擦了。随着经济发展势头越来越猛，格林斯潘也越来越将注意力放在防止通货膨胀上来。

1994年2月时，联邦利率保持18个月不变的记录被打破：在通货膨胀到来之前，格林斯潘“先发制人”，先行将利率提高了四分之一个百分点。

此后，到1995年年初，不过一年的时间内，联储会曾7次提高利率。白宫助手们透露说，这使得克林顿总统大光其火——每一次提高利率，都意味着对经济发展踩一次刹车，哪怕只是轻轻地刹车，竟踩了7次刹车！

1995年1月31日，墨西哥爆发了金融风暴。格林斯潘与白宫和财政部

一道，联合其他国家，对墨西哥提供了总值为 500 亿美元的国际援助，以挽救墨西哥比索。这可以说是格林斯潘第一次在国际金融舞台上施展大手笔。

墨西哥几年来经济形势越来越险恶：高利率吸引来大量外资，但是汇率高企，削弱其出口能力，同时国内储蓄率下降严重，整个经济过分依赖外资，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外资流入减缓，外汇储备就直线下降。这包含了很大危险性，被外国投资者察觉后，便开始将投资于股票证券的资金撤出。1994 年，墨西哥实行使比索与美元的汇率基本稳定的政策，以对抗通货膨胀。不料外贸赤字增大，外国投资者信心更加动摇，资本加速外流。1994 年 12 月 20 日，政府不得不宣布让新比索贬值 15.3%。这一举动更加剧了外国投资者的恐慌，资本更是向外大流特流，据估计，仅仅两天就流出了 40 亿美元以上的外汇储备。到 12 月 22 日，外汇储备几近枯竭，当局不得不宣布让新比索自由浮动，政府不再干预市场。这一下，几天之内新比索就下跌了 40%。

墨西哥是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这个伙伴要是垮了，后果不堪设想——第一步恶果就是美国 1995 年向墨西哥出口额将降低 100 亿美元。这还得了！格林斯潘深知其厉害，坚决支持总统和财政部长鲁宾的援墨行动。他从联储会 340 亿美元的外汇稳定基金中，拿出 200 亿美元援助墨西哥，挽救奔腾直下的比索，终于稳定了墨西哥的金融危局。

就在次日（2 月 1 日），联储会决定再踩一次刹车（一连串七次刹车中的最后一次）：把利率再提高半个百分点，达到了 6%。联储会从 1994 年以来的这第七次紧缩行动，向华尔街明确地传递了这样的信号：中央银行将再度发起对通货膨胀的作战。

然而仅仅过了半年，“敌情”发生变化：经济衰退的威胁又慢慢升高到超过通货膨胀的威胁，一直是在把水龙头拧紧，现在又该稍稍放松了。1995 年 7 月 6 日，出于对经济衰退的担心，联储会不再踩刹车，改踩了一下油门：将利率降低了四分之一个百分点。随后又在 12 月和次年元月，两度再降联邦利率。当然，格林斯潘还是时刻盯紧通货膨胀在远处游弋的怪影，提防它随时卷土重来。

身为民主党人的克林顿，虽然认识到格林斯潘的本事和价值，以他的圆滑性格和善于与人沟通的技巧，处理彼此关系还算融洽，但是决不等于说对联储会的许多举措没有怨气，尤其是在他总统第一届任期之初，与格林斯潘发生过一连串龃龉。那时他们的关系可以用“相当冷淡”来形容，双方都在观望；格林斯潘不到一年竟 7 次提高利率，搁在哪个总统身上都很难不发脾气。

第八章 华尔街与白宫之间

【克林顿与格林斯潘双方都在极力表明同一点，即，政府表示尊重联储会独立判断所做出的决定，联储会则表示它的决策决不受政府意志的左右】

联储会主席越听命白宫，口碑越差

第六章中我们逐一介绍了联储会的历届主席。将这 8 位主席的成就、口碑，及每人与总统和政府的关系列出表格，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有趣的结果：

联储会主席	成就与特点	与白宫及政府的关系
马瑞纳·伊寇斯	在联储会主席中得分最高，推动出台银行法	奠定联储会独立运作机制，隔绝了政府干预
托马斯·麦凯布	政绩不甚出色	在抗衡财政部的压力中过于软弱
小威廉·迈克切斯内·马丁	连任 5 届，对联储会有重大贡献	与总统关系好，但能化解来自白宫的压力
亚瑟·伯恩斯	学术成就高，但作为联储会主席为人诟病	过于听命白宫当权者
威廉·米勒	过渡性人物	屈从政治压力
保罗·沃尔克	“打断通货膨胀脊梁”声誉甚高	坚持联储体系的运作独立于白宫

从上表可以看出，凡是在联储会主席任上做出了重大贡献者，均是能够在白宫及政府的压力之下，坚持联储体系的独立性的人——尽管他们中，有的是强硬地对抗，有的是圆满地化解。

我们常常看见的一个事实是：联储会主席与任命自己的总统，分属于两个党。有时虽然是被同属一党的总统任命，但被属于另一党的总统提名连任。格林斯潘是个共和党人，虽然最开始是因同党的里根总统一纸任命，坐上了这把交椅，但他干了 11 年多联储会主席，倒有一多半岁月是在民主党的总统克林顿领导之下。

更为微妙的是，有的联储会主席甚至担心与本党总统共事，如果共事的话，也宁愿与其保持一点距离，以免被讥为“过于听命白宫”，反而会使华尔街对自己敬而远之，关系疏离。

这一点在格林斯潘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据他过去的同事说，格林斯潘这个老共和党人，在 1981 年到 1983 年应里根之邀，担任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主席的时候，就曾很担心他与共和党政府的这种密切关系，会削弱华尔街对他的信任，“他可不想当另一个亚瑟·伯恩斯”。尽管伯恩斯是他的恩师兼密友，但是这位尼克松总统任命的联储会主席，曾被人指责过于“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只顾满足白宫“发展经济”的要求，而听任通货膨胀加剧到失控的程度。他的这种担忧溢于言表，难怪有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推测说格林斯潘被里根任命担任联储会主席后，之所以头一次主持讨论利率会议，他就提高利率，其实为了以此行动做出姿态，表白他是独立于里根政府的。

行政导向为虚市场导向是实

联储会主席与白宫、政府的这种复杂微妙的关系，其来有自。

从传统上说，联储会内部的“企业文化”，一直是以主席为中心，却并不惟主席的旨意是从。联储会每次开会时，大学经济学教授、学者和银行家们坐在一起，相互交换意见，气氛亲密随便，辩论也很适度。当然，格林斯潘很好地扮演了“舵手”的作用——联储会上讨论来讨论去，也有投票表决的程序，但很少弄到两派意见尖锐对立互不相让，只能以表决来分胜负的程度，多半还是得听格林斯潘主导性的意见，虽不敢说“一锤定音”，但至少他这一锤对定音具有最大的权威。

而根据戴维·琼斯（David M. Jones）的看法，现代的联储会主席“实际上是被金融市场选出来的”，而总统提名、国会审议通过的正式法定程序，相比起来却不是最主要的，不过是个官样文章而已：

通常，白宫在征求了顾问、智囊的意见之后，看中某个潜在人选，会向媒体放风透露出去，然后由金融市场去评头品足，议论纷纷——这或许可以称之为“市场达尔文主义”吧，由市场去择优录取。白宫则细心听取外界的反映，最后再做出正式决定。所幸的是，这种过程往往真的产生出最佳的联储会主席人选来。而一个潜在的候选人选，如果得不到金融市场强烈的支持，往往也难以得到总统的提名。

如果说总统管的主要是大政方针，毕竟不能在金融政策上管得太具体，与联储会主席发生直接冲突的机会较少；那么对联储会的相对独立性直接构成威胁的，大概就属美国联邦财政部了。财政部长是总统的内阁成员，而联储会主席则不是，按照中国的观点看，财政部长似乎比联储会主席的“行政级别”要高。然而，美国却不是“大财政，小银行”，而是“大银行，小财政”。“官位”高低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从经济尤其是金融政策上说，中央银行的功能远远超过财政部。

当然，自从联邦储备体系 1913 年建立之日起，联邦财政部按其本性，影响这一银行体系决策的企图就似乎注定了。从这时到 1935 年《银行法》出台之前，财政部长和货币审计长是联储会的当然成员，这就是说，财政部的意图干脆就是联储会会议桌上的议题。

经过前后几任联储会主席伊寇斯和马丁的努力，联邦储备体系一步一步摆脱了财政部的干预。1935 年的银行法，更明文规定了财政部长和货币审计长“不得同时成为联储会成员”，这样，财政部就无法名正言顺地控制联储会了。

不过，财政部往往不会轻易罢休，总是要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来插手银行。里根的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就曾毫不留情地困扰过当时的联储会主席沃尔克——我们在第六章中介绍过，当时反倒是里根比较聪明，对沃尔克给以充分理解和施展的空间。

格林斯潘颇有政治头脑

别看格林斯潘貌似拘谨，说话腼腆，其实他是“大智若愚”，绝非没有政治头脑的书呆子。当他出掌联储会之前，已经有了十多年的官场经验，履新之后，他不能不在考虑经济的方方面面的同时，把政治因素也考虑进去。但他考虑归考虑，目的却是为了在政治压力下更有效地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甚至有人说，格林斯潘与他的前任之中坚定地捍卫联储会的独立者相比，可以说是“有过之无不及”。

而就白宫、政府对联储会主席的期望来说，归根结底，“听话”其实不是最重要的，“能干”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时联储会主席对白宫顶顶撞撞，拒不从命，但只要能够一一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难题，从而让执政者有政绩可以满世界大讲特讲，对白宫来讲就是称职。

格林斯潘 1987 年上任之后就提升利率，白宫有苦难言，里根总统嘴上没有说，心里不痛快。而这一调整，之后紧跟着的就是 1987 年 10 月 19 日“黑色星期一”。但是，包括白宫主人在内的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对格林斯潘追究责任，格林斯潘马上就以其果断、镇静地处理危机的能力，在纽约华尔街以及一度慌作一团的白宫这两方面，都赢得了威望。

不过，任何来自白宫的对格林斯潘的赞扬，都不会长久——这是政客们与联储会的政策之间存在冲突的现状所决定的。

果然，1988 年夏天，就在共和党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推出总统候选人的前夜，联储会提高了利率，使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乔治·布什大为恼火，预示了格林斯潘与布什政府的四年不和。后来联储会与布什政府之间关系的紧张，有目共睹，被人形容为“暴风雨般的关系”。

长期观察联邦储备体系的研究者曾经指出，格林斯潘其实并没有打算与布什政府搞僵关系，他只是对他所看到的通货膨胀增长的威胁做出反应罢了，可是共和党人未必这么看。布什的一些追随者认为，90 年代初，格林斯潘未能及时降低利率，才造成经济大萧条——这个格老头反对通货膨胀“太过狂热”，造成了共和党在 1992 年总统竞选中的失败。

与布什的财政部长常闹别扭

顶住联邦财政部的压力，是每个联储会主席的功课之一。格林斯潘最头疼的，是领教来自布什总统的财政部的干预。

由于政府与市场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政府考虑问题的着眼点，与市场考虑问题的着眼点，往往构成矛盾。而联储会显然更多地要听从市场。也不妨从另一个角度说，政府包括财政部偏重的是本届任期内的效应，而联储会（银行）则偏重对长远发展利弊的考虑。

财政部的经济政策，时时与联储会的努力形成落差。从 1987 年一直到 90 年代的中后期，美国财政部一以贯之的希望是美元不要太强：美元的贬值，是不论共和党政府还是民主党政府都乐于接受、巴不得如此的，两党政治家们，都喜欢把美元汇率降到最低，使之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刺激出口，刺激经济发展。从 1987 年 8 月，到 1995 年春季，美元对西德马克下降了 26%，对日元下降了 44%。

然而美元贬值，与联储会一贯奉行的控制通货膨胀的努力，却正相冲突。联储会往往声称，经济发展是大家共同的愿望，自己也不例外，但问题是，

经济的发展，应该处在一个长期稳定、没有通货膨胀威胁的环境中。这正是联储会的责任：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不得不提高利率，紧一紧水龙头，踩一踩刹车。有时候，联储会加强美元的坚挺，而不能顾及在位的政治家们是否情愿。

如果问布什的财政部长尼古拉斯·布莱迪（Nicholas Brady）对格林斯潘有什么看法，他大概不会说太多好话。俩人多有交锋，联储会与财政部在美元政策上的紧张关系，在格林斯潘——布莱迪时代越来越恶化。这一头时刻担心通货膨胀，总是跃跃欲试要提高利率；那一头却希望降低利率，削弱美元，刺激出口，以弥补贸易逆差的大窟窿。这一头要独立于政府的干预之外，那一头则是对联储会的离心倾向满怀压抑不住的不满。

通常情况下，布莱迪还有点政客的涵养，不会在公众面前表露对联储会和格林斯潘的愤怒，话都留着回白宫去说给总统和同伴听。可是他对格林斯潘那副对抗性的态度，在工业七国会议上，有时候除非是瞎子才看得出来。

有一次，格林斯潘出访俄国，在莫斯科发表关于金融改革的讲话，提到中央银行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是“最重要的”。不论格林斯潘是否有意说给布莱迪听，反正布莱迪觉得这话是冲他来的。当别人问起他对格林斯潘的莫斯科讲话有何评论时，布莱迪气哼哼地说：“我不能想像，一个人为什么跑到莫斯科，去说一些他在这里却不说的话。”

形同克林顿“经济顾问”？

吊诡的是，格林斯潘成果最为辉煌的时期，恰恰反倒是民主党的克林顿总统的时代。1992年大选，克林顿击败布什。在与布什政府经历过“暴风雨般的”关系之后，格林斯潘与联储会忐忑不安，不知道下一步将与12年来第一次执政的民主党政府相处，会是个什么局面。但他多少感到放心的是，既然总统并非本党同志了，总不至于被华尔街看成对总统唯唯诺诺吧。

他们没有想到，克林顿政府与联储会之间的关系，比较而言，却是相当祥和，即使在联储会1994年2月宣布提高利率之后，与政府的关系仍保持良好，不曾撕破过脸。格林斯潘与总统本人及其内阁，关系越来越亲密，以至到后期有人都说，格林斯潘简直形同“克林顿的经济顾问”了。

人们多将联储会和政府关系改善，归功于新总统克林顿在与联储会打交道中，体现出了比他的前任们更多的理解，一方面加强沟通，另一方面放手让联储会独立去做出关于经济问题的重大决策。总统的经济顾问们，基本达成共识：“与联储会冲突绝非好政策”。美国这些年来的经济形势发展得很好，这也帮助了彼此能够风和日丽——如果经济情况不佳，双方的主张南辕北辙，彼此的关系怕就不能这么风平浪静了。

克林顿对格林斯潘对新经济的观点是大表赞同的——关于格林斯潘的观点，我们将在本书的下篇中详加介绍。总统自己对新经济的评价也差不多：“我们经济的全球化，新的技术、新型管理提高的生产力、以及工人对于自己的收入与公司的成长之间关系认识的更成熟，所有这一切，都为经济的成长提供了更大的可能。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而来的，还有很多是目前我们尚不能很容易估价的。”

格林斯潘自己说，他很喜欢他与克林顿以及财政部长劳伊德·本特森（Lloyd Bentsen）之间“真诚”、“友好”的私人关系，但他不赞成被说成

是他与他们“合作”，或被说成是“对他们的政策提供建议”。

财政部长本特森不同于布什的财政部长布莱迪，他与格林斯潘“在工作上和私交上”，都“有着相当好的关系”：“我们这个星期一起在我的办公室吃早饭，下个星期就到他的办公室去。”大家常常一起打网球，当然就免不了打一边打球，一边谈谈金融政策乃至金融理念。

“ 奇异的一对 ”

在《商业周刊》的一次对总统的采访中，克林顿对与联储会主席之间的关系，口气相当肯定。他对记者开玩笑说，他和格林斯潘俩人可称为“奇异的一对”（The Odd Couple），这个词出自美国著名剧作家尼尔·西蒙（Neil Simon）的一出名剧。克林顿还说：“我认为他一直干得不错。”

克林顿说：“我很喜欢我们之间的关系，我尽量一年见他几次，因为他知道如何得到有关经济的大量资料。他把这些资料掌握得非常充分，而且总是对收集资料乐此不疲。”

记者难免趁机从总统嘴里掏点口风。格林斯潘到2000年有没有连任的可能？克林顿答得滑头：“我通常所做的是，在时候不到的时候，不讨论任命的问题。我们的联储会，在允许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如何对待通货膨胀是很有分寸的。我们的经济政策已经转向投资—成长的策略。这一切都是有成效的，格林斯潘功劳甚大。”

有人说，格林斯潘不受总统们更迭的影响，“山转水转石不转”，总统四年一换，他却连任数届，那边走马灯，这边不倒翁。或者借用中国一句“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来说，叫做“铁打的格林斯潘，流水的总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坚持反对通货膨胀的立场，“令华尔街感到满意”；而有了他自己对经济趋势高人一筹的眼光，有了华尔街的拥护和信任（这是最关键的），即使白宫对他的货币政策时有不满，也没法不请他来当这个主席！

当然，事情并不像乍一看那么简单。

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谁都会说，可这些都是表面现象。联储会与克林顿内阁，比与布什内阁相处更为融洽，这确实不假；可是要说在克林顿时代，联储会没有受到一点来自白宫的政治压力，那也绝不是事实。

格林斯潘的目标，是保护联储会达到货币稳定的长期目标的能力；而克林顿以及他在国会山的盟友们的目标，却是保持利率尽可能长久的尽可能低。只是，与布什时代不同的是，除了经济发展的复苏这个因素，克林顿在对联储会施压的时候，比他的前任更巧妙、更圆滑一些而已，他在操纵货币政策方面，手段是最为聪明的一个。克林顿赢得竞选，靠的就是美元坚挺的形象，他知道赢得格林斯潘的心有多重要。从一开始，克林顿和他的顾问们也都心里有数，批评或是表扬联储会，都只能是事与愿违。克林顿归功说：为什么白宫与联储会关系很好？“那是因为我们保护了联储会的独立性。即使我们来自不同的政治背景，他（格林斯潘）知道我们对控制赤字是十分重视的。”

这种说法也许倒确实最典型地道出了总统与联储会主席处理关系的秘诀：双方都在极力表明同一点，即，政府表示尊重联储会独立判断所做出的决定，联储会则表示它的决策决不受政府意志的左右。

两位顶尖高手惺惺相惜

格林斯潘与现任财政部长鲁宾（Robert Ruben）的关系，也是许多有心人长期注视与追踪的重点。

鲁宾与格林斯潘的私人关系虽然不像本特森与格老那么亲密，他却也有“不与联储会冲突”的戒条。他经常与格林斯潘出双入对，共同出席参议院听证会，或是出席经济研讨会。大多数星期四的早上，他们俩人，还加上财政部副部长劳伦斯·萨莫斯（Lawrence Summers）共进午餐，大家都很放松，交谈的话题甚广。鲁宾对格林斯潘十分尊重，格林斯潘对比自己小12岁的鲁宾也十分尊重。

说起来，鲁宾也算是在这一行的顶尖人物。1977年，《纽约时报》把当时年仅38岁的“很可能已是百万富翁”的华尔街投资者罗伯特·鲁宾（Robert E. Ruben），列为新出现的风险套汇（risk arbitrage）这一行的专家。

鲁宾1938年8月29日生于纽约市——与格林斯潘是同乡，他出生时，格林斯潘就在附近上中学。他的父亲亚力山大·鲁宾（Alexander Ruben）是一个房地产律师，鲁宾的母亲西尔维亚（Sylvia）的父亲也是一个律师，还是一个叫麦迪森俱乐部的主持人，这个俱乐部在布鲁克林具有很大的政治神通。外祖父利用律师的专长，成功地经营了这个俱乐部，给鲁宾留下了深刻印象。

鲁宾9岁那年，随全家搬到佛罗里达的迈阿密长滩，在那里他度过了整个青少年时期。和很多未来的百万富翁一样，鲁宾也当过报童和海滩服务生，进的是公立学校。

中学毕业后，鲁宾被哈佛大学录取，来到马萨诸塞州的剑桥。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花了好长时间，还决定不下自己对什么感兴趣。公立中学的教育很差，所以这里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新的。”

1960年，鲁宾以优异成绩获得哈佛的经济学学士。直到这时，他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向。他在哈佛法学院只待了几天就离开，到英国去了，在著名的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这也是国际金融大炒家乔治·索罗斯的母校）学习了一年。回到美国后，他没有重返哈佛，而去了耶鲁法学院。

1963年3月27日，在耶鲁的第二年，鲁宾与朱迪斯·欧克森伯格（Judith Oxenburg）结婚。

1964年，在拿到耶鲁大学法律文凭以后，鲁宾被纽约华尔街一家法律公司雇用。在这里，他开始接触证券方面的法律纠纷。他发现，比起当一个律师来，华尔街的一切才是他更喜欢的，所以他开始心有旁骛了。

1966年，他开始为证券公司——戈德曼·沙齐斯公司工作。在此之前，“风险套汇”这个词他听都没听说过，但是很快地，他就显示出在这方面的天分。70年代他一直为这家公司工作，在华尔街赢得了相当大的尊重，被誉为“华尔街最聪明的年轻人”，与另外几个精英人物并称为“四大骑手”。鲁宾说，于这行靠的是感觉和判断，市场作为一个整体是如此，对每个具体项目也是如此。

同时，他从外祖父那里继承来的政治热情，使他积极投身民主党的事业。

1980年，鲁宾进入了戈德曼·沙齐斯公司的高级决策圈。同一年，他开始正式介入联邦政府的运作，担任总统贸易谈判顾问委员会成员。1983年，

又担任证券交易顾问委员会成员。在 1983 年到 1984 年民主党人沃尔特·蒙代尔参加总统竞选时，鲁宾是其智囊团的一员，既策划筹款，又决定竞选策略。

下一次 1988 年大选，鲁宾是民主党人总统竞选者迈克·杜卡基斯的重要支持者。杜卡基斯被布什击败后，鲁宾更直接介入民主党的全国性活动，与当时的纽约市长大卫·丁勤时 (David Dinkins) 一道，促进了民主党把纽约定为 1992 年全国代表大会的地点，并为此次大会筹款 600 万美元(一说是 750 多万美元)。

1990 年，鲁宾应聘出任戈德曼·沙齐斯公司的副总裁，华尔街没有一个人感到意外。1991 年，这家公司赢利 14 亿美元，为华尔街上所有公司之冠。这时，鲁宾又一次投入总统竞选战役，民主党候选人、当时默默无闻的阿肯色州长克林顿获得了胜利。

鲁宾与克林顿就相识于这一年。鲁宾是他竞选的非正式的经济顾问，俩人经常通电话，讨论对策。克林顿当选后，任命鲁宾领导联邦经济委员会，帮助总统决定经济政策。鲁宾从一开始起，就表现出能够与华盛顿各色人等愉快合作的能力。在 1993 年 7 月 25 日的《纽约时报》上，鲁宾被形容为“悄悄地扮演着一个决定政策的主要角色”。

1994 年 12 月 6 日，财政部长本特森辞职。同一天，克林顿提名鲁宾接任。次年 1 月 10 日，参议院一致通过提名，鲁宾成为美国第七十位财政部长。

鲁宾上台第一年，就碰上 3 场硬仗。第一次是 1995 年初墨西哥比索大贬值，这一贬值势必造成美国对墨西哥出口的大幅下降。鲁宾与格林斯潘配合，为墨西哥提供了 200 亿美元专用贷款，加上外国投资的挹注，使墨西哥经济得到了改善。由于贷款是专用的，墨西哥只用了 125 亿美元，而且墨西哥政府提前归还了这笔贷款。1996 年 5 月，鲁宾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墨西哥建立了 500 亿美元紧急基金，以备危机再次爆发。

第二仗，是 1995 年春天应付美元对外币的疲软。在鲁宾等人努力下，美元对日元从 1995 年年中的 1 比 80，4 个月后提高了 20%。

第三次战斗围绕克林顿总统提出的 1996 年预算展开。共和党控制着参众两院，在众议院议长金格里奇统帅下，对总统预算层层围堵，要求削减几个预算项目，白宫与国会之间闹得很僵。鲁宾运用一些基金，在不违反任何法律的前提下，确保政府有足够的钱运转，最终金格里奇先软下来，放总统预算过了关。

年近 60 岁的鲁宾有着一张并不显老的面孔，态度谦和。他平日在华盛顿工作，周末回到纽约家中与太太团聚。他们在曼哈顿花园大道上有一处公寓，在纽约市北郊有一处房子。鲁宾的两个儿子，都住在纽约，一个是律师，另一个是新闻工作者。

鲁宾曾在 1997 年度，被《时代周刊》评为“全美国最具影响力的 25 个人”之一，是参与白宫重要决策者，“他一发言，所有的人，尤其是总统，必定会仔细倾听”。

身为财政部长的鲁宾，总是抓住机会强调，他并不想当“一个联储会的冤家对头”。如果克林顿有什么对联储会政策不满的话被记者抓住了，鲁宾也会站出来，替总统否认：“我不认为总统的话是对联储会施加压力。”但是，即使如此，在通货膨胀到底有多大威胁的问题上，他仍旧不赞同格林斯潘的所有政策，“降低利率”的主张，往往是他向联储会施加的压力。鲁宾

在担任克林顿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时，就表示过，通货膨胀的威胁“未必那么严重”，美国应该保持低利率。当上财政部长之后也曾对媒体公开表示过，有时候，他觉得联储会“过分强调问题的一个侧面，而忽视了全面”。

而格林斯潘早年是爱恩·兰德的信徒，到联储会来之后，马上以把钱把得紧而著称，一点通货膨胀的空子也不给留。直到今天格林斯潘似乎很津津乐道这样一种形象：他的办公室里悬挂着一幅镶了镜框的布什时代的漫画，画家把他画成一个经济“卡桑德拉”——古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的一个能预卜凶吉的公主，高举着一条预言：“末日将至”。

部会之间争权夺利

值得指出的是，格林斯潘与鲁宾时隐时现的矛盾，有一些是对经济发展的看法有分歧，但彼此纠葛还牵涉到更为微妙的层面，即各人所代表的机构在美国经济事务中所占据的位置，所掌握的权柄。

1998年6月份，美国媒体报道，“财经界两大佬格林斯潘与鲁宾，6月17日在国会山针锋相对”，使他们在金融改革问题上的歧见公开化，“这使得金融服务业改革法案今年获得通过的希望显得暗淡”。

他们是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各持己见。这次听证的内容，是关于混合银行、保险和其他金融服务的新型集团的合适结构问题。格林斯潘支持前一个月在众议院勉强通过的一项议案，把非传统的银行活动置于“由银行控股的附属公司”中；而鲁宾则认为，金融服务公司应该被允许选择银行控股的公司，或者选择把其他金融企业组织成“银行直属子公司”。

众院通过送参院审议的这项议案，据称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议案，用鲁宾的话说，这项法案通过后，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事实上成为金融业的“宪法”。正因为如此，鲁宾暗示克林顿政府并不介意不能很快通过：“我认为它是重要的，但不是紧急的。我认为关键是努力使它正确。”

俩人各有依据，互不相让。鲁宾的理由是，许多银行的管理层偏好后一种机构，而较小的社区银行担心控股公司结构会带来额外成本；而格林斯潘则认为，银行精明地知道在内部经营非传统业务的“特殊好处”。格林斯潘警告说，子公司结构可能扩大由纳税人资金支持的银行受保险存款的“安全网”；而鲁宾建议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就此事征求法律顾问的意见，他说，不管子公司的亏损有多大，它（对银行本身）的影响，“不会比控股公司更大”。

他们的争执，使时任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的达马托大为惊讶：“想到两位世界顶尖的专家在这个领域不能走到一起达成妥协，这实在是不能接受的！”

媒体分析，尽管他们所争论的焦点相当专门化，一般局外人不容易弄清楚究竟谁是谁非，然而从鲁宾重申忧虑——众议院提出的改革议案，将使财政部丧失制定银行法规的权力——这一点来看，透露出他们这次争论的背后一层含义：在很大程度上，这是联储会和财政部的权限之争，众议院的法案使联储会在美国银行和金融业的监管中，承担更主要角色，财政部的作用则相对削弱。

“党异伐同”

格林斯潘不愿被华尔街看成“过于听命总统”。没想到，这在同为一党的布什入主白宫时，纯为过虑，总统与自己关系并不融洽；但是并非本党的克林顿入主白宫时，倒真使人时有闲言碎语。

虽说格林斯潘连续7次提高利率一度使克林顿不快，但一系列举措的成效摆在那里，有目共睹：美国经济成功地“软着陆”了。这实际上为他们俩人的分别连任铺平了道路。不用说，克林顿对格林斯潘不能不衷心感激和油然佩服。晚些时候，克林顿考虑改革社会保障体系的方案，就向格林斯潘虚心请教——毕竟格老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老资格专家。

1996年格林斯潘这一届任期将满，克林顿权衡一番，没有比格林斯潘更适当的人选来主政央行了，从大节和成效着眼，他任命格林斯潘第三度连任联储会主席。经过1994年中期选举，增添了更多共和党新血的参议院，顺利通过了这一任命，6月20日，格林斯潘宣誓就职。4天之后，格林斯潘的主要支持者、克林顿总统的预算主任爱丽丝·瑞芙林出任联储会副主席，格林斯潘限制过热经济政策的实施，更加有了保证。半年之后，克林顿也顺利当选连任。

格林斯潘对于在很短时间里就和克林顿内阁建立非常密切的工作关系，自己也很意外，但风言风语随之而起。据透露，联储会里有些同仁认为格林斯潘有一些行动显得“与白宫过于亲密”，使他们感到不快。人们都记得，克林顿第一次对国会发表国情咨文，第一夫人希拉里大概是想笼络格林斯潘，邀请他作为嘉宾坐进自己的包厢，俯瞰整个众议院。那天晚上，在全国观众的电视机荧屏上，人们吃惊地看见：联储会主席在希拉里和副总统夫人高尔太太中间就坐！华尔街简直看得瞠目结舌——“联储会主席是不是被白宫收买了？”联储会里一些同仁不禁大摇其头：格林斯潘在这么一个场合，怎么可以和总统夫人和副总统夫人坐在一起呢！

可是格林斯潘又能怎么办呢？是第一夫人邀请的呀，他哪想到这次被邀请，坐位不像以前，而是就在前排，在希拉里旁边就坐呢。有人对他不无同情，说：“我敢肯定，他一定巴不得自己没被邀请。”

下 篇

走向世纪之交

(1997年—1998年)

在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美国在陶醉于对于全球经济所拥有的权力时，从来没有感觉到对于全球经济所承担的责任如此沉重。格林斯潘很清楚，自己所管的是美国货币的“水龙头”，而美国又是全球经济的“龙头”

Alan Greenspan : A Biography

第九章 黑色大台风

【美国的央行总裁，首先着眼的是这场风暴对美国经济产生什么冲击，他是美国经济的成长为标准来区分好坏的；而他又是站在这么一个世界上体制最稳固、实力最雄厚的银行体系之上——同样九级台风，掀翻多少舢板小艇，万吨巨轮却可能安然无恙】

“黑色星期一”幽灵重现？

10月，在中国大陆被视做喜庆的日子，过去甚至有“红十月”“金色十月”的说法；但是在美国，10月却是股市风险最大的月份，说是“黑十月”也并不夸张。有一个美国人，做股市生意没有一笔成功，不得不宣布破产，后来却成为了美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起了个笔名叫做马克·吐温。他后来把做股票生意的“血的教训”总结成几点，其中有一点就是：“10月份是玩股票最危险的月份”。想想看，马克·吐温是1910年去世的，生前还没有看到本书中写到的1929年、1987年这几次发生在10月的大崩盘呢，不能不令人惊叹他有眼光。

而刚刚过去的1997年10月里，美国及全球股市又发生了一次大震荡。

如果说，不少投资人到了10月就战战兢兢；而无论是汇市股市，星期一总是最让人难以放心，这两者加在一起——10月份的星期一，就更让人心惊肉跳。1997年10月27日，正是10月最后一个星期一，世界股市中心纽约风云突变。

本来，前8天——10月19日是美国华尔街“黑色星期一”的10周年纪念日，正因为此，投资家们最为焦灼不安。然而，恐怖气氛却并未在华尔街出现，道·琼斯指数在一周之间跌落210点之后，当天却反弹了74点，让人额手称庆。没想到，下一个星期一却成了又一场噩梦。

10月27日是纽约股票交易所有史以来交易最为活跃的一天。但这是什么样的活跃呢？或许称之为痉挛、挣扎，倒更为贴切！

这一天，道·琼斯工业指数以7715.41点开盘后，即一路下滑，一泻千里，到中午12时已下跌115.41点，盘势仍无任何止泻迹象。到了2时35分由于道·琼斯指数已重挫超过350点，触动了有“电流中断器”之称的自动限制交易电脑程序系统。这个系统是10年前的“黑色星期一”后安装的，以便在万一发生大崩溃时，能发挥缓和行情的作用。这次它就首次启动了，交易大厅所有活动安静下来——必须中止交易半小时。

人们仅仅在万分紧张中有了个稍微喘了口气的间隙。3时05分恢复交易后，情况丝毫没有好转，投资人继续火速杀出持股，市场哀鸣四起，一片愁云惨雾，指数“如自由落体急速挫跌”，不到半小时，由于下挫指数超过550点，又一次触动自动限制交易电脑程序系统，这一次必须中止交易1小时。这才提前半小时结束了惊心动魄、昏天暗地的一天。

纽约股市惨状令人不忍卒睹。这是又一个“黑色星期一”：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下跌554.26点，以7161.15点作收。按绝对跌点计算，超过十年前格林斯潘刚上任时那一次“黑色星期一”的508点的纪录，改写了有史以来最大单日跌点。

以高科技股为主的奈斯代克综合指数（Nasdaq）也史无前例地暴泻

115.43 点，跌幅达 7%，创下单日最大跌点记录，远高于 1987 年 10 月 19 日下挫 46.12 点；另一种重要股票指数斯坦普五百（S&P500）终场也狂跌 64.65 点，跌幅达 7.4%。

尽管自动限制交易系统两次启动，但当天交易量仍然大得惊人，总计高达 6 亿 9561 万股，估计仅这一天股市价值损失就达到 6000.4 亿美元！

纽约股市历来是全球股市的神经中枢。创下新记录以后，世界各地议论纷纷：难道“黑色星期一”真的幽灵重现？

连锁反应中的一环

投资人杀盘突围的白热化杀气，早惊动了联储会主席格林斯潘。他和财部长鲁宾、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亚瑟·列维特、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勃恩等财经官员。高度注视股市发展，紧急密集磋商，鲁宾在华尔街收市后立即亲往白宫汇报。白宫早已得悉这一情况，克林顿透过发言人麦克瑞呼吁投资人冷静以对，并强调目前美国的经济基本面健全良好，投资人无需忧虑，以安定人心。

纽约股市道·琼斯指数跌幅 7.18% 的消息立即震撼全球，连锁反应一一显现：德国股价交易报价系统 28 日开盘因卖单蜂拥而至，延迟 5 分钟。当日同样遭受中断股票交易厄运的，还包括巴黎股市。

香港股市恒生指数在 1997 年 10 月 23 日（星期四）已经创下一次狂跌的纪录：下跌 1222.5 点，跌幅 10.41%；没想到更大的厄运接踵而至：纽约这一天股市狂泻冲击香港，使香港恒指记录马上改写有史以来新的最大单日跌点，28 日重创 13.7%，狂泄 1438.31 点；随后又引发亚洲其他股市及欧洲股市的接连下挫：东京日经指数跌落 725.67 点，跌幅 4.26%，以 27 个月以来的最低价收盘；台湾股市加权指数也下跌 5.9%；汉城综合指数下跌 6.6%，跌破 500 点大关，达到 1992 年 8 月以来的最低点。

雅加达、曼谷、新加坡、吉隆坡、马尼拉、悉尼等亚洲其他股市，也同样被笼罩进愁云惨雾。

专家聊以自慰的是，虽然这一天纽约道·琼斯指数单日跌点，冲破了 1987 年 10 月 19 日“黑色星期一”单日跌点的历史纪录，但是，因为现在的道·琼斯指数基数比十年前大了许多，相对而言，跌幅只有 7.18%，大大低于十年前的跌幅 22.61%。由此看来，这一次纽约股市的动荡远远小于十年前的力度和幅度，有人不无辛酸地说，这个星期一充其量是“褐色的”。

如果说，十年前那个“黑色星期一”，是在美国经济形势日益恶化时爆发，当时美元贸易逆差急剧增加，最终无法承受，美元汇价下跌了约 10%，终于造成那一次创纪录惨跌；而 1997 年这一个“黑色星期一”，则是在美国经济形势看来良好的情况下发生：美国经济增长率上升，通货膨胀率 1997 年头 9 个月仅为 1.8%，低于 1996 年的 3.3%，失业率在 9 月份为 4.9%，明显好于其他许多发达国家。这次暴跌，看来主要是心理因素——是投资者和投机者对于前途信心发生动摇的非理性的反应。

也难怪他们。美国股价扶摇直上，也使风险骤升，三年来道·琼斯指数上涨一倍，尤其是最近两年，道琼斯工业指数突破 5000 点后，一路直冲 8000 点大关。支撑股价上涨的上市企业的获利能力经过长达 6 年之久的美好时光，特别是涨幅甚大的科技股是否能继续支持股价的蓬勃发展，使许多人越

来越捉摸不定，心里发虚：一旦美国企业投资巨大、贸易频繁的亚洲地区出现动荡不定的金融形势，并殃及这些企业，老天！

他们担心的噩梦终于成了现实。东南亚，特别是 10 月 23 日香港股市急剧波动，冲击波终于在 10 月 27 日波及纽约。

人算不如天算

确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汇市、股市，环环相扣。纽约股市这一天的狂跌，实际上是受香港股市之前数日狂跌的拖累。而香港股市那一次狂跌，又不过是一场刮了数月之久的黑色大台风掀起的险恶巨浪之一——雪球是越滚越大的。

人们对这次金融风暴，已经有了很多描写和分析。这场被有人认为堪与 30 年代大萧条相提并论的大危机，就连格林斯潘这样的聪明过人的高手，也未曾事先有所预感。事态的发展，用一句老话来说叫“说时迟，那时快”。

格林斯潘不是长期从事经济预测吗？为什么事先毫无知觉？有人更进一步质疑说，经济是可以预测的吗？

且不说宏观经济吧，就说股市，是不是可以预测呢？

经济学界有些可以被称为怀疑派的学者，断然宣称不可能预测。他们最近信手拈来的一个例证就是一家陷入绝境的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一公司有两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大师坐镇，利用巨型电脑，预测各种债券和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及回报，制定最佳投资策略，不也一败涂地？——诺贝尔奖算是倒了牌子！

然而，利用科技专业人才和强力电脑，确实是华尔街近一二十年来出现的一种新趋势。

人有没有可能预测股市，这是最富有争议性的难题。按照正统的股价理论，金融市场的表现完全是随机的，每种股票价格的涨落，就像一枚硬币，抛出去落下时究竟是哪面朝上完全不可预测。有关某种股票的历史表现，购股者的直觉，打听来的小道消息，投资专家的分析……都不能够肯定地预言明天、下月或者明年的股票价格。这一理论，正式专业名称叫“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简称 EMH），还有一个非常形象的名称，叫“醉汉游走假说”——股价围绕某一个数值的升跌，就像一个喝醉了酒的人在一根电线杆附近踉踉跄跄。

如果这种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那么，股市专家就完全是靠碰运气，他们帮人投资，也就完全是骗钱。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马基尔有一个著名的比喻，说用一只蒙住双眼的大猩猩，对着《华尔街日报》的股票版，随意掷镖来挑选股票，其水平也可以跟任何股市专家不相伯仲。

靠预测股市吃饭的投资专家，对这种正统理论不用说是嗤之以鼻的。事实也证明，正统理论确实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近十来年，一批物理学家、数学家和电脑专家进入金融界，确实发了大财。这些掌握了最新科技手段，又受过科技专业训练的人，自己成立投资公司，利用最新式电脑和高深复杂的数学、统计学知识钻研和预测股市，其投资业绩，远在一般公司之上。这又怎么解释？让专家也挠头。

1970 年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塞缪尔森（Paul Samuelson）、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尤金·法玛（Eugene Fama），麻省理工学院金融工程实验

室主任安德鲁·罗（Andrew Lo）……等数不清的专家学者在这一问题上投入了许多心力，但是都没有得到公认为准确度令人满意的答案。80年代初期，“混沌理论”非常盛行，被有人引申到经济预测的研究上来，但后来发现，也未免力不从心。例如，有人企图用所谓“低维混沌理论”，即用含有若干关键变量的少数两三个方程式描绘股市运动，但是后来人们发现，要真想描绘股市运动，方程式必须多达50个。而不论是两三个，还是50个方程式的“混沌理论”，仍然不能预测股市，因为初始条件的极为微小的变化，或者能够干扰股市的任何不起眼的因素，在相当短的时间内，都可以引起股市结果“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正应上那个有名的形象比喻：在南美洲一只蝴蝶扇动一下翅膀，可能引发中国长江暴发洪水。

事实上，数十年来对投资专家预测水平的研究表明，除了极少数例外，在某几年吉星高照、红得发紫的理财高手，在后来年份里却霉运连连，败走麦城。投资专家的表现如此，从事宏观经济预测的专家，难度就更高。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对于格林斯潘等人在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前的几个月还对全球经济走向大表乐观，就不会过于苛责了。

金融大鳄血洗东南亚

1997年，对东南亚各国来说是最不堪回首的一年。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了世界的这一隅。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一句话，很能代表东南亚国家人民的共同感受：我们花了40年建立起的经济体系，就被这个“带有很多钱的白痴”一下子给搞垮了。

这个“带有很多钱的白痴”指的是美国金融大炒家乔治·索罗斯，以他的量子基金为首的国际投机者，从5月开始选中泰铢作为首选目标，发动了攻击。泰铢、印尼盾、马来西亚元、菲律宾比索兑美元汇价狂跌；新加坡、韩国、台湾等亚洲三小龙也难逃此劫；刚刚回归的香港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5月份，投机商开始大举抛售泰铢，泰铢兑美元汇率大幅下跌。面对投机商气势汹汹的进攻，泰国央行与新加坡央行联手入市，三管齐下捍卫泰铢：动用了120亿美元吸纳泰铢；禁止本地银行拆借泰铢给离岸投机者；大幅提高利率。

善者不来，来者不善。金融大鳄闻到血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6月底，他们出售美国国债筹集资金，卷土重来，再度狠抛泰铢。泰央行奋起还击，但是泰铢贬值的浪潮一浪接一浪，兑换美元的汇率屡创新低。泰政府临阵换将，让财政部长交出帅印也无济于事；总理差厄利发表电视讲话重申“泰铢不会贬值，让那些投机分子血本无归”也只是虚张声势。泰国央行弹尽粮绝，仅有的300亿美元外汇储备早已花光，7月2日被迫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放弃长达13年之久的泰铢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当天，泰铢重挫20%，终于失守。

几乎是脚跟脚，菲律宾比索汇率开始大幅起落，菲央行竭力抵抗，但大势已去，无力回天。7月11日，菲央行宣布允许菲律宾比索“在更大幅度内波动”，菲币顿时贬值惨不忍睹，比索保卫战全面失守。

马来西亚央行企图拉高沽空马来西亚林吉特的成本来阻止投机商的兴风作浪，印度尼西亚政府也入市支持印尼盾，但终挡不住投机商强有力的进攻。

7月24日，马币跌到了38个月以来的最低点；印尼先把印尼盾对美元的浮动范围从8%扩大到12%，8月13日，印尼盾贬值至历史最低点，第二天，印尼也放弃保持本国货币的浮动范围；唇亡齿寒，尽管采取了诸如拉高利率等措施，一向有“避难货币”之称的新加坡元兑美元的汇率也持续下跌。

10月17日，台湾终于弃守新台币汇率防线。数天以后，新台币对美元的汇率也从10月1日的28.602比1，跌至10月31日的30.944比1。至此，港币成为该地区惟一坚守对美元汇率的货币，从而成为投机商打压的目标。

东南亚货币狙击战弄得人人自危。国际大炒家咄咄逼人的气焰，使得国际社会认识到应该集体应付货币危机。7月25日，中国、澳大利亚、日本、中国香港特区、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等亚太地区11个国家和地区中央银行和金融管理局高层代表，在上海开会发出共同声明：一个稳定的货币市场是非常重要的，亚太各国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研究，对有关国家提供新援助，协助成员国在必要时进行经济调整。这个消息，对东南亚各国来说，至少让他们觉得在自己与国际大炒家进行殊死搏斗时，不再显得那么孤单。

8月5日，泰国同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附带苛刻条件的备用贷款计划及一揽子措施。8月11日，世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行长在日本东京举行会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承诺分担为泰国提供总共160亿美元（后增至167亿美元）贷款，其中中国和香港各自承诺借出10亿美元的贷款。

8月20日，东南亚各国货币汇率暂时回稳。然而，就像暴风雨前夕，平静的外表下孕育着一片杀机，仅仅持续了几天，东南亚各国还没来得及揩身上的血迹，8月底，新一轮令人目瞪口呆的跌势瞬间而至，这一次，把东盟成员文莱也拉下了水。

大炒家赢红了眼，杀红了眼，得势不饶人，剩勇追穷寇，集中火力扫荡东南亚。直到11月上旬，黑色风暴才渐趋平静。东南亚所有国家和地区货币都被迫贬值，泰铢、印尼盾、马币、菲律宾比索兑美元的汇率已经分别下跌了32.2%、32.1%、24.9%和19.4%。

在这场危机中，受害最惨的非泰国莫属，金融风暴把这个国家一下子砸到了谷底。而在此以前，泰国以继“四小龙”之后的亚洲“四小虎”之一而相当自豪。泰国人会以一种轻松的语气说正准备去欧洲旅行。可是现在，“太平盛世”掩盖下的各种弊端一一暴露出来，泰国人目瞪口呆地瞧着大炒家从他们手里抢走了一切：家庭轿车被警察拖走、失业开始困扰自己、浪漫的欧洲之旅只好取消，孩子也只好转到便宜的公立学校……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说：“这个家伙（指索罗斯）来到我们的国家，一夜之间，使我们全国人民十几年的奋斗化为泡影。”

据估计，到9月为止，马来西亚排名前12位的富翁，仅在股票市场就损失了130亿美元；印尼总统苏哈托的子女们也被迫出售他们的公司。对东南亚人来说，他们过去拥有的大笔财富瞬间化为乌有，一个为吃饱饭而操心的时代，需要省吃俭用的时代已不可避免。但“曾经沧海难为水”，让他们分外难以接受这一现实。腰缠万贯的富豪，眼看着自己一半甚至更多的财产随风而逝，如何咽得下这一口气？

香港也有“黑色星期一”

许许多多香港人提起 1987 年 10 月香港“股灾”，仍心有余悸。1997 年 10 月，新一轮“大熊市”席卷整个香港股市。

有“购物天堂”之称香港，10 月 20 日，股市开始下跌。21 日恒生指数下跌 765.33 点，22 日继续下跌 1200 点。23 日，对于港元前景的担忧，使香港银行同业拆借利率节节上扬，21 日仅为 7% 左右的隔夜拆借利率一度暴涨了 300 倍！在这种市场气氛下，港股更连续第四次受挫，下跌达 10.41%。特区财政司曾荫权当天出面稳定人心说，香港基本经济因素良好，股市下跌主要是受到外围因素暂时投机影响，投资者不必恐慌，“我不认为这是股灾”。他认为，无论如何，特区政府首先是要捍卫港元汇率。与此同时，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也发表讲话，声称金管局已于前一天晚上击退炒家。

也许是因为特区政府强有力的干预措施，也许是因为特区政府和金融管理人士的信心感染了投资者，24 日，在连续 4 个交易日大幅下跌后，香港股市强力反弹，恒生指数上升 718 点，升幅达 6.9%。

但是，香港已经卷进全球各地股市形成的恶性循环式普遍狂跌。香港的狂跌冲击了纽约，反过来纽约的狂跌又冲击香港，一去一来力度更加放大数倍，28 日恒生指数狂泻，全日最低达 8775.88 点，下跌点数创历史之最。

对此，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强调，香港股市震荡只是暂时性调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表示，香港股市这种波动不足为怪，中央政府将依照“一国两制”的原则，不会直接干预香港的股市和港元汇价，北京方面对香港整体经济仍充满信心。

但对于索罗斯等人挑起的“看不见的战争”，香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绷紧了神经。人们都意识到：这批金融大鳄抢滩登港，咄咄逼人，决不能等闲视之。

早在 1997 年 8 月份，国际大炒家就几次试探性地对港币进行了冲击，8 月 14 日和 15 日，一些实力雄厚的投资基金进入香港汇市，利用金融期货手段，用 3 个月或 6 个月的港元期货和约买入港元，然后迅速抛空。致使港元兑美元汇率一度下降到 7.75 比 1——7.75 被称为港元汇率的重要心理关键点。香港金融管理局迅速反击，通过抽紧银根、扯高同业拆息去迎击投机者，让那些炒家面对坚壁清野之局，望而却步。

然而，炒家并不会就此罢手，双方血腥搏斗终不可避免。他们三番五次狙击港元的行动不仅志在港元汇价上获利，而且采用全面战略，要在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上获益。其算盘是，先在期指市场上积累大量淡仓，然后买上远期美元，抛出远期港元，大造声势。待港府为对付港元受到狙击而采取措施大幅提高利率时，股票气氛转淡，人们忧虑利率大升推低股市与楼市，这时投机者便趁势大抛期指，令期指“大跳水”。于是，股票市场上人心惶惶，恐慌性地甩出股票，炒家就可平掉淡仓而获取丰厚的利润。换言之，投机者虽然在港元汇价上无功而返，甚至小损，但在期指市场上却狠捞一笔。

香港当局分析了形势，针锋相对采取对策，以政策、舆论攻势双管齐下，坚决维护联系汇率制的稳定。他们的措施，一是动用庞大的外汇储备吸纳港元，二是调高利息并抽紧银根。一番对攻之后，港股在连续下跌中止住脚步并开始强劲飙升，主要是有中资及外地资金入市，24 家蓝筹、红筹上市公司从市场回购股份，推动大市上扬。加上中国大陆降低利率，也成为大市上扬的因素，令恒生指数急速反弹。在股市强劲反弹之下，港元汇价恢复稳定。

至此，这场惊心动魄的港币保卫战告一段落。

这一回合虽说以香港金管局的艰难取胜而告终，但是金融市场上已是哀鸿遍野。明眼人都清楚，国际金融炒家没有就此放弃对香港的觊觎。后来他们果然又多次进犯。

像一场瘟疫，这股“金融飓风”已不仅仅满足于在东南亚横行一时，伦敦、巴黎、法兰克福、莫斯科、圣保罗、布宜诺斯艾利斯、墨西哥城的股市都经历了一次历史上罕见的大震动，跌幅之大，令人目瞪口呆。

韩国好景“雨打风吹去”

一度被誉为“汉江奇迹”的韩国经济，曾因其高速增长而跻身为先进国家俱乐部之一员，并且以亚洲“经济典范”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可是1997年年末大台风刮过，昔日风流已被“雨打风吹去”。

韩国的经济何以脆弱到如此不堪一击呢？说起来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刚迈进1997年门槛，打击就接二连三：日元贬值给韩国出口以沉重打击，1月23日，韩宝钢铁工业公司无力偿还借款，拉开了1997年一系列大公司破产序幕。3月22日，三美综合特殊钢公司破产，导致连续四天股票大跌；4月21日，韩国最大酿酒集团商真露公司倒闭；7月15日，韩国第八大集团企业起亚集团宣布无力偿还债务；韩兴、代龙等集团或宣布破产或待援……源于东南亚的金融“祸水”则不失时机地转头北上，将韩国这只“病太极虎”冲向深渊。

从1997年11月开始，韩元兑换美元的汇率屡破历史最低纪录，11月6日更是惨跌至975韩元兑1美元的新低点，12月12日最终跌至1891.40韩元兑换1美元——短短两个月之内，即疯狂贬值50%以上。外汇市场衰退波及国内股市，股票价格指数跌破350点，创10年8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面对这种千疮百孔的局面，韩国政府使尽浑身解数。11月19日，临危受命的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院长官林昌烈宣布了一系列稳定金融形势的措施，如放宽韩元汇率的浮动限度，提前开放中长期债券市场，对经营不好的金融机构实行限令改革和兼并，等等。韩国中央银行也拼尽全力进行干预，以试图止住韩元疯狂下跌，但无奈外汇储备只有300亿美元，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干预显得苍白无力。况且中央银行在市场干预失败后，外汇储备仅剩可怜的70亿美元，远远不够偿还1997年底和1998年到期的1100亿外债。

到了山穷水尽之时，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美国、日本等寻求紧急贷款援助。12月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韩国签署援助协议，援助总额高达550亿美元。尽管援助的条件极其苛刻，韩国此刻有奶便是娘，已顾不得那么多了。迫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韩国政府被迫答应落实严厉的稳定经济计划，废除当初使韩国发展成为“经济之虎”的重要经济体制和做法，包括整顿金融、紧缩对大财团贷款、降低经济成长率等多项配合措施。这项金援计划不但打破金援纪录，受援国所须进行的调整幅度之大亦属少见。事实上，这一计划的签订几乎等于向国际上承认韩国整个经济体系的崩溃和自主权的丧失，也标志着显赫一时的韩国经济发展奇迹成为过去。韩国企业界沉痛地宣称：“我们已完全失去经济自主权。”《韩国日报》甚至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签署协议的这一天，与1910年8月29日的“国耻日”相比——那一天是韩国被迫割让给日

本的日子。

由于 550 亿美元的挹注，再加上韩国政府表示将放宽外资持有股份的限制由 23%提高到 50%，随后一周，汉城股市终于开始上扬，韩元汇价也有回稳迹象。可好景不长，12 月 7 日，韩国第十二大工业集团汉拿集团宣布破产，刚喘了口气的韩国金融又跌入深渊。从 8 日到 11 日，汉城股市持续低迷，韩元兑美元汇价连续下跌。

在金融风暴猛烈打击之下，韩国经济几乎陷入了瘫痪。韩国人坚忍、团结的民族精神在危难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民间发起了一人一元救国的运动，百姓主动把手中的美元存入银行，帮助国家从困境中解脱出来。笔者亲眼见到旅居美国的韩国人，纷纷把钱存进韩国银行海外分行，以期增加韩国的外汇；还积极捐出自己的金银珠宝首饰，或者变卖家产汇回汉城，帮助国家走出困境。韩国内阁部长、副部长们决定把各自薪金的 20%上交国库，“共赴国难”。

截止目前，韩国经济仍在低谷中徘徊。飘荡于汉城上空的那股黑色旋风随时会带来新一轮腥风血雨。韩国金融危机所造成的损失之惨重、影响之巨大、教训之深刻令人瞠目结舌。自去年以来，韩国企业蒙受了至少 3 万亿韩元的兑换差额损失，外债本息的偿还额增加了 4 亿韩元。企业大量倒闭、失业人数大量增加，目前实际失业率已高达 11%，这一趋势还在继续。

经济危机引起政治的动荡。金泳三带着其未竟的“整治腐败”之梦告别韩国政坛，留下来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给 72 岁的新总统金大中。

在援助韩国第一线唱主角

上面我们重点追述了泰国、香港和韩国在 1997 年的厄运。实际上，类似的悲剧爆发于马来西亚、印尼……这一年，一个接一个国家经济恶化，使得全球逐渐笼罩上惶惶不安的气氛。日本自杀人口增至 3555 人，增幅达 17%——日本这种情况与南韩极为接近，南韩中产阶级自杀率以 20%的速度成长。这是亚洲金融风暴的后遗症之一。亚洲除下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犹在苦撑外，其余国家可谓已全部“阵亡”。进入 1998 年之后，金融风暴淹没了亚洲，更向俄罗斯、拉丁美洲、北美洲扩延，8 月中旬，加拿大及墨西哥的货币贬值和需求锐减已不可挡，加墨两国乃是美国货物的最主要出口地区之一，1997 年高达 2230 亿美元，经济萧条的漩涡不可避免正蔓延到美国与欧洲……

这个时候，本书的传主——联储会主席格林斯潘在干什么？他如何看待亚洲金融风暴？

格林斯潘严密注视着亚洲金融危机的变化发展，广泛搜集着大量数据，分析着其动向和规律。但事实上，美国很长时间作壁上观，只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面干预。但是 1997 年圣诞节前一个星期，美国终于认识到韩国问题严重，一改半年来袖手旁观的态度，直接出手了。格林斯潘在援助韩国的第一线唱起了主角。

后来媒体多渲染所谓“关键的晚餐”，指的是 1997 年 12 月 18 日在华盛顿杰弗逊饭店里，格林斯潘和财政部长鲁宾，以及他们的高级助手的一次餐叙。在此之前，美国对韩国危急到什么程度若明若暗，因为美国驻韩大使一直未能确定人选，而韩国政府又对外界拒绝提供有关资产和负债的可靠账

目。格林斯潘曾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枉费力气地要韩国财政府提供外汇储备情况：“如果你不想跟我透露，你总得告诉一个人吧！”

12月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韩国签订了协议，虽然是格林斯潘为这一组织制定的要求，但是他还是不出面（后来他曾经批评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韩国等亚洲国家的解救“药不对症”）。因担心美国国会从中作梗，格林斯潘表示，联储会只会提供“一小笔贷款”——而且还是不到万不得已，不予提供。而克林顿提起韩国和亚洲，则是这种口气：“亚洲市场只是出了小故障”。

然而，韩国不是出了小故障，而是出了大事故。直到这一次饭局上，美国财政首脑们才醒悟到可怕的真相。就在这天早上，他们才得知，韩国外汇储备降到不足100亿美元，韩国经济离破产还有10天！

饭局上，电话响个不停。格林斯潘意识到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拯救危亡，要赶快向韩国提供数星期前作为“第三套备用方案”而准备的20亿美元的贷款。正是在这一天，韩国反对党领袖金大中战胜了执政党，当选为韩国新总统，克林顿要给他打电话表示祝贺。格林斯潘等人也就是在这张饭桌上商量如何给总统提建议，提醒总统这个电话该怎么措辞。

第二天，格林斯潘又和有关官员工作了整整一天，拟订援助韩国的一揽子具体方案和所要求的条件。12月21日早上的一次电话会议上，格林斯潘向七国集团中其他六国的副财长晓以利害，要他们确保他们的最大的商业银行予以配合。三天后，格林斯潘又在曼哈顿会晤了6家大银行的领袖，敦促他们放汉城一马，推迟向汉城提供的贷款的偿还期限。

当时正是圣诞节假期，格林斯潘和鲁宾“花了不少时间打电话到各种各样的滑雪场和加勒比海滨，寻找那些掌握全球命运的人”。

亚洲金融风暴对美国经济是“有利冲击”

格林斯潘的感受，当然与亚洲民众的感受大相径庭。他是美国的央行总裁，他首先着眼的是这场风暴究竟对美国经济产生什么冲击，他是从美国经济的成长为标准来区分好坏的；而他又是这么一个世界上体制最稳固、实力最雄厚的银行体系的首脑——同样九级台风，掀翻多少舢板小艇，万吨巨轮却可能安然无恙。当然，还有一点不能不指出：他不同于情绪化的一般股民，他的判断是建立在对事实进行严谨分析的理性基础上的。

10月的全球股市动荡，令许多投资者目瞪口呆。东南亚各国货币竞相贬值，投资者担心亚洲各国利率上扬，经济增长将减缓，抑制欧美对亚洲的出口成长，因此，他们抛售在亚洲市场投资或外销比重偏高的企业股票。汇率危机演变成股市危机。当美国摩根·史坦利公司建议把亚洲国家市场持股比重由2%降为零后，10月23日外资争先恐后撤离亚洲股市，香港股市首当其冲。而亚洲股市倾巢而出的卖压，终于又冲击到欧美股市，引发10月27日纽约股市暴跌。这一次动荡使美国股市的总值比一个星期以前减少5200亿美元。

但与别人唉声叹气大不一样，股票下跌似乎使格林斯潘松了一口气，他认为，这可能是一种“有利的冲击”。

说“有利”，大体上分为两方面。第一方面，因为股市下跌可能使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他一直担心过快的经济增长会带来通货膨胀，这次股

票下跌，使通货膨胀的压力释放了一部分。第二方面，股市这次动荡好像一次“破坏性测试”，而股市经受住了这一测试，说明了美国经济的稳固性、美国金融体制的稳固性。格林斯潘在强调整顿证券市场的时机已经成熟的同时，仍然坚持这一判断：情况还没有失控。他还认为，亚洲各国经历金融风暴的经历有力地反证，银行系统在金融方面的监管健全十分重要。

事实的发展似乎证明格林斯潘判断的正确：虽然人们仍紧张地注视着各个主要股市的大升大落，波伏浪起，不过，11月3日，即在道·琼斯指数狂跌之后第八天，道·琼斯单日上升232.31点，升幅达3.1%，成为有史以来第三个最大的指数上升日——亚洲证券市场凄风苦雨连绵不断，而美国股市经历过一场台风之后，很快又雨过天晴。

1998年2月底，格林斯潘仍然表示，联储会认为亚洲金融风暴将会把美国今年的经济成长速度减缓到2%到2.75%，因此对通货膨胀的威胁也将会减轻——换句话说，亚洲的噩耗可以转化为美国的福音。

然而，从1997年10月下旬纽约和香港股市交互影响的现象，毕竟说明全球正处在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时代。尽管全球各地对此次风暴的评说不一，但有一点已无疑义：投资和投机已经没有国界之分。亚洲股市下跌，美国股市不一定就能“风景这边独好”——即便是非理性情绪的急速传染和扩散，都可能造成彼此之间极强的冲击力。

从长期看，金融形势可能与经济走势相一致，但在短期内却可能受心理及操作手段的影响。截至1995年底，全球每天成交的外汇交易已经达到1.2万亿美元，是商品及劳务交易额的50倍。这些资金在全球各地的游动完全以获取高额利润为动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类似索罗斯所主持的各种避险或投机基金，在国际间总计可以动用大约6000亿至1万亿美元的资金。金融市场的原则是低买高卖，如果有利可图，投资者、投机者可能都会置其他而不顾，引发股市动荡。

然而，直到1998年夏，虽然格林斯潘说，他特别“感到不安的是”这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由一个国家波及另一个国家，同时表态说美国愿意帮助“受这次波动影响的国家”。但是，格林斯潘关注的重点还不在这里。如果说，这个世纪之交对经济的影响出现了两个新因素，经济全球化是其中之一的话，那么，格林斯潘在1998年夏天之前，注意力主要还放在另外一个上。

第十章 古稀之年转型

【格林斯潘不无惊奇地发现，自己竟从一个对付通货膨胀的坚决主战的“鹰派”，转变成一个新经济秩序的积极倡导人了】

71岁再当新郎

寰球天低云暗、风狂雨骤，相比之下，格林斯潘的私人生活倒是一片明朗。

对于格林斯潘来讲，1997年开年，意味着一个幸福的开端：他结束了40多年的单身贵族生涯，结束了与安德丽·米切尔13年的爱情长跑，第二次结婚了。

婚礼几个月前，《时代周刊》上公布了俩人订婚的喜讯；婚礼照片则登在《人物》杂志上——71岁的新郎，51岁的新娘，都是满脸陶然。

出席他们婚礼的嘉宾人并不多，格林斯潘一贯比较低调，只邀请了少数亲友，其中有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柯林·鲍威尔将军，有前国务卿、中学校友亨利·基辛格，还有格林斯潘的多年好友芭芭拉·华特丝等等绅士名媛。祝福他们的，还有米切尔一对心满意足的老父母——他们比格林斯潘大不了几岁，米切尔说，“他们非常喜欢他，都知道他对我好得不得了。”

这次婚礼，用得上几个中国人常常拈来祝贺新婚的成语：例如，“花好月圆”——七道大菜的婚宴虽然是在室内热热闹闹地举行的，然而，婚礼的仪式、宾客的接待，却都是在露天花园进行的，春暖花开，五彩缤纷，烘托出一团喜气；再如，“天作之合”——到他们的婚礼仪式刚刚结束，才下起了霏霏细雨，岂不算是天公成人之美，不忍扫兴？还有，“白头偕老”，虽说新郎离耄耋之年还有一段时光距离，但是说他“皓发白首”，可以说“虽不中，亦不远矣”。

米切尔说，婚后生活非常平静温馨。尽管格林斯潘交游甚广，老新郎还是最喜欢晚上和夫人一道安安静静待在家里。摆满热汤、沙拉的晚餐桌，每一个角落轻柔地回荡着古典音乐……这种气氛，是他最喜欢的“夜生活”。两个人或工作、或读书，有时看看棒球赛，听听音乐，他还喜欢读一些畅销小说。他们每星期一般出席两到三次派对，偶尔也约几位好友来家里聚一聚。

要是俩人中哪个出了门，俩人不能在一起，米切尔就会感到孤单。她说，他们俩人都喜欢旅行，所以他们极少外出度假。只有一次例外，就是到加利福尼亚去看网球赛。米切尔说：“要是他不用左撇子的绝招制人的话，我喜欢和他对打一番。”

有时候，格林斯潘参加派对，完全是给太太护航的。但他也会利用出席社交场合的机会，多与平时不常见面的人们交谈。

“格林斯潘将辞职退休”的插曲

这段期间还出了个小插曲：

1997年9月4日，美国金融市场上突然传言四起：“格林斯潘打算退休！”传言说得有鼻子有眼，说格林斯潘得了癌症，将辞去主席职务。这一天稍早也有人向白宫副新闻秘书洛克·哈特提问要求证实，格林斯潘是不是打算辞

去联储会主席？哈特答复说，“有关格林斯潘主席的身份问题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但记者们不甘心，后来又追问他类似问题。他表示，“如果他有意异动身份，我想他应该会通知白宫。”

答问未及要领，人们很难完全否定，信心产生动摇，市场行情一时也波动起来。好在这一传言马上有人告诉了远在加州的格林斯潘，他立即通过联储会发言人迅即加以否认，“这些谣言全无根据。”

作为全美国最懂经济的人，格林斯潘对自己的家庭理财方法自有一套。他自1987年担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以来，每年都申报财务收入。在结婚以前，他只简单地报告：自己“大多数资产放在价值超过100万美元的全权信贷基金里”。结婚后，他清算了信贷基金，和妻子共同拟订财务计划。专家说，格林斯潘“可能放弃了一年约数万美元的利息收入”。为避免发生任何利益冲突，免遭“瓜田李下”的嫌疑，格林斯潘远远避开了股票市场，将资金投入最安全的所在：短期国库券。

格林斯潘目前年薪13万6700美元，根据1998年6月29日提出的财务报表显示，到1997年年底，他的投资组合包括至少价值240万美元的短期国库券，至少46.6万美元放在保守的货币市场项目等，至少50万美元投放于某家公司债券，以及至少10万美元的马萨诸塞州债券。

他迎娶的新娘米切尔，自己有薪水，也有资产。她的投资组合，绝大部分是股票。

朋友们都说，格林斯潘古稀之年的第二次婚姻，给他带来了新生，使他的心灵也产生了新的变化。

或许是巧合？他在这段时间的经济思想，也进入了一个“转型期”。

百年一遇的深刻变革

过去几十年来，美国联储会主席的首要任务，都是抑制通货膨胀。格林斯潘上台十余年，主要注意力也在于把通货膨胀遏制在最低限度。

然而，时代不同了。格林斯潘对当今的经济有了不同的认识。1997年夏天，他提出了一个富有高度挑战性的问题：高科技的爆炸性发展，是“一个世纪出现一到两次的”改变经济运作旧秩序的“现象”吗？

自从1980年前后，美国几位未来学家如阿尔温·托夫勒、约翰·内比斯特等人写出了《未来的冲击》、《大趋势》和《第三次浪潮》一批著作之后，包括电子、光纤通讯、生物工程、空间技术等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突飞猛进，似乎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他们的预言。美国商业机器公司（IBM）、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微软公司（Microsoft）、英特尔公司（Intel）乃至近年的雅虎（Yahoo），由于抓住了技术创新这一关键环节，显示出极猛的发展势头，使美国经济的发展，相对于几个对手，具有了无可争议的优势：前苏联自然不在话下，而德国、日本这些在70年代末盛极一时的自由经济国家，也被远远甩在后面。

受到高科技的猛烈冲击，美国的产业结构、投资方向、企业重组都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夕阳行业加速下坠，朝阳行业加速飞升。打开这几年的报纸，几乎每天都有企业兼并的消息，金融、汽车、电子、通讯、大众传播、能源……除了同行业兼并，还有跨行业兼并。与之相伴的，还有大批裁员，人们感到了竞争愈来愈激烈，愈来愈无情。

不仅如此，与此同时，随着国际形势的极大改观，中国、苏联和东欧、亚洲一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和许多集权主义国家，相继开放国门，逐渐向市场经济转型，致使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日益加快。

科技爆炸是“一个世纪出现一到两次的”改变经济运作旧秩序的“现象”吗？这个问题，出自一位集中体现了严谨经济分析的美国中央银行主管之口，其意义非同小可。虽然格林斯潘避免使用“新经济”一类的耸人听闻的词汇，他却丝毫不敢低估经济变化的意义。他说过，目前经济的发展，“与半个世纪以来，我每天对美国经济的观察所见到的历次经济发展同样令人难忘”。

格林斯潘承认，联储会大概还需要花十年时间，才能充分了解正在进行中的经济变化，但他同时越来越确信，对高新科技的巨大商业性投资，已使经济在通货膨胀威胁比较少的条件下，成长得更快，持续得更久。

高科技是经济的新特点

这次经济变化究竟有什么特点呢？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思考，到《商业周刊》1998年8月31日报道格林斯潘时，他的思路已经相当系统了。这次接受采访，他的话题还是围绕着作为联储会主席时刻提防的“敌情”，即通货膨胀上。在他看来，当今高科技经济，本身就是抵御通货膨胀的“天然卫士”。

格林斯潘认为，这种高科技经济的三个特点是：

一、生产能力提高：在电脑和其他节省劳动力的新技术上的大量投资，正在收到回报，高新技术极大地提高生产率，使得失业率虽然下降，却没有引起通货膨胀。

二、全球一体化：全球经济的增长，加上技术的进步，使得各大公司的产品轻而易举地走遍世界——这就意味着，减少了产品积压引起的通货膨胀；这种全球性竞争的增强，不仅压制了美国工资的提高，也限制了企业承受高成本的能力。

三、工人的就业紧迫感：格林斯潘难能可贵地看到了如今劳动大军中这一场“相应的革命”，以此解释劳动工资为什么没有提高得更快——格林斯潘相信，如今的工人，承受着恐惧自己可能被淘汰的慢性折磨。经济全球一体化，加上企业大兼并、大裁员的惊涛骇浪，使得今天员工们在选择职业时的心理产生了一系列变化：为了不致被淘汰，现在的劳动者比上一代劳动者的适应能力更强，更乐于学习新技术；更为重视其职业稳定与否，而更少重视提不提高工资；他们也更愿意凭借工作能力强而多挣钱。这就降低了提高工资推动通货膨胀的风险。最近几年，企业裁员可能缓慢下来了，但格林斯潘还是相信，大裁员给工人心理上带来的余震，会延续得更久一些。

同时，他还指出，企业的管理阶层，在如何提高“资本的效率”、进行有效投资方面，也更聪明了。对这一点，联储会副主席瑞芙林完全同意格林斯潘的见解，她说，“我们简直有了整整一代人的管理人才，他们所想的与上代完全不同。”

令人吃惊的脱胎换骨

格林斯潘不无惊奇地发现，自己竟从一个体现工业化时代经济思想的坚

定保守派，变成了一个高科技新经济的前卫倡导者了。

对于年过 70，领导着美国经济走过了一段自 60 年代算起最好时光的老纽约客格林斯潘来说，这样的转变实在不同凡响。

如今，从格林斯潘的朋友们和同事们的嘴里，他已是另一种形象了。这位联储会的老总，越来越愿意检验一下他的论点，那就是，如今经济的运行，与在旧日经济圈中的运行非常不同：通货膨胀的风险已经越来越小。

格林斯潘甚至还表现出更为温和的一面来了——私下里还谈起低就业率的社会福利问题来了！让周围同事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有人回忆说：“1994 年，当他谈什么工人的不安全感问题的时候，开放市场委员会里的很多人都觉得他神经有毛病了。”

1997 年 1 月一天，格林斯潘和几位国会议员、政府官员一道，到洛杉矶 1992 年暴乱的发生地“访贫问苦”。他们巡视那些劫后五年仍空无一人的店铺，有感于曾给这个国家带来繁荣的经济发展，对重建这个被破坏的社区竟毫无一点儿帮助。格林斯潘后来对记者说：“我们的立法者整天接触着各种各样的数据，我认为，注意数据的下面是什么，是至为重要的。”记者很难相信，这么动感情的话出自格林斯潘之口——他一向采取的是高智力和不动感情的思维方式。他鲜少到工厂的车间，或是快餐店的厨房里去。除了偶尔拜访一下劳工领袖，他接触的人都是学者、官员、大亨。人们记忆犹新：他当年摆出最坚定的共和党人的架势，反对起民主党人由政府大把掏钱的社会福利政策来，真是不遗余力。再想想 1974 年到 1975 年的萧条时期，他这个白宫经济顾问，还说过经济的衰退“使股票经纪人比穷人受害更大”的话，引起一片声讨之声呢！

不过，如果你要说他不再会全力阻止通货膨胀，格林斯潘一定大觉冤枉。因为格林斯潘本人坚持认为，自从被里根任命为联储会主席，11 年以来，他的价值观的核心并没有改变。如果经济成长“真的过快”，他是会急下狠手，迅速提高利率的。

然而，格林斯潘说，虽然他的目标没有变，可是如今的经济局势变了：他倡导削减赤字倡导了数十年，现在削减赤字已经不必费太大劲了。如今的金融市场，正在扮演着中央银行早年刺激或限制经济的大部分角色功能，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会马上对经济的发展做出反应。中央银行于是就处于一种令人羡慕甚至嫉妒的地位了：它只消扮演一个仲裁人的角色，小小地提高或是降低一下利率，推动一下市场就是了。

人们都注意到了格林斯潘的这种变化。一位与格林斯潘时常会面的保守派学者朱迪·谢尔顿（Judy Sheldon）说：“他对于我们已经进入了新经济时代的可能性，持一种非常开放的态度。他确实相信市场经济自身的特性。”

从一个对付通货膨胀的坚决主战的“鹰派”，到新经济秩序的积极倡导人的转变，这对他制定货币政策，不能不产生极大的影响。

众人皆醉我独醒

让我们看看格林斯潘在转变了的思想指导之下，是如何具体行动——准确地说，在更多的次数里，是如何“不动”的。

90 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景气一直兴旺，而对经济过热的担心，也就一直挥之不去。

放在过去，经济发展如此之热，联储会主席早已经领导一班人，忙着为防止通货膨胀的加剧而拧紧水龙头、大踩刹车了。可是在三年里，联储会几乎没有对利率做任何改动。然而，“无为而治”，正是一种“治”：应该不动时就不动，这才是一种恰到好处的难得造诣。

1996年元月，格林斯潘打算再次降低利率，支持经济的“软着陆”。他当时又一次成了少数派——联储会不少委员觉得经济已经有点烫手，通货膨胀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了，质疑他再踩油门的必要。经过一番交换意见，他们多少有点勉强地还是同意了他降低利率的主张。后来的发展证明，他是

对的。1996年7月、9月和1997年5月，美国经济发展的势头更猛，也更使人担心通货膨胀一朝引发。联储会很多委员都摩拳擦掌，几次忍不住，向他建议把利率提高半个百分点，但格林斯潘几度说服同事：通货膨胀蔓延开来的威胁，并不确实存在。联储会听从了格林斯潘“冷处理”的意见，按捺下来，等等更多的数据之后再行动。果然他又是对的。

只是在1997年3月25日，格林斯潘同意过将利率略为提升四分之一个百分点，达到5.5%——这是作为一个“保险措施”，以防他对经济走向缓慢这一预测万一有误，通货膨胀不期而至。

说来也好笑，格林斯潘有任何动静，都会产生连锁效应传到股市上。当时正巧赶上是他4月份再婚这一终身大事的前夕。于是华尔街一些人半开玩笑半当真地盛传，他宣布提高利率，是免得那些炒家趁着他去度蜜月，把股票炒到天上去！

无为而治

1997年5月至7月，美国经济情况好得令人吃惊当时的经济增长率已达近6%，失业率降到了5%以下这是25年来最低水平。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按照过去的经验，联储会急切地提高利率了。联储会许多同事们对通货膨胀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精神高度紧张。

在联邦开放市场委员会6月份讨论利率的会议上，委员们相继发言。鹰派人物、旧金山地区银行的行长罗伯特·帕里，对美国的历史上罕见的低失业率可能引发通货膨胀表示了担忧，瑞奇蒙地区银行的行长小阿尔弗莱德·布劳达斯也表示有同感，声称如果联储会再不采取行动，通货膨胀就会到来了；联储会委员、全美国最著名的经济预测专家之一劳伦斯·梅耶也认为，经济增长已经过于强劲，因而难以承受了。

格林斯潘专注地聆听发言，一言不发。短暂的会议休息之后，大家重新回到桌前继续讨论要不要提高利率之时，格林斯潘首先发了言，他表示，他不主张提高利率，因为“现在还不必要”，“美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出现了缓慢下来的征兆”。他坚持要大家放宽心，认为此时不必过于担心通货膨胀东山再起。他反复向大家讲明，美国人多年来在高新科技上的投入，最终转化为提高生产能力，这些提高了的生产能力自动压制着通货膨胀的蠢蠢欲动。

格林斯潘的话暂时勉强说服了大家，主导了整个联储会的决策。最后投票表决，几乎是全体一致同意格林斯潘的主张：保持利率不变，反对的只有布劳达斯一个人。

7月2日，联邦开放市场委员会再次召开讨论是否提高利率的会议。此

时又有了一个月的数据，显示经济确实有了缓慢下来的迹象，并没有明显的通货膨胀压力。格林斯潘在上次会议上的主张，现在得到了验证。这样，他的“暂不提高利率”的主张，再次占了上风，这次会议再次决定利率不变。

经济增长如此快速，失业率如此低，在过去，怎么能够想像被联储会旁观坐视而不提高利率、防止翻车？现在联储会却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听从格林斯潘的主张，一直按住利率不动。在这 18 个月中至少四次讨论利率的会议上，格林斯潘的意见始终占上风，压倒主张紧缩政策的同事。联储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委员说：格林斯潘“乐于让经济在一种比人们能接受的要更玄一些的状态下运行，一开起会来，大家起先都不同意他，但最终都和他站在一道——这种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开放市场委员会前任副主席约翰逊说：“他主宰着讨论利率会议，只要他还没出大错，他就一直想怎么就怎么。”

他近年来对形势认识和指导思想的变化，使华尔街人士相信，由于亚洲经济仍在恶化，格林斯潘可能打定主意，“联储会现在正确的方针，是为全世界提供通货”。还有人进一步说，即使亚洲明天稳定了下来，格林斯潘还是可能说，“经济发展的更大潜力，使他在没看到更多通货膨胀迹象之前，不会贸然提高利率”。

格林斯潘的新眼光不可能不引起与他现在和过去的同事的思想分歧。有时候，他的认识实在超前太多，怎么也无法说服他的同事。不少人不时地对他的想法表示质疑，不愿意放弃以往行之有效的经济模式。比如联储会委员劳伦斯·梅耶和上一任副主席艾伦·布兰德（Alan Blinder）就认为，即使在今天的高科技主导的经济中，一旦失业率降低到低于 5.2%到 5.5%这条水平线，就有通货膨胀的趋势。其他人也以怀疑的语气问道，格林斯潘关于生产率的提高会自动压制通货膨胀的看法，是不是估计过高了？这不符合经济学许多经典理论的断言。

格林斯潘对经济趋势的看法却比较灵活求实——毕竟他受学院派模式的影响，远不如受实际数据的影响大。他直到 1977 年 51 岁时，才戴上纽约大学经济学博士帽，而他在这之前，已经先当过好几年福特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了。

数据作证 资料为准

格林斯潘的看法，当然决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他以专业经济分析方法每天搜集和分析大量的经济运行数据。遇到要研究什么经济难题，就一头扎进繁琐的统计图表，找出上千统计数字，翻个“底朝天”。

曾在 1991 年至 1997 年担任过联储地区银行行长的劳伦斯·林赛（Lawrence B. Lindsay），曾回忆联储会几年前一次会议。那次讨论到一场洪水已经阻断了密西西比河上几乎所有桥梁，造成货运中断，只有一座桥幸免。“格林斯潘不仅知道那座桥的位置，而且知道各种可以用来做运输的改道路线。”

如今，格林斯潘更加大量依赖统计数据来引出结论，他甚至发展了自己的私人数据来源。在联储会 11 年来，他手下的研究人马定期追踪的数据数目，已经翻了 3 倍，多达 14000 多个，其中有一些是格林斯潘自己亲自汇集和组织起来的。有人开玩笑说，那些复杂庞大的数字体系，除了他自己以外谁也摸不清门道。克林顿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珍妮特·叶兰，曾经试过解读

格林斯潘的信息体系，可是她最终也败下阵来：“我觉得我也不打算弄明白它了，太复杂了，不是我能摸着门的。”

格林斯潘特别喜欢引用偏僻数据，这种引用往往镇住了其他委员。但也有人指出，他引用的有些数字再仔细推敲一下，就暴露出并没有充分的说服力。有人还翻出老账，认为90年代初，格林斯潘正是被有些数据“蒙蔽了”，于是过高地估计了当时经济复苏的势头，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消费者信心急遽下降之时，没有及时降低利率，结果未能防止一场经济大衰退。

但是，叶兰和格林斯潘其他一些同事们也都承认，经济如同军事，在这个战场上谁也不是，格林斯潘也不是无所不能、无往不胜的神明，但他却是一个高明的统帅，他的判断对的多、错的少，这就很难得了。

格林斯潘对经济统计数据的那种着迷，确实使他比大家先一步认清经济趋势，有时真令人惊叹他的“料事如神”。

比如90年代初，他预见到了信用危机导致的“逆风”，使恢复的到来拖了很久；再比如1994年2月，他发起了反对通货膨胀的“先发制人进攻”。当时引起了争议，反对者说，这时候再反什么通货膨胀，就会引发又一场萧条，可他却别具慧眼，看到了他们茫然未见的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由于他实施的举措得法，经济平安“软着陆”，开创了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经济上升时期之一。

格林斯潘何以能有如此权威？你当然可以说，是联储会主席这个职务所赋予他的，而并不完全缘于他本人的本事——这个宝座不论谁坐上去了，都能够呼风唤雨，成为股民、投资人的“上帝”；然而，你如何解释，他能够稳坐在这个宝座上达三届之久？“没有金刚钻，莫揽瓷器活”，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连任，则说明格林斯潘必定不是个等闲之辈，他必有他的几套高招、绝招。

有过这么几次“众人皆醉我独醒”，大家不得不服气，包括当时不同意他的分析和举措的人也心说诚服。这样，格林斯潘在联储会和联邦开放市场委员会里树立了威信，使他能够超过在过去看来不可能被允许超过的界线，即使他提出一个许多人都摇头的见解，同事们也越来越愿意先忍住自己的怀疑，不急于大声反对，而宁可仔细在心里盘算一下，对格林斯潘的直觉交付更多的信心。

格林斯潘的“不动”，使他赢得了巨大的声望。崇拜他的人们，觉得他是个金融奇才。经济学家阿伦·辛奈赞叹不已地说：“格林斯潘领导联储会，是美国历史上的常胜将军。”

第十一章 “艾伦，那是你的新方向吗？”

【当格林斯潘仔仔细细地分析亚洲金融风暴的成因和后果，终于越来越忧心忡忡：美国会不会成为倒下的最后一张多米诺骨牌？】

世界经济的十字路口

1998年，美国经济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世界经济也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联储会主席办公室，堪称十字路口的导航室。走进这间办公室，人们会惊讶格林斯潘广泛的兴趣。在他的书架上，不仅摆着斯坦福大学经济教授约翰·泰勒（John B. Taylor）等人的经济学巨著，还摆着大部头的政治专著，包括格林斯潘最喜欢、最看重的那本鲍伯·伍德沃德（Bob Woodward）的《总统日程》（The Agenda）。

伍德沃德，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和同事卡尔·伯恩斯坦一道，穷追不舍地追踪报道尼克松水门事件的《华盛顿邮报》记者，他的所有著作，都以揭露不为外人所知的内幕细节而著称。他的一本畅销书《选择》（The Choice），第一次印刷，就是60万册。《总统日程》一书是他追踪刚当选的新总统克林顿18个月后写下的，展示他治下的白宫是如何运作。作者把读者带到国家的最高层会议上、最激烈的辩论中、最难作的决定面前，以及内阁和总统本人的最核心深处。伍德沃德逐日地、逐小时地、有时甚至是逐分钟地记录了克林顿在辩论、斥责、辩解、赞美、暴怒中的真实形象。书中还对克林顿周围最亲密的顾问圈——包括第一夫人希拉里、副总统戈尔、财政部长本特森，以及白宫工作人员和白宫之外政坛要角，有着生动的描述。这本畅销高达80万册的书，也为格林斯潘所钟爱，说明这位金融帝国的掌门人确实还颇有政治兴趣呢。

环顾他的办公室四周，人们对格林斯潘广泛的政治交往更会惊叹：墙上挂着他与俄国总统保里斯·叶利钦、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以及四位任命过他的美国总统的合影。在与当今总统克林顿的那一帧合影上，克林顿的诙谐题词说：“艾伦，你指着左边，那是你的新方向吗？”

这句话值得品味。玩笑话，话外有话？新方向是什么？

美国当前经济为半世纪来最佳

时至1998年上半年，联储会主席虽则说话小心谨慎，留有余地，但是他对美国经济的发展势头相当满意，对前景也相当乐观。

1998年6月10日，格林斯潘到国会作证时说，美国目前的经济情势，是他“近半个世纪以来见过的最佳表现”，他援引经济学家的话说，学者甚至相信，“美国当前连续第八年的景气增长期，极可能打破记录地持续到公元2000年而不坠”。

格林斯潘列举了他所认为的美国经济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好状况的几个表现：

一、景气持续发展：自1990年以来，美国步入连续第八年景气循环扩张期，1997年以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幅为代表的经济成长率，达到3.8%，

不仅是十年来最佳纪录，也和加拿大并列七大工业国之冠，今年第一季经济增长率更高达 4.8%，这么强劲的走势，频频出乎经济学家的预期。

二、物价逆势走低：美国近几年经济最惊人之处，在于经济维持强劲扩张之际，物价还能控制得宜。去年消费者物价涨幅仅 2.3%，低于前年的 2.9%；今年前 4 个月物价仅上扬 0.2%，以过去 12 个月的纪录来看，物价增幅仅 1.4%，这是 33 年来第二低的纪录。

三、失业率频创新低纪录：美国去年失业率平均 4.9% 时，经济学家即已一再辩论美国就业市场充分就业可能引发工资上扬，进而推高物价；但一年多来事实却显示，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这两个传统经济学理论上绝难两全的指标，在美国却奇迹似的同时走低。统计显示，今年四五月份美国失业率都仅 4.3%，创下 1970 年之后 28 年来的最低纪录。

政治经济学上有个术语“痛苦指数”，即失业率加通货膨胀率，前者代表“收入无着”，后者代表“所得缩水”，两者都使人民生活痛苦。以“痛苦指数”来衡量，美国 1998 年第一季的低于 4.5%，创下美国有史以来的新低点。

四、联邦政府预算 20 年来首见盈余：正如克林顿所说，美国今年是自阿姆斯特朗 1969 年登上月球以来，联邦政府收支第一次由赤字转黑，4 月份的联邦政府收支结余 1250 亿美元，更创下美国建国 200 多年来单月最高结余。

过去美国五任总统都在为“寅支卯粮”伤神，如今拜个人所得与企业盈余增加，使国库收入日增，美国人终于可以告别要下一代背负债务的历史，共和党领导的国会甚至已积极推动减税计划，要将结余“还给人民”，以刺激更多民间经济活动。

五、华尔街股市连续第四年创新高：股市的表现要看长期，而非一两星期的波动，过去三年来道·琼斯工业指数涨幅累计达 82%，创下美国股市开市百年来任何三年的最大涨幅，1998 年夏天美国股市又由去年底的 7900 点，登上 9000 点历史关卡，“万点大关将指日可待”。

经济学家估计，自 1994 年以来，美国股市连年飙涨已使美国家庭资产总计增加 12 万亿美元，这些财富转化为消费市场购买力，民间消费的强劲带动内需市场扩大，成为美国这几年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

说句老实话，以上五方面成就，确实非同小可。有了其中两项三项，美国总统在国情咨文中，都可以拿出来夸口政绩如何显赫。如今竟是“五项全能”，在全球经济昏暗的底色背景上，简直灿烂夺目，难怪一向不喜形于色的格林斯潘，也禁不住要如数家珍地一一列举。

根据格林斯潘的观察，美国当前结合强健经济成长与低通货膨胀率，实为他过去近半个世纪所见过的最佳表现，而且美国经济“尽管有迹象显示受到亚洲的拖累，但今年仍维持强劲，同时通膨也持续低档”。

格林斯潘还信心满满地说，美国 1997 年的经济产值首次突破 8 万亿美元，占全球五分之一强，美国这个超强经济体的稳健经济成长，已冲淡亚洲金融风暴对全球经济的创伤；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内需市场的扩张足以抵销亚洲金融风暴的伤害，适切的货币政策与政府、国会携手平衡联邦预算，则进一步奠下美国经济稳健迈向下一世纪的基石，美国人不仅正享受近 50 年来的最佳经济成果，而且，“除非重大战乱或国际变局，这种好景极有可能持续下去”。

美国经济是否可能“独善其身”？

正如我们在第九章所说，1997年夏季，在离美国万里之遥的亚洲，爆发了一场特大风暴。国际金融大炒家乔治·索罗斯等人，利用亚洲许多国家金融体制及监管体系不健全，投入巨额资金兴风作浪，造成了毁灭性后果。泰铢如同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无妄之灾又接连横扫东南亚各国，扫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疮痍；到年底，金融风暴不仅没有如同人们所估计的平息下来，反而变本加厉，愈演愈烈：韩国奄奄一息，日本落花流水。进入1998年，金融风暴继续扩散，俄罗斯、南美，都受到严重冲击。香港数度遭到狙击，连中国大陆和欧洲也感受到了其摧毁性的力度，赶紧森严壁垒，积极应变。

相形之下，美国经济确实显得一枝独秀。

股市是反应最灵敏的，其他地方出现爆炸性的大动荡，美国股市也会随之跌宕。但是从一个较长时段来看，不能不说，与其他地方股市曲线疲软乃至下滑相比，美国股市呈现一路扬升，似乎确实能够验证格林斯潘的高度评价。

就拿东南亚金融风暴倏然而起的1997年7月份来说，亚洲许多地方陷入水深火热，纽约股市却显示多年来少见的上涨劲道。美国报刊赞扬说：“这一切可以说是一个人的功劳：格林斯潘。股市攀升的动作从4月间开始，因为投资人已从格林斯潘那儿得到一个信号：对于先前他自己曾提到的股市‘非理性的繁荣’，现在他不怎么担心。也许他得到结论，基于上升的企业获利率及低水准的通货膨胀率，股市看涨是正确的反应。”

自从格林斯潘于1996年12月提到“非理性的繁荣”这个要命的字眼，导致股市出现一次大波动之后，格林斯潘后来说话谨慎得多，而股市走势也就一涨再涨。投资经理说，“乐观气氛又回来了。”奈斯达克综合指数1997年第二季度上涨18%，这是六年来最佳表现。

大型股的表现也很不错。斯坦普500指数第二季度上涨16.9%。这是该指数连续第十季成长，已经接近60年代连涨11季的纪录；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来，远远超过了上一次纪录：过去两年半以来上涨了99%——仅从1996年12月间以来的半年，就已经上涨23.2%——而前一次连续两年9个月上涨也只涨57%。

然而，毕竟亚洲金融风暴扩散的势头已经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的国家感到了压力，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心烦意乱：美国果真能够成为世外桃源？

但是让人困惑的是，格林斯潘和他主持的联储会又扮演了反潮流的角色。在这个时候，他却又一反前一段时间坚持要大家对通货膨胀放宽心，固执地不肯提高利率的立场。格林斯潘一再提醒人们注意“通货膨胀”这个头号大敌，联储会其他成员更是如此，话里话外，都透着手已经放在水龙头上，要随时拧紧、提高利率的架势。

例如，格林斯潘指出，持续上升的美国股票价格“已经引发是否能够维持下去的问题”，他建议投资人采取审慎态度，因为投资人可能会在“风险低得不切实际的态度”下进行操作。格林斯潘在半年一次的国会听证会中强调，联邦储备委员会对他在1996年12月提出的股市是否“非理性的繁荣”，还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在目前的环境下，有必要严密注视这个问题。

格林斯潘向参议院银行委员会表示，“很明显，投资人在长期经济平稳

的环境下，似乎很容易对未来感到乐观。”他表示，过去一年美国经济的表现非常之好，但联储会还是注意到，通货膨胀的走势，是向上而非向下。联储会对这种可能影响经济成长的失衡情况高度警惕。不过他也表示，虽然联储会对可预见的通货膨胀会先发制人，但也不会时机未成熟时即过早行动。

老主席遇到了亚洲金融风暴新问题

自从亚洲国家相继发生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人一直有种厕身事外的态度。虽则有人满怀怜悯，有人伸以援手，但还只是基于一种对陷入水深火热的国家里可怜人的人道关切，甚至多少有点庆幸：灾难还好没有落到自己头上！美国人虽然也有很多头疼问题，却一直认为亚洲金融风暴事不关己，只是在为经济发展是否过热的问题独自费神。

即使到了1998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肆虐一年，对美国经济的严重影响一一显现，格林斯潘领导的联储会仍然认为：美国经济运行中，通货膨胀抬头的威胁，要超过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性冲击。

7月11日，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听证会上，格林斯潘虽然警告说，亚洲的危机“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并且波及面会更广”；但他同时强调，从美国经济的热度看，联储会的“头号大敌”，仍是通货膨胀加剧的危险，因为目前美国国内市场的劳动力紧缺情况依旧。

正如我们上一章所谈到的，格林斯潘充分地认识到了高科技的重要意义。但他同时也认为，技术增长的潜力，或许是无限制的，但劳工增长的数量，却是有限的。按照现在的经济成长速度，渐渐地就会出现劳动力紧缺。物以稀为贵，人也以稀为贵——劳动力紧缺了，也就会使工资上扬。格林斯潘在确定货币政策时，必须时刻考虑这一个现实。因此他希望美国经济的增长能够适当放慢速度，如果经济增长的幅度过快，不能自行控制在安全的范围之内，联储会就有必要采取提高利率的行动，防止经济过热。

对格林斯潘这番道理，人们倒也提不出反对意见。但是人们还是小吃一惊：在经济衰退的阴影越来越浓的关头，格林斯潘不仅不降低利率，反而暗示了可能提高利率？

格林斯潘这个“模糊语言大师”，进入1998年，就加倍模糊得让人难以捉摸。但这一次，他坚持不懈与通货膨胀作战的态度十分明确。

经济，作为一个受多方面因素综合制约的体系，究竟将何者看成一段时间内的主要制约阻碍因素，常常人言言殊。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将眼睛盯住了这场被视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严重经济危机，这场可与1929年世界性大萧条相比的金融风暴。它的深度、广度，都远远超出人们原来的预料，它注定要促使一向具有先见之明的格林斯潘发生转变。

经济全球一体化五味俱全

看来，还要从头再思考经济全球一体化。

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不可阻挡的进程，在它到来之前，曾使人梦寐以求；在它到来之时，曾使人欣喜若狂；但是在它到来之后，人们却惊悟到：原来它带来的不光是甘甜，还有酸，还有涩，还有苦，还有咸——即便是对美国

这个竞争强者。

美国作为世界经济中的超级庞然大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占据极大优势，为了自己的利益，让自己的商品、资金能够畅通无阻地冲入各个国家和地区，美国不遗余力地鼓吹经济全球一体化。尽管在这一进程中，不时也发生令美国人气结的事，比如，70年代初期以来，羽翼丰满起来的日本，商品与资金大批进入美国，不仅本田车、丰田车潮水一般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川流不息，压得美国汽车工业喘不过气来；而且日本财团大批购买美国的房地产，连可以说是美国招牌之一的洛克菲勒中心，也被日本财团买走，这让一贯自认为是全球首富、天下第一的美国人感情上怎么接受得了！

然而，尽管遭到这些失利，许多美国人却认为，这并非经济全球一体化之过，而是日本人对经济全球一体化，顽固地不肯撤除关税壁垒之过。一方敞开门户，任其出入，而另一方紧锁门扉，挡三阻四，致使双方条件不对等，就像俩人比武，一人捆住手脚，另一人则放开手脚，在贸易战中落入下风，就难怪了。“你完全开放，咱们再来练练比比看！”

这一次，则完全不一样。

经济全球化本身的弊病暴露出来了，而且越来越冲击到自认为最稳固的美国本身，这也就是说，美国鼓吹最力的经济全球化，其深刻的内在缺陷反过来拖住了美国的经济。美国本来只从经济全球化中得利的（或者说利多弊少），现在却要从经济全球化中受害了！

当格林斯潘及其手下的联储会以及经济专家们，仔仔细细地分析金融风暴的成因和后果，终于越来越忧心忡忡，陷入了长考。

金融市场上的骨牌效应

1997年夏天，人们说“东南亚金融危机”，到了1997年年底，人们改口说“亚洲金融危机”，但是再过半年，人们又改口说“全球金融危机”。这场从泰国等小国家开始的风暴，一路延烧到韩国、日本、拉丁美洲和前苏联集团——几乎全球经济的一半都受到波及。美国大型机构投资者如避险基金（对冲基金）、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以及跨国公司，都因国外投资受到重创，获利大幅缩水，再进而影响美国股市下跌。

许多人都不无惊恐地发现，这明显呈现出“多米诺骨牌效应”：一块接一块地倒下。这种效应，60年代时，美国和西方的政治家和学者曾经运用在“遏止共产主义扩张”的冷战之中。美国之所以坚持要卷入越南战争，并扩大到周围国家，就是因为害怕“多米诺骨牌效应”：担心如果北越将南越“赤化”了，以后一步一步就会轮到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都丢给“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集团”。

现在这一多米诺骨牌效应，倒真是在东南亚出现了。虽然这次不是政治，而是金融经济；起因也不再是“共产主义集团兴风作浪”的“扩张阴谋”了，而是经济全球化的内在弊病，是资本体系本身造成的经济衰退。但是其春风野火般蔓延的速度，简直比当年共产主义浪潮的冲击速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摧枯拉朽的破坏力，也不遑多让。

美国会不会成为1997年7月从泰国开始蔓延的金融风暴中，倒下的最后一张多米诺骨牌，倍加受人瞩目。而格林斯潘这一段时间的讲话，透露出他确实一直在研究金融风暴造成的冲击，不过，他仍然保持他一贯的风格：多

思，慎行。

联储会开放市场委员会 3 月 31 日的会议记录中显示，亚洲经济危机对美国经济增长并没有造成预期中的“拉力”。但尽管如此，与会的银行家们却一致倾向于支持调高利率。

1998 年 5 月 22 日格林斯潘和鲁宾俩人为替克林顿总统多争取 180 亿元的经费投入国际货币基金，而出席众议院农业委员会，他发表演讲时说：“联储会目前所关切的问题和 2 月份时是一样的。尽管亚洲的危机现象已经有所改善，但是现在还不能预知以后的结果。”

他坚持认为，全世界的经济局势，迄今并没有受到亚洲经济风暴太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如果再发生一次类似的经济危机，将会对整体经济造成“负面效应”。

格林斯潘字斟句酌地说，亚洲经济危机“对美国和其他工业国家的影响层面不大”，但是他同时警告大家不要过于乐观：“我们现在才刚刚感受到它所带来的影响。”

财政部长鲁宾对格林斯潘的警告表示赞同。他说，亚洲的经济危机虽然目前已经大部分被控制住，但是它对美国经济的直接影响才刚开始。今年度美国出口额剧减了 230 亿元就是一例。他说：“在未来的数月内，情况恐怕还会持续恶化。”

但 1998 年夏天出现的一件紧急事故，格林斯潘却顿时果断出手；而一出手，又顿时使联储会招来一大堆批评。

拯救“长期资本管理”对冲基金

“玩火自焚”这句成语来形容一些国际对冲基金，实在是非常合适。

金融市场的动荡历经两年后，不仅没有风平浪静，反而因为一些在金融市场上一呼风唤雨，使多个新兴市场陷于灾难的国际对冲基金本身陷入困境，而变得更加诡异莫测。

1998 年 9 月，华尔街上出了个大新闻：对一贯玩火却引火烧身的对冲基金，有劳联储会出面拯救。

倒了大霉的是美国一家称为“长期资本管理”（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的对冲基金。这家总部设在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基金公司，在债券市场投资失利，资产值由 1998 年初近 50 亿美元，锐减至 9 月初的约 5 亿美元：半年时间玩火被“烧掉”了 90%！

对冲基金（Hedge Fund，台湾称“避险”基金），即替投资者对冲投资风险的基金。要说投资公司陷入困境并不稀奇。市场如战场，胜负乃兵家常事，存亡也是司空见惯，即使有两个世纪历史的英国老字号巴林银行顷刻倒闭，人们也只是表示表示震惊，同情地耸耸肩而已，说不定还因为少了一个竞争对手，而暗自庆幸呢。但是这一次却非同寻常：对“长期资本管理”的投资失败，华尔街表现得忧心如焚，在联储会推动下，纽约联邦储备地区银行出面牵头，金融业巨头联合出手，于 9 月 23 日在位于曼哈顿下城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大厦达成协议，向该基金注资 35 亿美元以应急，随后又宣布接管这家公司。

参与伸以援手的，除牵头的纽约联储银行外，包括 15 家世界著名银行及金融机构，其中七家来自欧洲。它们都是享誉金融界的巨擘，如摩根—斯坦

利、美林证券、德意志银行，等等，这些公司都与该基金有直接交易或投资。

联邦储备银行直接卷入这么一个挽救对冲基金的行动，算得上极不寻常——就在前不久，格林斯潘刚批评香港金融管理局出手干预股市呢。对冲基金作为一家私人金融机构，基本上没什么监管，在全球范围从事风险极高的金融投机。美国奉行自由竞争，政府对私人公司的起落从来是坐山观虎斗，黄鹤楼上看翻船。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华尔街为什么一反常态，急忙拯救一家投资失败的私人基金？

淹死的都是会玩水的烧死的都是善玩火的

我们从欧洲股市如何反应“长期资本管理”的失败中可看出一些端倪。

9月25日，在对“长期资本管理”巨额资金投注之后，华尔街又宣布了对“长期资本管理”的接管与拯救，欧洲的银行股价全面下跌。德累斯顿银行，是仅次于央行——德意志银行的德国第二大银行，宣布由于它在“长期资本管理”的巨额投资，损失2.4亿马克。

此前一天，瑞士最大银行，也是全球第二大银行的瑞士联合银行，对它的股东及投资者发出通告，说是由于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对冲基金陷入困境，将导致该银行出现亏损。这个消息一公布，联合银行股票市值在第二天便流失了120亿瑞士法郎，股价跌了16%，跌到全年最低价。

瑞士信贷集团，也是参与拯救的财团之一，尽管一再安抚其投资者说他们今年的盈利状况良好，股价也在这个星期五掉了8%。

法国国家银行的股价跌了一成，另两家大银行巴黎银行与法国兴业银行下跌都超过一成。原因据说是这两家银行都参与了拯救行动，分别注资1亿和1.25亿美元，以巴克莱为首的英国银行也一样难逃厄运，这一天损失惨重。

一家公司的投资失败竟有这么大的震撼力，自是因为这家公司本身的业务能力。在全球3000多家对冲基金中，“资本长期管理”虽然1994年才成立，只算得上是个小字辈，但却是个地地道道的“巨无霸”。在华尔街，它被称之为“梦幻组合”（dreamteam）——人们都知道，这本来是人们对全美职业篮球赛（NBA）里的芝加哥公牛队的称呼。该基金之所以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在华尔街后来居上，一鸣惊人，所有的人都认为是因为这家公司领导层的“完美组合”。

“完美”到什么程度？该基金的五名首脑人物个个是响当当的厉害角色。第一号约翰·马克瑞卫泽（John McRiwether），在美国金融界重量级机构所罗门兄弟公司中，曾先是债券部门负责人，后升任公司副总裁。1994年，与其他几位学界及政界闻人创立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第二号人物大卫·穆林斯（David Mullins），前哈佛大学教授，曾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联邦储备委员会副主席。1994年辞官，转而投身“长期资本管理”。

第三号人物是罗森菲尔德（Rosenfield），也是前哈佛大学教授，他步马克瑞卫泽的后尘，也做过所罗门公司债券部主管。1994年投入“长期资本管理”。

第四、第五两位，往往被人们相提并论，是罗伯特·梅顿（Robert Merton）与麦龙·苏格勒斯（Myron Scholes），一位是哈佛教授，另一位为斯坦福

教授。最能镇得住人的是，由于在金融财务学领域的卓越成就，他俩于1997年共享诺贝尔经济学奖。虽然俩人是现职教授，却教商相长，与前面三人共同管理这家对冲基金。

由这些首脑人物的声名之显赫，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被称为“梦幻组合”了。这个“梦幻组合”中的几个人，都是格林斯潘的老相识。自1994年成立以来，一直到今年8月份之前，公司的投资回报率都在两位数，是华尔街的新神话，但他们在姿态上要比那位树大招风的索罗斯低得多。也正因为他们有这种背景及能力，华尔街及欧洲的许多大银行和金融机构不信任他们还能信任谁？而大银行投资与“长期资本管理”的操作相辅相成的结果，就是在短短几年时间内，“LTCM”（这家公司的简称）打响了在华尔街以至全世界金融市场上如雷贯耳的名号。

但是联储银行出手拯救“长期资本管理”，这是非常引起争议的一个举动。此举虽然拉拔“长期资本管理”幸免于难，脱离了凶险的倒闭危机旋涡，然而也引来众多批评，其中大都是针对联储会的。批评者认为，美国一向标榜“市场自由开放”政策，并且也积极向海外，尤其是惨遭金融风暴蹂躏的亚洲诸国推销此一观念，而联储会现在却出手干预援助一家私人金融机构，岂非自己打自己嘴巴？

说起来，这又是一个故事：就在不久以前，香港特区政府不甘被索罗斯等国际金融大炒客当成予取予夺的“提款机”，于8月中下旬入市干预，与炒客们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金融大血战”，几个回合之后，获得惨胜。对香港特区政府这一行动，格林斯潘于9月16日在美国众院银行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认为是“不智之举”。他对香港特区政府近来动用外汇买股票，强力拉抬港股的做法颇不以为然：第一，港府的“托市”（Jack up）行动绝无成功希望；第二，港府这么做的后果，将严重损害香港金融管理局长期以来建立的卓越信用，很不聪明。

9月16日说的话音犹在耳，仅仅7天之后，自己主管的联储会属下的纽约联储地区银行就出手援助“长期资本管理”，香港和其他地方的专家如何能不觉得格老自相矛盾？实际上，9月初，当这家公司求救说它的许多投资资不抵债之时，格林斯潘就着手开始拯救行动。一边口里那样说，一边手里这样做，言行如此相悖，岂不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

9月23日，格林斯潘在出席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的会议时，大声疾呼：“我确实认为，我们有必要将美国现存的不稳定性立即带到稳定的水平上，以避免金融风暴的危机扩散，影响扩大，对美国造成更大的打击。”

这透露出格林斯潘的一个主要担心：美国经济存在发生金融事故的危险——某一家大银行或者一家负债严重的基金突然恶性倒闭，就像英国的巴林银行、日本的大和银行、山一证券——以及这样的事件对全球市场及经济体造成的影响。联储会发出清晰信号：要不惜一切避免发生对资产价值带来严峻后果的整体性危机！

虽然他当时没有点名，但分析师们立即将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35亿美元的拯救计划与这番言论联系起来。这件同时发生的事，马上被援引为联储会极度担忧美国银行受影响的明证。

9月29日，联储会成员讨论了纽约联储地区银行促成收购“长期资本管理”对冲基金一事，认为这一措施是非有不可：该公司实在太举足轻重了，如果听之任之垮台，后果不堪设想。“在金融市场已一片动荡的情况下，突

然对它清盘，会导致全球范围内进一步的金融错位，而这又会波及许多国家，其中也包括美国。”

10月1日，格林斯潘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威廉·麦克当诺夫(William J. McDonough)联袂至众议院银行委员会作证，为联储会几天前出面拯救“长期资本管理”破产危机的行动，提出辩护。

格林斯潘一方面说明此一行动虽属罕见，然而却“非常必要”，因为这家公司若是倒闭，势必会对全球金融市场与经济造成极大伤害，导致市场资金流动陷入混乱。面对当前波动已十分剧烈的全球市场，必须迅速化解“长期资本管理”所带来的威胁。他强调，拯救“长期资本管理”，是为避免全球市场混乱与经济受挫。

格林斯潘同时也针对说他出尔反尔的抨击进行辩解说：联储会出面，“并不代表政府出资来”拯救“长期资本管理”，因为事实上联储会“没有使用公共资金”来援助，也没有提出要挹注政府资金的建议。

麦克当诺夫也帮腔说，若是任由“长期资本管理”倒闭，将会引发金融市场出现剧烈的价格变化，而对美国经济造成后果不堪设想的威胁，联储会实在是“该出手时就出手”。

美国：最后一张多米诺骨牌？

“长期资本管理”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例证，鲜明地展现了金融危机可能对全球经济，包括美国经济带来何种灾难。格林斯潘对这家公司几位掌舵人相当了解，知道他们既非平庸之才，又非招摇之辈，他们栽如此之大的跟斗，固然缘于他们大意失荆州的失误，但也得说局势险恶使他们难以回天。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也可能发生在别人身上，联储银行救得了一家，救得了第二家第三家吗？

与联储会关系密切的人士曾列举了这次金融危机多米诺骨牌效应的链条，具体地说来：

骨牌一：1997年7月，泰国货币贬值。对这一张骨牌倒下，没有几个美国人投以注意：毕竟，美—泰贸易在美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中，小得几乎不值一提。

骨牌二：1997年秋天，亚洲许多国家：马来西亚、印尼，等等。这些国家货币大幅贬值，投资者开始从这个动荡地区撤回资本。

骨牌三：1997年底，韩国。由于东南亚许多国家陷入困境，拖累世界第九大经济体的韩国亮起红灯，这下一直袖手旁观的美国才认真着急了，会同国际货币基金等机构，对韩国给予紧急援助。

骨牌四：日本。西方七国集团这个惟一的亚洲伙伴渐渐陷入衰退，日元一路走低，激起环球连连惊呼，怨声载道，美国本来说“不管”，但当日元跌到146日元对一美元的水平时，中国放话暗示“如果再不采取紧急措施，人民币也有可能守不住”，美国不得不与日本政府联手干预，挽救危亡。

骨牌五：美国。随着世界市场的萎缩，纽约的道·琼斯工业指数从9000点的高水平滑到了7500点到8000点之间徘徊。

骨牌六：俄国。经济险象环生，惨不忍睹，克林顿硬着头皮按预订计划去访问，好好拥抱叶利钦表示对他的支持，却难以挽回危局。

骨牌七：美国对冲基金。俄国危机导致美国对冲基金巨头濒临破产，不

得不有劳纽约联储地区银行牵头出手抢救，万幸避免了一次迫在眉睫的全球金融崩溃。然而，“救急而不救穷”，可一而不可再。

骨牌八：美国经济……

美国经济最后会发生什么事，你去想吧！

中国的希望与中国的隐忧

1998年夏季，亚洲各国金融危机方兴未艾，日本更是泡沫经济相继破灭，不可收拾。更为严峻的是，金融危机已经波及俄罗斯和南美。金融风暴在格林斯潘的各种演说中，不可避免地占了越来越多的分量，成了挥之不去的话题。

在亚洲满目疮痍之际，中国的经济卓然挺立，仍能在周边国家经济增长率纷纷下挫之际，保持接近8%的增长幅度，其经验和做法，使格林斯潘深感兴趣。他曾说过，有关亚洲危机的概念，使人想起占世界产值33%的整个地区处于严重危险之中。但是我们从摩根—斯坦利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最近访问北京同中国的高级官员进行了几小时讨论后，却得到非常不同的印象：中国的情况同这个地区的危机形成了鲜明对照，中国同其他国家的重要区别，可能成为解决亚洲危机过后问题的钥匙。

格林斯潘没有访问过中国，但他见过中国经济的最高决策人朱镕基。据毛为《格林斯潘》一书披露，美国《财经杂志》1997年评出了世界财经界“十大风云人物”，格林斯潘名列榜首，当时的副总理朱镕基排名第二。

尽管他自己身为自由经济最积极的鼓手，格林斯潘对中国给以相当肯定的评价。除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一篇关于中国经济趋势的文章之外，格林斯潘直接谈及中国经济的论述不是很多，然而从对亚洲金融风暴的许多评述中，在接受媒体采访的谈论中，看来他将中国大陆的经济数据也列入搜集的范围，他对中国发生的变化并不陌生，对于中国的处境和进展颇为关注。

格林斯潘在《美国财经》杂志上发表题为《亚洲危机将可能使世界出现通货紧缩的局面》的文章中，分析过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其中说，中国货币如果贬值将会引起亚洲新一轮的货币贬值浪潮，使这个地区陷入深深的经济萧条之中。但中国知道现在这个时候货币贬值，不仅会使这个地区，也会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

格林斯潘对中国经济的前景较有信心。他认为，由于中国的经济在1996年成功软着陆，通货膨胀率从1993年到1995年的两位数减到1996年的6%，而增长率保持在10%，并且，中国吸收的资金，都是长期的外国直接投资，为打开国内市场在那里设厂的外国投资者，不大可能突然撤资。这些都使中国的人民币保持坚挺，实际上它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还稍微增值。中国也并未显示出要保持与周边国家汇率同步下调的迹象，而是一再强调通过提高质量与管理水平来增加出口竞争力。最近关税下调及企业增加持有外汇对人民币的汇率有一定影响，但肯定是相当轻微的。也就是说，中国用不着采取使人民币贬值的方法来增加出口。

格林斯潘认为，中国控制通货膨胀取得成效。许多事实表明，中国经济正处在上升势头，由于中国货币既不能兑换成外币，又并非定值过高，并拥有让所有发展中国家眼红的大量外汇存底，因此，有理由认为，中国的经济比邻国风险更小。

他谈到中国外贸改革中的主要问题——对人民币币值的估价时说，外汇汇率的确定应该更多地着眼于控制国内物价上涨，而不应仅仅是简单地为了刺激出口。目前，中国的汇率基本上是适中的，即它有效地控制了国内物价水平，使中国经济走出通货膨胀的阴影，同时它又使中国的出口不断扩大，1997年保持了20%的年增长率。这是中国能够躲过金融危机的因素。

格林斯潘也对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境作过分析，提出过建议。他认为中国存在宏观经济的基本困境是：中国的竞争能力和失业之间的关系紧张。鉴于中国似乎坚决致力于经济改革，即改革庞大的国有企业系统，并使其金融制度现代化，失业是必然的事。但是，亚洲其他国家货币贬值带来的竞争能力的丧失，意味着出口增长可能时断时续，使新兴的私人产业部门更难吸收数百万失去生活来源的劳动力。

格林斯潘说，事实上减轻这种紧张关系的渠道可能有三条：货币、改革速度和增长率。货币渠道在可以遇见的将来已经堵死——尽管西方怀疑派可以认为“贬值只是时间问题”，但是中国的领导人已经做出了支持货币的政治承诺。然后就剩下了增长率。华尔街的估计是，中国经济可能有受到亚洲其他国家经济衰退影响的危险。外贸部门已出现了重要的增长减慢。

格林斯潘对中国与日本做出对比，指出双方表现出的态度，会影响到今后双方在亚洲的地位变化。他说，对中国的改革是感到吃惊，而对日本则是感到失望。中国与日本的这种区别，表明亚洲在危机过去以后将出现新的主导。日本现在处于抛弃一种经济制度的最后挣扎阶段，但是没有人能说出日本还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最后冲破这种模式，并过渡到新体制。相比之下，中国已决心走上新路。亚洲在危机过后很可能受中国地位上升和日本地位下降的支配。

格林斯潘身为美国央行总裁，从金融业的角度告诫中国同行，政府不能滥用银行系统。他提出了韩国的教训：危机的根源在于其陷入困境的银行系统。在指导银行贷款给与政界有关系的企业方面，政府扮演了重要角色。绝大多数国内信贷都流入了受到特殊眷顾的财团之手。信贷的容易获得，使大公司的融资比率达到很高程度，大多数大公司的债务与股本比率都超过了临界线。由于近年来贷方不顾一切地扩张而加重的风险非常集中，反过来威胁韩国银行的健康。对失败的八个财团发放的贷款几乎达到韩国商业银行资本总额的一半，韩国各大都市银行呆账与资产的比率为13%，对韩国商业银行来说，这种比率可能更高。

要想把银行部门的问题至于控制之下，中国首先应该停止政府指导下的对国有企业放贷。必须在银行和借贷公司之间建立一种有距离的关系，以使所有放贷决策都以商业准则为依据。中国必须迅速行动，清除现存呆账，采取有效措施修复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为避免未来的呆账，必须加强监督。银行自己也必须改进内部风险管理，在银行业务中采取健全的做法。银行不要只为大型国有企业这个传统客户服务，而要促使信贷流向非国有部门中的小企业家之手。

形势强迫观念更新

格林斯潘1998年7月21日在国会做半年一度的作证时还说，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大陆厉行的经济改革“处于危险之中”，由于中国对亚洲国家的

出口减缓，国营企业已产生了严重内部财务问题。

他不无忧虑地说，今年中国的经济成长率已在下降，官方订的目标是8%，但第二季实际数字换算成全年成长率，仅为6.8%。中国大陆对台湾、南韩、新加坡及香港的出口都大幅下降，对日本的出口也是同样情况，这已经使中国国营企业的盈余与现金周转处于严重压力之中。

但格林斯潘很清楚，中国在这次多米诺骨牌式的金融危机中能够依然保持着增长势头，极为难能可贵。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改革的设计和 implementation 都是渐进式的，而非激进的“休克疗法”。这与俄罗斯的经济改革相比，无疑是稳健多了。中国改革虽然受阻，只要人民币能够守住不贬值，对美国影响还不算大——而对中国将会守住人民币这一点，格林斯潘也比较有信心；但1998年8月，俄罗斯爆发经济和金融危机，就直接猛烈冲击纽约股市，使道·琼斯指数在8月31日又一次狂跌，一天内跌了512点——接近11年前那个“黑色星期一”。不过，由于道·琼斯指数已经升到了8000多点，基数比一年前更大了，所以这一次论下降的幅度，只有7%。但7%，也足以引起又一次天下震动了。

这种连锁关系，美国《新闻周刊》认为，是一种迄今为止绝大部分经济学家从未预测到的衰退模式，一步步大军压境，逼向了美国。

《时代周刊》1998年9月14日这一期的封面故事，是题为“今夏的熊市”的特别报道。这一封面专题特别报道的通版题图，十分耐人寻味：左页上是一个沉甸甸的铅制地球，拉出一条沉重的脚镣，锁在右页上一条穿着星条旗裤子的腿上。

不必借助文字，就令人一目了然：从东南亚到东亚，到俄国，到南美……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势必危及美国经济。

1998年起，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相同，紧缩螺旋压力日益增大。中国与日本的贸易比重极大，而日元贬值始终蠢蠢欲动，尤其是日本的经济恶化已渐渐形同自由落体，估计1998年将为负成长1.5%到2%。而非正式统计，日本失业率目前已达10%，日元贬值已似乎日益难以阻挡。

而真正关键的，则是亚洲危机的扩散已影响到全球，而全球的衰退又再返回亚洲，这种负面的反馈使得衰退成为一种螺旋形状。1998年除了中国大陆和台湾之外，整个亚洲都将全面负成长，南韩将为负5%左右，泰国可能负20%，与印尼相当，新加坡也将在负1%到2%之间。其中受创最重者除印尼外，当属南韩，到今年年底，南韩将有9%的人口没有收入，上市公司有10%已告破产。

而演变至今，全球的经济恶化，最突出者已非俄罗斯莫属。俄罗斯长期举债度日，而私有化的政策只不过是统治者借以将国有财产转手予特权阶级的口实而已。就在卢布贬值前，国际货币基金才提供俄罗斯226亿美元的融资。有一种说法称，所有的西方融资、纾困贷款，绝大多数都在转了一下手之后，即被特权阶级送入他们在西方的账户中，总额可能高达1500亿美元左右。俄罗斯积欠全球庞大的债务，已使欧洲金融体系的坏账比例大增。其情势与印尼酷似，印尼经济的瓦解，增大了日本银行的坏账压力，而其自身则陷入社会骚乱的困境中；而俄罗斯的经济瓦解，则使得它的最大债权国德国陷入坏账危机中，而俄罗斯本身的社会动乱可能性也告大增。许多分析家在预测1999年欧洲增长的幅度时都调低，例如德国银行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测，从先前的3.1%调低至2.6%。

如果说俄罗斯的动乱阴影，可能使欧洲蒙受极大的损失；而拉丁美洲及加拿大的衰退，则将影响美国。以加拿大为例，它占经济比重 10%的木材及矿业已因原料降价而受创，而香港资金的减少，则使其原本鼎盛的房地产一蹶不振，过去一年它的股价已跌了 17%，加币则相对美元贬值了 8.5%。而拉丁美洲的产油国家如墨西哥、委内瑞拉等，则因石油降价而受创。估计油价到 1999 年还会降到每桶 9 美元的超低历史纪录。油价无限下跌将使所有依赖石油的国家全部进入大危机之中——这种危机已几乎无法逆转。到 1998 年秋，人们已不再强调全球经济情况的恶化程度，而日益担忧经济大萧条之后的全球动乱。在即将进入 2000 年之际，这个世界充满了解不开的阴霾。

世界金融形势的愁云惨雾，终于迫使格林斯潘要再次换换脑筋，改变观念。

他终于坦承现今的最大威胁，已是从东南亚逐渐向全球扩散的经济衰退，而美国也已不可能置身世界金融危机之外了。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中，哪怕美国这样的全球超强，也无法独善其身——最终不可能幸免于这个世界其他地区所发生的经济灾难。

第十二章 龙头

【他夜以继日地在数据、资讯的乱麻中苦苦寻觅头绪——调降利率，也得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但当他确信到了“该出手”之际，他就连续出手】

美国不可能成为绿洲

1998年9月4日，格林斯潘飞到了美国西海岸。此行一方面是与美国财政部长鲁宾今天曾与日本大藏大臣宫泽喜一会谈，要求日本采取行动振兴经济——但日本回应说，他们已采取适当的行动；另一行程，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柏克莱分校发表讲话，题为《存在一个新经济吗？——人类心理学对市场的效应》。

格林斯潘这篇讲演颇带哲学色彩，他从心理基础，谈到亚洲金融危机和亚洲国家政策的利弊。格林斯潘对亚洲经济“恶性循环”的分析中，虽未直接点名马来西亚管制外汇交易，但他指出，恶性循环的特征就是“丧失信任”；信任消失及每个合约都宣告无效，大家过去视为理所当然的劳力分工的制度也就解体。

格林斯潘呼吁亚洲国家要尊重市场机能，他指出，从亚洲恶性循环中，我们得到的经验是要强调市场经济中的人性特质所扮演的关键性角色：对市场制度功能的信心与信任。

格林斯潘在这次演说中含蓄地说，“许多分析师认为，在未来三到五年，每年收入仍有13%的成长率，这个预测可能无法达到。”这就比较委婉地重申，他还是认为美国股市可能升得过高。

格林斯潘看起来还是那样带点儿羞怯和拘谨，不紧不慢。但是他这次尽量不动声色、一点不带戏剧性般强调口气说的话，却使听众一震：怎么？联储会主席一改几个月来口风，向听众警告说，全球的金融动荡，会拖慢美经济增长。他说，“当全球（经济）正承受很大压力之际，美国不可能成为不受影响的‘繁盛的绿洲’”。他还承认，大家并未预测到亚洲崩溃的发生，就如同水不断冲击水坝，一切如常，直到一道裂缝导致洪水。

格林斯潘在这次会上透露，在前一个月联储会讨论利率的会议上，曾评估了美国经济形势，认为美国经济现在是受“两面夹击”：既有因经济过热而出现通货膨胀的威胁，同时也有因世界金融动荡而造成经济放缓的威胁，两者不相上下。他表示，联邦开放市场委员会在下次讨论利率的会议上，“将要小心地评估自8月份会议以来连串事件的影响”。

这种态度和两个月之前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

人们记忆犹新：前一段时间联储会里多数委员认为，美国经济已有“过热势头”，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应该提高利率，再把水龙头紧一紧了。在联储会中，只有格林斯潘坚持认为不必因担心通货膨胀而反应过度，他反倒成了少数。众人不过基于对格林斯潘分析的信任，才同意暂时不提高利率，再观望一阵。但是，即使是格林斯潘本人，对经济形势分析的着眼点，也是放在美国国内的。当时他明确说过“通货膨胀的威胁超过经济衰退的威胁”；但是这一次，他却说的是“两者不相上下”。

联储会改弦更辙？

股市上无风还有三尺浪，何况格林斯潘开了口？

格林斯潘讲这番话，看来既是有意放风，又力图减少冲击：他没有在国会作证时讲，也没有在纽约这个金融中心讲，而是在数千里外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讲坛上讲。但是只要是他发表看法，人们怎么会不注意？

他这一番话，马上被市场分析人士警觉，认为格林斯潘放出一个试探气球，在为联储会即将降低利率铺路。分析人士说，连月以来，格林斯潘一再公开表示，担忧美国经济有过热的迹象。联储会在过去几个月来，虽然没有增加利率，但一直保持倾向于收紧银根的政策。这次讲话，却是一个重大转折，等于是向全球发出预告：联邦储备委员会将会向下调整利率，不是拧紧水龙头，而是要拧松水龙头了。有人预言，即使联储会不降低利率，也会改为采取偏向宽松的银根政策。

媒体立即活跃起来。他们评估认为：事实上，1998年秋，由于亚洲金融风暴的紧缩漩涡日益扩大，俄罗斯卢布业已全面弃守、大幅贬值，而墨西哥、加拿大、委内瑞拉等也都同时跟上。全球性的大萧条在望，欧美已不再像一年前那么袖手旁观，要求重建经济与金融秩序的呼声已日升高。格林斯潘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这次演说，实际上含蓄地承认了亚洲、俄罗斯、拉丁美洲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危机，对美国经济增长构成的威胁，比以往美国所承认的要大；今后联储会在决策中，对全球性经济问题的考虑，将会占据更重要的比重——也就是说，今后格林斯潘在制定和调整货币政策的时候，将会把国际性因素对美国的影响一并考虑进去。

正在华盛顿出席拉丁美洲财政部长会议的巴西财政部长华兰，顺势公开要求美国联储会降低利率，以“协助饱受经济衰退困扰的地区复苏”——最近巴西爆发的金融风暴已经将这个南美大国的经济打得溃不成军。华兰还说，拉美其他国家财长，也有类似的要求。

然而，联储会是美国的联储会，最关注的是美国国内经济，即便考虑全球问题，着眼点和立足点仍然是美国的利益，格林斯潘可并不想让联储会充当“全球的中央银行”，也不会去听拉美财长们的指挥。联储会里一位官员说，“我们当然关心国际的发展，但是美国对国际安定能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创造并且支持稳定的美元汇率。”

而人们希望的却是降低利率，听了这种话，当然是不会觉得解渴的。

只听楼板响不见人下来

9月14日，独立检察官斯塔尔的总统与莱温斯基性绯闻长篇调查报告公诸天下之后的第三天，被报告引起的弹劾危机弄得焦头烂额的克林顿，打起精神来到纽约，参加外交关系协会的研讨会。在会上，他发表了演说——这是美国政府几个月来首次针对蔓延开来的亚洲金融风暴公开发表自己的立场，其口径被人们广泛解读为回应格林斯潘十天之前的演说，与格林斯潘彼此呼应，等于为美国调低利率打开了大门。

克林顿在报告中宣称，目前的全球经济危机是“半个世纪以来全世界面临的最严重的金融挑战”。他说，过去30年来，美国和其他工业国家的主要威胁是通货膨胀，如今最大的威胁，却是逐渐扩散的经济衰退。七大工业国

的当务之急，是刺激经济成长。克林顿还提出了一项联合对付日益扩散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六点计划，呼吁七大工业国以及 15 个新兴市场国家的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近期内在美国首都开会，以制定解决金融危机的全球长期规划。

克林顿措辞相当谨慎，但与格林斯潘的口径基本一致。同时，总统明确表示：不会要求联储会降低利率，而是“尊重联储会独立判断而做出的决定”。

总统和联储会主席，少见地密切合拍。从格林斯潘到克林顿异口同声地公开表示，要与各国一道合力解决全球性金融危机。华尔街闻言士气大振，道·琼斯、奈斯代克、斯坦普三大指数应声走扬。

危机越逼越近，人人都相信格林斯潘会降低利率，人人也期待他降低利率，就像他在 1987 年美国股市大崩盘之后所做的；这段时间他露面讲话的机会特别频繁，格林斯潘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大家都要从他的话里话外，来分析有没有弦外之音。

然而，格林斯潘迟迟没有行动。他不断地打雷，却迟迟不下雨。

投资界、政界、媒体……都向格林斯潘反复游说，软磨硬压，力促格林斯潘调低利率。但是格林斯潘一贯不向压力低头，只管按照他对他那些复杂数据研究的结果我行我素，采取他自认为最佳的政策。你再急如星火，再翘首以盼，还是摸不清格林斯潘的葫芦里，究竟会不会卖降低利率的药。

格林斯潘金口难开

9 月 16 日，是格林斯潘预定出席众议院听证会的日子。

由于人们猜测他会降低利率，此前三天股市的开市日，道·琼斯工业指数都一路扬升，总共上升达 400 多点。但这一天，纽约股市午市之前窄幅下落，市场观望气氛浓厚。

当日下午一时，格林斯潘和美国财政部长鲁宾共同出席众议院银行委员会听证会。投资者盯紧格林斯潘，希望他这次能够明明白白地宣布调低利率。

人们失望了。在这天的发言中，格林斯潘仍然没有许诺联储会将采取降低利率的行动，令热烈期盼的股市挨了一瓢冷水。媒体立刻报道：格老讲话之后，全球股市都出现明显跌势——先是日本的日经指数跌穿 14000 点关口；接着是香港恒生指数跌了 300 点，又回到 7500 点的水平；然后欧洲股市也在开市初段普遍大跌。

格林斯潘不仅开口说了什么，会引起股市波动；他就是闭口不说什么，也会引起股市波动！

格林斯潘在这次听证会上表示，主要工业国现在还没有一致降低利率的计划，七大工业国尚不具备采取联合降低利率的措施。其实，听德国中央银行总裁头一天晚上的口风，不少市场人士早有预感：德国佬只会自己顾自己，不会参与什么联合行动。于是众人对全球携手降低利率一事，并不报太大希望。格林斯潘这一开口，不过是让市场彻底死心罢了。

格林斯潘说，美国的经济发展仍然强健，但由于全球通货紧缩力量，使得原料价格下跌，这股力量也逐渐侵蚀到美国经济。这番话，调低利率的意思已经呼之欲出了。但在会后的问答中，记者再三追问格林斯潘，他仍然不松口，只是明确表示：目前并没有所谓“联合调降利率”的行动。

不过，格林斯潘和鲁宾再度向人心惶惶的世界提出保证，他们说，在日

渐扩大的全球金融危机中，美国及其主要盟国正积极努力，谋求解决办法。格林斯潘认为，目前全球面临的重大危机是通货紧缩，而主要工业国家有必要通过健全的国际金融体系，将资金移转给受到金融风暴打击的各个国家，对饱受金融风暴之苦的新兴市场国家进行援助。同时，这种援助行动必须在严格的条件之下进行，并且对国际资金的借贷进行严密的监控。鲁宾则同时表示，他认为全球的金融危机正逐渐威胁到美国经济，他要求国会对一直把得死死的援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开禁松绑。

国会差点下令催促降低利率

9月23日上午，有些心急难熬的参议员提出动议，要参议院通过提案，“要求联储会尽快降低利率”。经过一番讨论，最后参议院付诸表决，这项“催促提案”以71票比27票被否决了。但是一些参议员仍然不死心，参议员维登十分不满地说，他希望在“被金融风暴淋得全身湿透之前，赶快调降利率”。

这天格林斯潘又应约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发表讲话，感受到参议院的气氛，他的口气又有了进一步松动，他的讲话立即被分析家们解读为联储会要降低利率的进一步明确的信号。

格林斯潘在这次讲话中，还是先塞给参议员们一个定心丸。他对他们分析形势说，目前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强的经济体，而且在未来6个月也将如此”。他认为，虽然获利有点缩水，但失业率仍低，需求与成长也相当稳健。

格林斯潘告诉参院预算委员会说，亚洲金融风暴的“乌云”逐步逼近美国，雨点随时都会打下来。他表示，全球的决策者也必须对全球经济不安加深的警讯采取行动。他向国会议员保证，联储会一直对问题的严重性保持密切关注，并未如同某些人所指责的那样掉以轻心地低估。

格林斯潘这次以明确不过的措辞指出，国外经济情势的恶化以及其内需市场的萎缩，可能使得美国经济成长减缓。路透社记者恩格勒立即报道说，格林斯潘“就未来货币政策的坦率言辞，因可能发生整体性的危机而显得更为严厉，因为这种整体性的危机造成美国控制范围以外的影响”。

或许，从这次对格林斯潘讲话的连篇累牍的反应与分析，能够最清楚不过地让我们看到格林斯潘的一言九鼎。

华尔街等全球股市均闻声上扬，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扬了200多点。饱受金融危机熬煎的巴西总统，立即对格林斯潘认识到了“全球经济的危急程度”表示欢迎，认为美国降低利率将有助稳定全球市场。

华尔街证券商预言家们各显神通，纷纷铁口直断，有的说，美国利率已经超过两年半都维持在5.5%的水准，很多人预料这次可能会降到4.5%左右——即一下狠降一个百分点。美林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斯坦伯格却预期，联储会可能会将联邦基金利率向下调降到5.25%的水准。而索罗门·史密斯·巴尼公司的另一名经济学家则认为，格林斯潘暗示经济增长减缓的忧虑已经大于通货膨胀，说不定要拿些更有魄力的大手笔出来。持不同观点的人也有，摩根—史坦利的首席分析师就表示，格林斯潘只是“开了一个门”，利率不见得在下个星期就马上调降，市场目前不宜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上面。

市场人士及经济学家早就认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已经对美国的经济造成伤害：出口减缓、企业获利下滑、股市频频下挫、人民财富缩水；他们还

担心民众关于购买房屋、汽车与其他零售商品的意愿，也都将大受影响。在格林斯潘的讲话之后，他们大受鼓舞，从更广泛的层面，津津乐道降低利率带来的好处，认为短期利率如果调降，美国的经济将可望受惠，受到国外经济情势动荡的冲击可望减低，消费者获得资金以及企业从事扩张、投资新设备的成本都可以降低。降低利率的效应，也可以增加对东亚国家进口的需求，加速亚洲各国的经济复苏。较低的利率还可以使美元兑日元的汇率不再那么强势，增加美国商品出口的竞争力。

北方证券公司的主管卡瑟罗表示，“降低利率不但可以拯救美国，也可以救全世界！”

其他各国的分析家也严密注意格林斯潘的讲话。欧洲的专家指出，美国联储会主席的讲话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强调金融业存在极大隐患的威胁，格林斯潘强调了一个美国金融稳定与安全、防止金融事故的问题。

千呼万唤始出来

格林斯潘一直不肯明明白白地吐口说出“降低利率”这四个字。

说话尖刻的媒体埋怨，格林斯潘简直好像一个“并不高明的推理小说家”，着意制造悬念，要卖关子吊足读者的胃口；然而由于剧情拖沓，铺垫过久，迟迟不肯揭开谜底，弄得大家都快倒了胃口。

格林斯潘听到这种话，只会一笑置之。他并不是有意要唱反调，跟大家的期盼过不去；他也并非抓着拟好了的脚本，胸有成竹慢悠悠地与大家逗着玩。他一向非常慎重，这个时候更是权衡了又权衡，斟酌了又斟酌，他夜以继日地在数据、资讯的乱麻中苦苦寻觅头绪——调降利率，也得做到“有理，有利，有节”。

在舆论人心已经有点冷场之际，9月29日，大家终于盼来了渴望已久的消息：

经过包括各联储地区银行行长一起磋商之后，联储会做出决定，将利率微降四分之一百分点，也就是从5.5%，降到5.25%，“以缓解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审慎的格林斯潘，只是稍稍拧松了一点货币的水龙头，或者说，他以前在经济发展的快车上一直左顾右盼、脚一直放在刹车上，这次终于确信车速有可能会过慢，便下决心，改为轻轻地踩了一下经济发展的油门。

这是自1996年1月以来，联储会第一次降低利率。

一次降低利率，幅度不大，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来说，起不了太有效的作用——当天股市有所上扬，但很快又呈现颓势，随后几天也一直欲振乏力。大家的期望值不止这么点。有人不满地说：“问题已经如此严重，格林斯潘只把手松这么一点点，简直是杯水车薪！”

但是，这台庞大的机器终于启动了。这次降低利率，与其说是实质性的，不如说是象征性的：可以把这次“千呼万唤始出来”减息的决心，看做是格林斯潘为解决经济衰退所付的“头款”。《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说，“这说明他（格林斯潘）注意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联储会将努力扮演它应扮演的角色，这就是：确保整个金融体系不致全部崩溃。”

人们据后来公布的备忘录得知，9月29日会议上，联邦开放市场委员会有投票权的成员，以11-0一致通过，将利率下调0.25%。这次会议联储会

还确定了“倾向降低利率”的未来工作方针。

以格林斯潘之学识精湛、经验丰富，遇到世纪之交前夕的这一系列新趋势新动向，也不能不感到前所未有，十分棘手。10月7日，他警告说，全球金融市场的信用紧缩，已经隐然成形，“势必影响美国经济前景”。他在这次谈话中再次暗示：联储会还可能继续调降利率。

一拳不够 再补一拳

果然，有一就有二。

第二次降低利率，不像第一次那样姗姗来迟，而是抢在大家预期之前，仅在半个月之后就接踵而至。格林斯潘一反只有在讨论利率的联储会例会才决定调整利率的惯例，在并非会议期间的10月15日，又一次宣布将联邦借贷利率（Federal Funds rate）和优惠利率（discount rate）都分别降低0.25%。

《华盛顿邮报》记者约翰·拜里（John Berry）是个细心人，以很体贴读者的口气对两种利率作了一番解释：联邦借贷利率，是各金融机构之间借贷时的“隔夜拆借利息”；优惠利率，是各金融机构直接从联储各地区银行借贷时的利息。

虽然不少专家早就猜到，联储会有可能连续降低利率，但是这次决策如此之快，还是让华尔街喜出望外。分析家们认为，联储会此举表明格林斯潘有了更大的决心，防美国经济沉沦衰退之患于未然。道·琼斯工业指数闻讯飙升，在10月15日这一天之内狂升了330点，为历史上一天之内上升幅度之第三。

据后来公布的备忘录所透露的信息说，在10月15日的电话会议上，联储会成员们检讨认为，两星期之前他们采取的降低利率行动的“力度不足”，因此都表示同意格林斯潘的建议，将利率再调低0.25%。

这份备忘录透露，当时联储会的一部分成员，“担心在9月底刚降低了一次利率之后，这么快又第二次降低利率，会起到误导作用，使人认为联储会对金融市场发展前景，以及经济发展前景都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担忧——而这并不是联储会的意图所在”。但是，经过电话上一番讨论，“各位成员最终都一致认为，这一逆市场反映的冒险值得一试，而且这项经过考虑的降低利率行动，很可能会帮助平息金融市场的动荡，并且在今后经济发展情况下出现金融条件紧缩时，也能够起到缓冲的作用”。

格林斯潘的特点，就是做出决策之前极为谨慎小心，而吸取各方面的意见和信息，形成了一套方案，确信到了“该出手”之际，他就连续出手，坚定而又果断。

美国《新闻周刊》10月12日这一期的特别报道说，“美国经济突然之间发现比任何人以为的都要弱。习惯势力仍在说，我们不会被全球经济危机拖垮。可别太相信这话。”

据这一期特别报道介绍，对股票市场的下滑——道·琼斯指数从7月份冲上的最高峰9000多点，已下滑17%——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是，投资人被一连串他们几乎不明白的事件吓慌了，这些事件，是指从俄国卢布8月中旬的崩溃，到9月底长期资本市场对冲基金的濒于破产等等；另一种解释是，市场正在发出信号，一个“真正的经济转折点”就要到来：美国，“在七年

多的健康发展之后，正在走向极大的放慢步伐，或者甚至是萧条时期”。

而这两种解释哪一种正确？文章作者口气沮丧：“对不起，看上去很像要萧条了。”

《新闻周刊》向格林斯潘提出了三个建议，以使美国避免步入衰退：一是联储会再调降短期利率；二是重新恢复投资人从事国际投资的信心，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必须稳定各国币值；三是设法使日本恢复经济成长以推动亚洲其他地区复苏——日本经济的规模，是南韩、香港、新加坡和泰国总和的一倍还多。日本一天不从亚洲国家进口，亚洲国家就得依赖美国进口，可美国市场能消化的总有一个限度。

这三点如果迟迟无法推动，则美国很可能就成为“全球金融风暴的最后一张多米诺骨牌”了。

一而再 再而三

1998年11月17日，联储会又一次做出了降低利率0.25%的决定。这一次又是同时降低联邦借贷利率和优惠利率。

在不到七个星期之中，格林斯潘三次降低利率！这一次联邦借贷利率降到了四年来的最低点。

华尔街和媒体好评如潮。消息一宣布，道·琼斯工业指数立即上升了160多点，不过很快又有回落，最后以8986.28点收盘。

联储会的行动，意味着各银行会按着同样点数降低他们的借贷利率。此举将使广大消费者和小型企业借贷的代价减小，比如，大多数房屋抵押贷款和信用卡的利息都是与银行借贷利率相联系的。

MSNBC电视新闻评论说：“经常被批评走在曲线后面的格林斯潘”，“现在走在曲线前面了”。第三次降低利率的行动表明，格林斯潘及其领导的联储会，“愿意在麻烦到来之前，就开始扣动扳机，而不是等到潜在难题出现以后”。

这家电视通过所采访的乔治亚经济预测中心主任唐纳德·拉塔查克（Donald Ratajczak）的话说，“很显然，联邦开放市场委员会认为他们10月15日所做的（降低利率）效果不错，所以他们想继续再向前走一点。”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对此说也表示同意，认为这是联储会开始恢复信用市场秩序的进一步努力，“联储会的目标是准确的。它愿意努力避免信用危机。”

评论家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一连三次降低利率，是一个极为不寻常之举。也有不少人追述说，10月15日第二次降低利率的宣布，是在两次讨论利率的例会之间，这与联储会一贯在讨论利率会议之后才宣布降息的做法完全不同，也打破了惯例。这是由于金融市场形势的严峻，也出于对美国经济明年可能会大幅减慢的担心，联储会才这么密集地连续三次降低利率。

到目前为止，美国经济的成长仍保持着非常稳固，而且通货膨胀率仍保持低水平。通货膨胀持续低水平，是联储会在经济如此强劲、失业率如此之低（4.6%）的情况下，仍能放心降低利率的原因之一。

不过，在宣布第三次降低利率的同时，联储会也表明，这是最后一次降低利率了。

联储会表示，金融市场的状况从10月中旬联储会第二次降低利率以来，已经大大地平稳下来，尽管“反常的倾向仍然存在”，但是，在利率从9月

份的 5.5%降低到 4.75%以后，“可以有理由地期待金融形势将向有助于经济持续增长的方向发展，同时能够抑制通货膨胀的压力”。

然而，还是有些金融业人士认为，尽管联储会说不会再进一步降低利率，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一旦市场形势不好、或如果出现美国经济在下一年会有大幅减慢的迹象，谁能打保票不再进一步降低利率？

推动了西方联手拯救世界

独木不成林。美国虽然实力最雄厚，经济形势又是最好，但是毕竟无力包打天下。克林顿和格林斯潘一直是寄希望于欧洲能够助一臂之力的。

1997年5月2日，欧盟会员国的领袖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高峰会议，在正式会议之前的午宴中，与会者进行了长达11小时的激烈辩论，一直到午夜才结束。这个足以列入金氏世界纪录的“午宴”，最大的成就是推举出前荷兰央行总裁杜森柏格为欧洲央行总裁。

杜森柏格在7月1日正式上任之后，掌管横跨11个国家的货币金融政策，成为全世界惟一可以与美国联储会主席格林斯潘抗衡的超级金融“霸主”。而随着欧洲新货币“欧罗”（Euro）在1999年元旦诞生，美元与欧罗的新世纪“大对决”，也将揭开序幕。

最近，欧洲各大银行的服务台上都挂上了倒数计时表，宣布距1999年1月1日还剩×日×时×分，届时，“货币强势如马克，流通便利如美金”的欧罗，将要正式成为流通欧洲11个国家的通行货币。

依布鲁塞尔欧盟委员会的三阶段发行计划，2002年欧洲共同货币完全在市场流通取代旧货币，也就是说，目前欧洲的强势货币马克、法郎、荷盾，弱势的意大利里拉、西班牙比索——它们其中大多数货币的历史都比美元老，也从17世纪以来曾随欧洲霸权主义的兴起而风行于全球一时，都将依照日程表在四年内告别他们的国民及全世界。

欧罗的上市，不只意味着欧洲流通货币的革命，同时诞生的，更是一个超强的贸易体。根据欧洲统计局的最新资料指出，加入欧元圈的11个成员国，人口、国内生产总值与美国相当，贸易总额占全球两成，比美国多四分之一，更是日本的两倍，称欧罗经济体为“全球最大贸易强权”，并不夸张。“统治”这个超强经济体的灵魂——欧洲央行，对于全世界经济将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欧洲各国政府仍然独立运作，但是影响国计民生、出口贸易、甚至长期投资机会的金融决策，现在全都掌握在欧洲央行手中。

但是，欧盟的催产婆们并没有料到，欧罗出世，会碰上一个金融风暴咄咄逼人、黑云压城的棘手局面。

美国一直在推动工业七国乃至西方世界联合采取刺激经济的行动。但是，各有各国的国情，各国也有各国的算盘，又正碰上本国货币要停止流通，转而使用欧洲统一货币，情况更为复杂，对美国的态度也就很难一致。像英国、加拿大，跟美国的步伐跟得较紧；德国、法国，一直别别扭扭，不肯松口——美国曾呼吁工业七国共同调低利率，德国和法国索性一口回绝；日本自己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方面确实自顾不暇，另一方面对应承担的国际义务也口惠而实不至。锣鼓不齐，弄得美国也相当气馁。

但是这一情境在美国联储会三次降低利率前后，有了重大变化。七大工业国之中的英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都先后降低利率，跟美国的步伐虽

然稍有参差，但大体一致；而即将使用欧洲统一货币欧罗区域的周边国家，也不断挥刀削减利率。

更使美国喜出望外的是，1998年12月3日，德国和法国中央银行行长感受到美国降低利率的压力，终于“回心转意”：相当突然地率先宣布降低利率，随后其他欧盟九国也宣布降低利率，除了意大利之外，都降到了3%——看来，欧盟的市场就将在这一利率水平上整合。随后，没有加入欧盟的丹麦，也宣布降低利率。

在距离欧罗出台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这一联手减息行动让美国大感欣慰。看来，欧洲已经痛切地感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终于改弦更辙了！

美国联储会本来宣布不会马上再调低利率了，但欧盟11国这一降低利率，却使联储会扩展了降低利率的空间，人们分析说，说不定联储会还会继续降低利率。

连续三次降低利率，不过是格林斯潘防止经济衰退全套方案中的几招。不管再降利率还是不再降利率，为了对抗阴影日益浓重的经济衰退，联储会还将出台新的措施。格林斯潘很清楚，自己所管的是美国货币的“水龙头”，而美国又是全球经济的“龙头”。

在经济动荡的起落中煎熬的华尔街和美国民众、全球民众，都对这个戴着黑框眼镜的瘦老头拭目以待。

结束语 走向第四次连任

幸运之神好像永远眷顾着格林斯潘，使他永远处于顺境之中。如果他成功地指挥美国经济继续上升，好运能持续到 2000 年他这一届期满，他就将在美国历史上创下经济发展最久的记录 Alan Greenspan: A Biography

97%的支持率

“最近的民意测验显示，克林顿总统在经历过性丑闻之后，支持率仍然奇迹般地高达 70%。可是这一百分比要和格林斯潘比，就算不上什么了——根据最近一次的路易斯·哈里斯 (Louis Harris) 统计，在全国 400 多资深高级主管中，对格林斯潘的支持率，是 97%。”这是美国《国家观察》杂志 (National Review) 1998 年 3 月号劳伦斯·库德洛文章里的一段话。

97%——这样的支持率，在联储会历届主席中是前所未有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莱德曼，在格林斯潘在斯坦福大学发表演讲的时候，称他的表现“超过以往任何一位联储会主席”。

另一位经济学家，里根总统的经济“建筑师”之一罗伯特·蒙代尔 (Robert Mundell)，更用毫不含糊的语言赞扬格林斯潘，“是我们所有的联储会主席里最伟大的一个”。

格林斯潘攀登上了事业与声望的巅峰。

人们回顾他在担任联储会主席 11 年内的里程：干脆利落地平息了“黑色星期一”；在 1989 年到 1992 年的信用危机中，格林斯潘紧缩信贷，提高“足够资本”的标准，但同时又向市场注入大量现金，以确保经济的复苏，而在金融体系内重振了信心；1990 年至 1991 年，波斯湾战争造成油价暂时性上涨，格林斯潘坚定地不肯放松银根，不顾得罪布什政府。

他 1994 年到 1995 年 7 次提高利率，以防止通货膨胀的压力；1995 年，经济放缓，但是并没有收缩。1994 年，格林斯潘支援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为挽救墨西哥货币而向墨西哥提供的大量财政援助；同时，他成功地保证了美国的价格稳定。

他身为共和党总统最初任命的联储会主席，却在与民主党政府保持了良好关系的同时，维护了中央银行体系的独立和信用。

对他主导下的联储会 1990 年未能及时降低利率、对他 1994 年连续提高利率，对错得失，当代和未来的经济史家将会争论下去；但是，在他当政的 11 年间，通货膨胀率下降几乎一半，低到了只有 2.2%，失业率只有不到 5%。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是格林斯潘正确的货币政策，“使得市场良性运作”。美国经济连续八年平稳发展，这是自 19 世纪 50 年代以来，第二长时间的发展期——这一势头还在持续——他的功劳是无可争辩的。

一生走运 心想事成

而纵观格林斯潘的 72 年生涯，他的经历给人的感觉，与很多美国名人、尤其是出身低层的名人们给人的感觉并不大一样。

尽管他年幼时家境并不算富裕，求学时也不得不中辍，但是你从他这里

似乎看不到什么逆境之中的苦苦挣扎、对抗命运的坚忍奋斗，更看不到接连遭受厄运打击的彷徨、沮丧；你倒是会对格林斯潘绝顶的聪明、过人的眼光，他无论在事业上做什么就能成什么，印象更为深刻。幸运之神好像永远与他相伴，永远眷顾着他，使他永远处于顺境之中：需要导师时，导师出现在他面前；需要合伙人时，合伙人出现在他身边；需要舞台时，舞台就出现在他脚下——虽然他的第一次婚姻很快失败，四十多年所期盼的命中注定的伴侣姗姗来迟，毕竟在他的晚年翩翩来临，把他重新带到青春岁月。

或许正因为如此，格林斯潘的心境一直比较平和、坚定、从容，不时冒出一幽默的火花——如果说，这种心理类型对于从事艺术并不适宜，那么对于从事金融和经济政策，倒最为合适。格林斯潘早早就放弃音乐而转向金融，实在是明智之举。

要全部印上格林斯潘的头衔，他必须用比常人大十倍的名片：他是美国国家预算局的顾问，《时代》杂志经济学家委员会主席，布鲁金斯经济活动小组的高级顾问；是全美铝公司的董事，通用食品公司董事，摩根公司董事，ABC 董事；是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成员，国际经济学协会会员，全美经济学俱乐部董事，纽约经济俱乐部副主席和董事会成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机构成员，监管人委员会成员，经济学家商业协商会成员——一度担任过其主席；是 1976 年美国公众服务协会授予的汤姆斯·杰弗逊奖得主；尽管他直到 51 岁才正式拿到博士学位，但他一生中获得的法学、人文科学、商业科学等各种科目的荣誉博士学位简直不计其数。

《国家观察》劳伦斯·库德洛文章归纳说：在美国这个有 1.25 亿以上的人投资股票市场的经济中，格林斯潘“才是真正的总统”。“他对平衡的预算，低失业率，几近乎零的通货膨胀率，坚挺的美元，和我们的财富，都立下了大功”。

凡此种种，华盛顿政府确信，如果格林斯潘成功地指挥美国经济继续上升，好运能持续到 2000 年他这一届期满，他就将在美国历史上创下经济发展最久的纪录，超过前联储会主席、传奇人物小威廉·马丁创下的纪录，那一次，经济是由 1961 年到 1969 年，年年走高。

格林斯潘现在身体状况很好，天暖时，每周在户外打三四次网球，冬天里在室内一周也要打个两三次。我们都在电视屏幕上见到他，在去众议院作证时，为躲避记者的追踪，他一路小跑地跃上国会山台阶的矫健身影。因此人们又预测说，如果经济景气能跨入 21 世纪，而他的健康又允许的话，届时 74 岁的格林斯潘，有极大可能是再被任命连任一届联储会主席的。

《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

1997 年底，最后一期《时代周刊》照例刊登出一年一度“风云人物”。这一年被《时代周刊》选中的人，是匈牙利籍移民、英特尔公司总裁安德鲁·格罗夫（Andrew Grove）。在同一期杂志上，《时代周刊》还推出了“在 1997 年创下历史”的四个人——据推测，他们可能是《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的落选了的候选人——格林斯潘高居榜首，他与那一年因车祸身亡、引起举世震惊和悲痛的英国黛安娜王妃，培育出克隆绵羊的伊恩·威尔马特博士（Dr. Ian Wilmut），以及过去十年来捐款达六亿美元的新泽西州富豪查尔斯·费尼（Charles Feeney），并列为四个“创造历史的人物”。

颇有意味的是，《时代周刊》给出的理由说，格林斯潘名列榜首，是因为“他最近在公众头脑中形象的转变”。1994年时，他一次接一次地提高利率，被人视为“简直疯狂”，“为了追求不现实的零通货膨胀，而不惜抑制经济增长”！而现在，他垂手而立，按兵不动，美国经济却一浪高一浪地发展，这种高增长率、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的罕见的大好形势，又使人们对格林斯潘佩服得五体投地，崇拜得无以复加。

笔者本书脱稿之时，正是1998年12月初。按说每年此时美国《时代周刊》确定年度风云人物的人选都大致有谱了，只等新旧年相交的一期，推出版面。但是最近，据消息灵通人士在互联网上透露，1998年《时代周刊》年度人物的人选，到目前为止尚未确定。《时代周刊》的最高层正在就这一“超级机密”，在两种选择之间左右为难。

一种意见是选克林顿和希拉里夫妇，理由是，克林顿在1998年的弹劾风暴中“大获全胜”。第一夫人希拉里在克林顿性绯闻过程中的表现，更是可圈可点，被民众推崇备至。很多媒体从六年前克林顿刚走进白宫时对她怀有敌意，转变为对她越来越有好感，甚至有提名她在2000年竞选总统的呼声。网上还有人发表见解说，她“一个人就够当年度人物”。

另外一种意见是选艾伦·格林斯潘。这一派的理由是，克林顿命运如何，还在未定之天——众议院虽然在1998年12月20日（北京时间）通过了弹劾克林顿总统四项动议中的两项（按美国法律已通过了弹劾总统动议案），但最终能否得到参议院三分之二议员的赞成赶克林顿下台，还为时过早；而格林斯潘在今年9月底到11月中，连续三次降低联邦利率，“挽救了美国的经济和股票市场”。

两派意见各执一词，尚无定论。据悉《时代周刊》杂志编辑们被告知准备克林顿和格林斯潘两套材料，最终决定将由执行总编辑沃尔特·伊萨克森在最后一刻拍板，定了谁，就把谁那套文章端出来。

有人看到这则消息，便给《时代周刊》编辑伊萨克森发去电子邮件公开信，说与克林顿夫妇相比，格林斯潘是“更好的选择”。克林顿总统“除了被谈论得很多以外，今年并没做什么值得褒奖的事”，况且他一向被人们谈得不少，并不仅仅今年如此。而格林斯潘自从1987年当上联储会主席以来，“从来没有当上过你们的年度人物”呢。言下之意，大有为格林斯潘打抱不平之意。

《时代周刊》每年推出一个（或一组）年度人物的惯例，始自1927年，到今年已经是第71年。对于最终定谁，《时代周刊》自有自己的考虑和决定权，更不会以什么人当过还是没当过他们的年度人物来决定。事实上，在以往70次评选中，两次或两次以上荣登封面宝座的大有人在，而且多是国家元首级人物：

多达三次的是前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1932年，1934年，1941年）。

两次获选的就更多了：

前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1939年，1942年）；

前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1940年，1949年——这一次是作为“半个世纪的伟人”）；

美国的马歇尔将军（1943年，1947年）；

美国著名统帅、前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1944年，1959年）；

美国前总统哈里·杜鲁门（1945年，1948年）；
美国前总统林登·约翰逊（1964年，1967年）；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1971年，1972年——这一次是与他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一道）；
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1978年，1985年）；
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1980年，1983年——这一次是与苏联前领导人安德罗波夫一道）；
苏联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1987年，1989年）。
克林顿曾是1992年的年度人物，而这显然不是今年再当一次的障碍。
以夫妻形象同上年度人物的也有先例：中国的蒋介石和宋美龄，1937年双双登榜。

格林斯潘是否有可能入选呢？——1998年，虽然美国的经济依然保持上升的活力，格林斯潘却能惊悚于扩散中的亚洲金融危机对美国、对西方世界日益增长的压力与潜在的威胁，在9月29日、10月15日、和11月17日前后不过七个星期的时间里，连续三次降低联邦利率。把格林斯潘评为1998年的风云人物，也的确理由十足。

不过，最终拍板的是伊萨克森。最后真出来的是匹黑马也说不定呢。附

录一 艾伦·格林斯潘年表

1926年 一岁
3月6日 出生于纽约市曼哈顿。
1930年 四岁
父母离异，跟着母亲罗斯和外祖父、外祖母在曼哈顿华盛顿高地生活。
1944年 十八岁
毕业于曼哈顿的乔治·华盛顿高中，进入茱丽亚音乐学院；并参加纽约的亨利·杰罗姆爵士乐队，吹奏单簧管和萨克斯管。
1945年 十九岁
离开茱丽亚音乐学院，改上纽约大学。
1948年 二十二岁
毕业于纽约大学，以“最优异成绩”获经济学学士。
1950年 二十四岁
获纽约大学经济学硕士。之后开始攻读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从师著名经济学家、后来成为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亚瑟·伯恩斯，并成为其亲密朋友。
1952年 二十六岁
与艺术家琼·米切尔结婚。
通过妻子结识了俄国出生的社会哲学家、畅销小说家爱恩·兰德，她的“客观主义”哲学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53年 二十七岁
中辍攻读博士学位，离开哥伦比亚大学。进国家工业联合会从事对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市场的预测分析。
结婚一年后就告离异。
兼任纽约大学经济学讲师，直到1955年。
1954年 二十八岁
在纽约与威廉·汤森共同创建汤森—格林斯潘经济咨询公司，任副总裁。

1958年 三十二岁

合伙人汤森去世后，继任公司总裁。

1967年 四十一岁

在爱恩·兰德的鼓动下首次介入政治：接受尼克松总统竞选办公室顾问一职，任国内政策研究小组主任。

1969年 四十三岁

谢绝了为尼克松内阁全职工作的机会，回到纽约自己的咨询公司。兼职为尼克松政府提供经济咨询。

1974年 四十八岁

出任福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一职（到1977年），开始对美国经济政策产生影响。后又担任直属白宫的新机构经济政策委员会的执行主任。

1977年 五十一岁

于福特总统卸任后回到纽约继续经营咨询公司，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1年 五十五岁

出任里根政府的国家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主席（到1983年）。

1982年 五十六岁

认识后来的妻子，NBC的记者安德丽·米切尔。

1984年 五十八岁

12月，正式与安德丽·米切尔约会。

与朋友合伙创办一家理财公司（1987年关闭）。

1987年 六十一岁

6月2日，被里根总统任命为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8月11日，宣誓就职。随后关闭自己的咨询公司。

9月4日，宣布提高优惠利率，显出他走出前任影响的个人本色，被称为“反通货膨胀的斗士”。

10月19日，著名的“黑色星期一”，纽约股市大跌508.23点，是格林斯潘上台后第一次危机。他以“向市场打开货币水龙头”为回应。

1988年 六十二岁

8月通货膨胀加剧和劳工市场紧缩，使联储会决定提高利率。

1989年 六十三岁处理美国“储蓄与贷款危机”。

1990年 六十四岁

8月伊拉克部队入侵科威特，妨碍了格林斯潘实施经济“软着陆”的计划。

1991年 六十五岁

7月10日，被布什总统提名，连任联储会主席。

12月19日，随着经济进入不景气，决定大幅度降低优惠利率，以期刺激经济的成长。

1992年 六十六岁

美国经济衰退，导致布什在总统大选中败给了克林顿。

1994年 六十八岁

2月在创下联邦利率保持了18个月不变的记录之后，为“先发制人”抵制通货膨胀，宣布提高利率。首开联储会公开宣布对利率进行调整的历史。

从此至1995年间，联储会先后七次提高利率。

1995年 六十九岁

1月，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1月31日，格林斯潘积极支持白宫，挽救墨西哥比索。

2月1日，联储会提高利率，向华尔街传递了决心反对通货膨胀的信号。

7月6日至12月，由于担心经济萧条的出现，联储会改为几度调低利率。

获圣母大学 (University of North Dame) 名誉法学博士。1996年 七十岁

2月22日，被克林顿总统提名，第三次连任联储会主席。

6月20日，第三度走马上任。支持格林斯潘提高利率、放慢过热经济的总统预算主任爱丽丝·瑞芙林出任联储会副主席。

1997年 七十一岁

1月，宣布与12年约会的NBC新闻主播安德丽·米切尔订婚。

3月25日，谨慎提高利率至5.5%，主张实行“保险”政策，以防通货膨胀不期而至。

4月6日，与米切尔在华盛顿举行婚礼。

5月20日至7月2日，联邦开放市场委员会经两次会议商议后，决定保持利率不动，尽管失业率已达25年来最低。

夏季，东南亚爆发金融风暴。7月2日，泰铢贬值。接着，南韩、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货币先后贬值。危机逐渐波及日本。美国联储会仍然视通货膨胀为美国主要大敌。

10月27日，纽约股市狂跌554点。

12月18日，“关键的晚餐”，投入拯救韩国。

1998年 七十二岁

年初，格林斯潘最担心的仍是经济过热、通货膨胀。

初夏，拉丁美洲金融危机。

7月，在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目前美国经济中，通货膨胀抬头的危险性，超过亚洲金融危机导致的威胁。

8月间，俄罗斯爆发经济和金融危机，直接影响美国股市。8月31日，纽约股市在一天内狂跌512点。

9月4日，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发表演讲，终于一反几个月来口风，提出美国经济出现通货膨胀的威胁和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的威胁不相伯仲，被市场视为将要调低利率的信号。

9月14日，总统克林顿在纽约发表演说，应和格林斯潘的口径。

9月16日，格林斯潘在众议院听证会上，并未提出降低利率，令热烈期盼的市场一时大失所望。

9月23日，格林斯潘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发表讲话，被经济学家视为联储会马上要降低利率的明确信号。在这次讲话中批评香港特区政府入市干预。

9月29日，联储会宣布，将利率从5.5%降到5.25%，这是自1996年元月以来，联储会第一次降低利率。

10月15日，联储会破例地在两次讨论利率的会议之间宣布，再降利率0.25%，从5.25%降到5%。

11月17日，联储会宣布第三次降低利率，从5%降到4.75%。

附录二 格林斯潘担任联储会主席期间
利率调整一览

表一：联邦借贷利率 (Federal Funds Rate)

调整年月	调整后利率 (%)	调整年月	调整后利率 (%)
1990.6	8	1991.8	5.5
1990.10	7.75	1991.10	5
1990.11	7.5	1991.11	4.75
1990.12	7.25	1991.12	4.5
1990.12	7	1991.12	4
1991.1	6.75	1992.4	3.75
1991.2	6.25	1992.7	3.25
1991.3	6	1992.9	3
1991.4	3	1994.2	3.25
调整年月	调整后利率 (%)	调整年月	调整后利率 (%)
1994.3	3.5	1995.12	5.5
1994.4	3.75	1996.1	5.25
1994.5	4.25	1997.3	5.5
1994.8	4.75	1998.9	5.25
1994.11	5.25	1998.10	5
1995.2	6	1998.11	4.75
1995.7	5.75		

优惠利率 (Discount Rate)

调整年月	调整后利率 (%)	调整年月	调整后利率 (%)
1987.9	6 (增加 0.5)	1992.7	3
1988.8	6.5	1994.5	3.5
1989.2	7	1994.8	4
1990.12	6.5	1994.11	4.75
1991.2	6	1995.2	5.25
1991.4	5.5	1996.1	5
1991.9	5	1998.10	4.75
1991.11	4.5	1998.11	4.5
1991.12	3.5		

附录三 格林斯潘重要证词和演讲节录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参院预算委员会听证会上的证词 1997年1月21日】

主席先生及各位委员：

今天我很高兴能到这里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将于数周之内，向国会提出每半年一次的货币政策报告。该报告及随后我的证词将涵盖我们对美国经济前景及货币政策挑战的详细评估。今天早晨，我要对当前的经济情况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

我认为美国经济的整体表现已经持续超越大多数预测者的预期是合理的说法。目前，周期性景气上扬正持续近6年，而经济已保持了相当的活力，曾扰乱过去增长的不平衡及通货膨胀等迹象已不多见。虽然第四季度的数据资料尚不完整，不过可以看得出来，国内实际生产毛额增加了大约3%。与战后早期数年所记录的成长比较起来，这一增加的额度似乎不高；然而，处在一个劳动人口扩张相对较慢，失业率已低的时期，此种经济成长的确是可喜的。这足以在去年创造出250万个以上的新工作，促使失业率下降至5.25%，这个数字大致符合80年代后期前一次周期性景气上扬的低点。不过与早期相对照，我们并未经历通货膨胀大幅增加；事实上就一些重要的物价趋势测量标准，通货膨胀在1996年实际上略为趋缓。

去年扩张的均势与牢固性，可以由成长的内涵看出来，特别是消费者的消费变得相当保守。在某些情形之下，他们可能是受制于过去数年所累积的债务负担；但是大体而言，当股票市场持续以惊人的速率攀升时，各个家庭的财产净值进一步大幅增值。从历史模式来看，此种财富的增加可能刺激各家庭把他们目前收入的较大比例用于花费；不过如果依照现有资料来看，各个家庭反而变成将收入的更大比例用于金融投资。或许美国人终于察觉到有必要累积额外的资产，以确保他们不仅能应付临时性的解雇，也能拥有足够的财力享受往后漫长的退休岁月。

不论如何，个人储蓄的增加流通，以及财政部减少对这些储蓄资金的需求，有助于去年对固定投资资金的大幅增加。造屋的活动颇为活络；特别是单身家庭住宅的需求再次增强，促使全国的住房自购率达到15年来最高点。此外，商业固定资产投资也大有进展。特别是公司行号取得大量的电脑及电信设备，试图提高工作效率及整体生产能力。在此同时他们更谨慎地控制累积的存货：1995年曾经上升的存货销货比，到1996年11月时在许多方面都接近历史最低点，这是目前所能取得的最近月份的统计资料。

日益成长的经济对许多州及地方的财政起了良好作用，使其能有更多的经费用在必须的基本设施及极重要的服务上，且在某些情况下可平衡税收。当然，整体的政府采购被减少联邦赤字的努力所压制，因此，去年的经济成长显然是民间的需求所促成。

更明确地说，1996年的特点是国内民间需求增加，因为我们的进出口状况呈现净出口下降：我们销到国外的货物及服务有一定程度的成长，纵使主要的贸易伙伴经济增长并不多，但我们的进口仍持续快速成长。事实上，进口为美国经济提供安全保障，并显示出对资源的高度利用。

我已经说过，我们的失业率降至最低点已有些时日。此外，我们还听说

国内各地一年到头都短缺合格的劳工。虽然每小时工资的增加仍相当和缓——这个重要的事实我过几分钟再来谈——不过仍相当可观，使单位成本增加，而雇主却无法相应地提高生产力。所幸过去数年来对设备做了实质上的增添，使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并未受到很大的压力。

当然，问题是我们今后何去何从？我们是否能够在避免过度通货膨胀之余，仍能继续在实际的行动里获得重大的成长？因为货币政策会有滞后效应，重要的并非目前的优势条件，而是可能在最近6个月至1年或更久时期内呈现优势的条件。因此虽然十分困难，我们仍必须对最可能的经济走向及分散其预期的风险做出某种判断。

幸运的是经济事件不完全是随意且不可预测的。它有一定的原则及一定的行为关系、经验法则，使我们可以有某种程度的信心去遵循。例如，资本投资是以可预测的方式回应经济成长率、预期获利率以及资金成本。同样的，购屋活动考虑某些条件后是会与房屋的抵押贷款利率成反比。而最终需求的最大要素即个人消费性支出，通常是继收入而来。这些关系有许多是深植于传统的商业循环周期观念之内，那是在75年前，由卫斯里·克莱·米切尔所揭示，并与我的一位前任亚瑟·伯恩斯，在《商业周期衡量》一书中有详尽阐述。他们的见解至今仍旧非常适切。

即使如此，每一个循环周期似乎都有其本身的规律性。例如，80年代末及90年代初的萧条期，经济受到商业不动产市值的急速下降所左右；因为这种不动产是借贷的主要担保物，其市值的下降对商业银行借贷的意愿及能力造成极深的限制作用。各位可能记得，我曾描述过当时的经济就如同要在每小时50英里的逆风中前进一般。严重的信用紧缩只是勉强地回应联邦储备理事会的尽力放宽货币情势的做法。

同样的，70年代通货膨胀以及对通货膨胀的预期戏剧性地攀升，是塑造那段时期循环模式的关键。当时的现象之一是，消费者受到刺激为对抗未来价格上升而购买房屋、汽车及其他不动产。对付这种通货膨胀必须抽紧银根，使得名目及实质利率均急剧上扬，而导致80年代初期营造业及其他对利率敏感行业的实质萎缩。

相反的，一如过去几年我曾多次对国会提及，或许目前经济扩张的主要特性是低通货膨胀及平静的膨胀预期，这有助于建立有利于强劲资本支出及普遍长期计划的金融环境。一年前，在汉弗莱——豪金斯证词中我即强调过这一点。此后，以采用成本指数衡量的每小时工资增加的幅度持续滑落，比假设薪酬上升与劳力市场紧缩间的历史关系维持不变的增加幅度要少很多。

研判这种远离过去模式的原因至关重要。依我所见，居高不下的工作作风，才是遏制工资及随之而来较和缓的价格膨胀的主因之一。

劳工调查结果凸显了此一非比寻常的状况。1991年经济萧条到达谷底时，一项对大企业劳工的调查显示，有25%的人害怕被解雇。1996年，尽管失业率非常低及劳力市场明显吃紧，同样的调查机构却发现45%的人担心失业。

在劳力市场供不应求的时刻，劳工却依然不愿意离开现职另谋他就的情况，进一步证明这种顾虑，工会合同期加长的走势亦是如此。数十年来，团体合同很少超过3年；现在5至6年的合同却相当常见，其中一般都强调工作保障及温和的加薪。最近几年罢工次数不多的情况，也证明对工作保障的顾虑。

因此，劳工宁愿小幅增薪而换取较大工作保障，在这特殊的商业循环扩张时期已有相当充分的证据。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为何这种不安全感依然存在，即使劳力市场以所有客观衡量标准来看都显得非常吃紧？有一种可能是：劳工对工作技能已过时，始终心怀忧虑。这种过时问题的确实性可由在职训练计划——尤其是在科技方面——在许多美国公司中兴盛流行，得到验证。再也没有人能靠一纸高中或大学的文凭取得终身的工作技艺。的确，为保住工作，持续不断的成人教育，已被认为越来越有必要。

当然，过去数年间工资成长和缓也可能有其他的解释。显然，医疗保健成本明显减少是最常被引用的。另一个可能是面临国际竞争的工业界，企业与劳工承受着更高的压力。国内的经济自由化对某些行业的竞争强度带来类似的效应。再者，民间劳工加入工会的比率持续降低，可能使工资更能反应市场力量——的确，如果反过来说，新的竞争现实，在许多情况下削弱了工会的力量也是实情。不论如何，虽然我不怀疑这些解释都有关系，但如果说有任何一项是起绝对决定作用的，我将为之吃惊。

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持续的低物价波动约束了工资的增加。历史清楚证明：物价波动是工资变化的因素之一。但是，起因如果主要是由订定价格的产品市场影响到订定工资的劳动力市场，那利润应该会受到一些挤压；显然目前的情况并非如此。反而部分由于薪资波动不大，利润及投资报酬率都上升至高水平。高投资报酬率似乎可引起竞争压力，限制企业在相对的成本结构之下提高价格的能力，以免竞争对手为急于掠取较大的市场而不跟进。所以证据似乎更符合工资节制可抑制物价上扬，而非相反的看法。

如果我刚才说的工作不安全感变数是关键所在，我们就必须承认，正如去年2月我在汉弗莱——豪金斯的证词中所说：“因工作不安全感而造成压制工资成本成长的程度只能到此为止。在将来某一时刻为工作保障而牺牲薪资成长的情形终将不再。”简言之，这意味着即使实质薪资因过去几年的经验而持续保持低水平，我们已经历的温和工资增幅，仍只是一种过渡而非永久现象。要过渡多久是个未知数。的确，最近有关工资的某些统计数字显示，过渡期已进行得差不多了。果真如此，从货币政策观点来看，最重要的问题是，未来劳力市场的状况是否能与维持满意的物价相配合。

在结束前，我想就一些测量与经济资料问题做简短的讨论，这对各位展开1998年预算的审议也许会有些帮助。有一个问题各位必须设法解决，那是一个逐渐成形的共识，即指消费者物价指数及端赖该指数资料来建构的其他广泛物价测量，大幅夸大了实际生活开销的变化。就各位的角度而言，消费者物价指数变动趋势的重要含义之一，就是它每年自动、也许并非有意、却实质增加了社会安全与其他依该指数调整的联邦福利，并且实质减少了以该指数为准的个人所得税。但较不为人所知的事实是，在一定的名目开销幅度内，消费者物价指数的误差偌大，许多时候会反映在实质开销的低估中；这使得对最近的经济发展与美国经济表现长期趋势的解释出现混乱。

若干研究人员曾尝试将消费者物价指数及其他广义物价测量的误差加以量化。有一套研究已针对物价测量的详细统计证据进行研究。博思金委员会大量引用这些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现今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对实际生活开销每年约夸大一个百分比。除了一些与其架构有关的技术性因素外，消费者物价指数之所以会夸大通货膨胀，是因为新产品引入的速度缓慢与品质改进的调整不够所致。

近来联邦储备理事会的研究人员已经从总体经济的观点来看测量问题。这项分析质疑政府公布的物价、产出与生产力统计所显现的模式是否有意义，同时也指出通货膨胀有被夸大之嫌。尤有甚者，这项研究发现，美国经济中服务业经测量所得的实质产出与生产力，意外地低落，即使我们国内生产毛额总和统计中所隐含的企业主投资报酬率显然维持得不错。已公布的资料显示，若干服务生产事业的每小时产出标准，二十多年来一直在降低，也就是说，这些产业所属的公司二十多年来效率越来越低。此一模式相当不可能。这种资料异常惟一最有可能的解释，似乎是物价错估，而其误差的程度也与微统计的结果一致。

通货膨胀较官方测量结果所显示的为缓，而实际成长较官方测量结果所显示的为快，我们欢迎这种证据，这部分是因为它表示一国现有的经济福祉水平比我们所想的来得高。不过我想要澄清的是，修正我们传统对实质成长的估计，加入更准确的物价资料，对于资源利用程度的测量并无实质作用，因为这样的修正代表潜在产值，以及真正产值更快速的成长，它并未改变资源利用与通货膨胀间的关系。除了对福利给付与所得税的指数化公式有所修正外，它也无法让联邦预算赤字的外观有所改变。

当然，最近几年企业大幅改组与科技的非凡进步，总生产力成长的速度比官方统计数字来得快的判断，看起来相当合理。但我并不是暗示我们应该假设信息科技所带来的生产力成长潜力已完全实现。毫无疑问地，各公司需要一些时间来应用生产技术，让主要的新科技得以转变为增加的产值。同样有趣的对比是，19世纪末时，电动马达也是广为人知的科技，但它最初被用在原为蒸气发电厂所设计的生产系统里。一直要到1920年前后，当原先的垂直式工厂逐渐转变为水平设施时，各公司才能完全利用电动动力所含有的综合效用，并因此使生产力激增。同样的，现代的生产系统并非全都能毫无困难地与新的信息通讯科技相结合。因此，完整利用即使是最新一代的信息通讯设备可能也要等到若干年后，且惟有等到实际资金陆续投入了之后。

这样的情形虽然有可能发生，我们却无法断言它何时或是否会发生。因此，我们必须随时注意，确实使我们的经济维持足够的弹性，以适于采取富于企业精神的行动。我们也必须继续努力进一步提升生产力，提高国民储蓄并且刺激资金募集能力——快速达到更高的国民储蓄率至为重要，尤其是有鉴于下一世纪前数十年内，美国人口预期会产生的转变，与因此对联邦退休与健保计划产生的压力。降低联邦预算赤字，并经过一段时日后，把整体预算转成盈余，将是朝这一方向努力的一大进展。

【2. 存在一个新经济吗？——人类心理学对于市场的效应格林 斯潘 1998年9月4日在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讲演（节录）】

今天的题目“存在一个新经济吗”，涉及比字面上更深层的意义：我们的经济每天都在变化着，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经济总是“新”的。更深的的问题是，在我们经济的运行里，是不是已经存在一种深远的、根本性的改变，使现在的经济运行与过去完全不同。

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因为美国经济在过去5年里的表现，在很大意义上是过去没有见过的。最不同寻常的就是，与传统的智慧和以之为基础的经济模式相反，通货膨胀在商业大发展之中却降得如此之低。

以往，在经济持续上升 7 年以上的时期内，都可以看到很多不平衡，而今天，这一类的不平衡大多都看不到了。劳工市场异乎寻常地紧张，按说我们会一直担心这一压力会影响到成本和价格，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影响。

还有，在一个经历着越来越增长的压力的世界里，美国竟能守在一块繁荣的绿洲上，这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1998 年春季和夏初，联邦开放市场委员会曾担心，通货膨胀的上升是经济持续发展的首要威胁。而到了 8 月讨论利率的例会的时候，这样的危险已不是威胁。从那次会后，委员会需要仔细考虑不断发展的事态潜在的结果。

一些倡导“新经济”的人，一般地将新技术归因于技术的发明和全球化的突破，这一切提高了生产能力，也提供了新的需求能力。这样说很显然有道理的。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看我们是不是我们处于新经济，一个甚为重要的因素，就是人类心理学（human psychology）的作用。

支配过我们先辈的狂热也好、恐惧也好，在参与今天的美国经济的几辈人中，照样随处可见。人类行为总是来源于对那些行为的后果的一种预测。当未来变得风云莫测的时候，人们就会避开那些行为，解除从前承诺的义务。人们对风险的承受力固然强弱不一，但是，只要把今天人们的市场行为与一个多世纪以前的比一比，你会很难发现有什么太大的不同。我们估价财产的方式，和这些价值的改变影响我们经济的方式，都没有显出与支配了我们上一辈人行为的一套法则有什么不同。

于是，对于“有没有一个新经济存在”的问题，在一个更为深刻的意义上，回答是“没有”。和过去一样，我们发展着的经济，主要的是被人类心理如何影响价值体系的因素所驱动的，而推动一个竞争的市场经济的是这个价值体系。这个过程与人类天性密不可分，而人类天性从本质上又是无法改变的，所以，也就把将来固定在过去了。

……

过去总是，并会延续到将来也会是的一个真理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成果，和财富创造的概念，将反映出人们的价值取向。的确，财富的概念正是人类价值取向的一个反映。一吨小麦、一架机器和一个软件程序是没有内在价值的，只有当这些产品满足了人类现在的需要，或是被看出在将来会满足人类需要的时候，它们才被确定了价值。正是这些通过市场符号——产品也好，财产价格也好——表达出来的价值取向，告诉了生产者，什么是值钱的，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生产什么是有利可图的。

从根本上说，任何物质产品的价值都取决于被主观认识到的价值。同样一个东西在市场上，可以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价值，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投资大众对它的将来抱有信心。当这种信心的程度高的时候，这个东西价值就高，价格就高上去了。

而决定这一信心程度的因素，大多是在一个经济过程里内生的——一个随着消费者和投资者在不断变化着的市场上的相互作用，而进行着自行纠正的经济过程。我并不认为，所有市场行为，都是对现实世界里的变化所做出的有理性的反应，但其中大部分一定是。因为，如果不是的话，在主要工业国家里存在了几代的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环境就是不可能的。当然，这一信心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经济国家在政治上的稳定。只有市场参加者能确定，他们未来的合同或契约是被法规保障的，他们才会制定这样的

契约。

但是，每个竞争的市场经济，即使是最稳固地建立在法规基础上的，也会处在一种经常改变的状态。于是，尽管社会和经济的稳定使消费者和投资者有信心并愿意长期投资，历史表明那种信心的程度也是很不一致的。

近几年来，全世界，特别是亚洲和美国市场经济的行为，已经充分表明“预期”（对市场上其他人的指望和信任）在现实经济发展中扮演着多么重要的一个角色。

亚洲发生的恶性循环，更强调了这种人类特性的关键性角色。人类这种特性就是对一个市场体系运行的信心，或叫信任。我们从事某一个行业的生产，因为我们相信，其他人会提供我们自己不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并愿意与我们交换各自的产品和服务。如果这种信任没有了，劳动分工体系也就垮了。一个关键性的因素，或说是一场恶性循环的最根本原因，就是信任的丧失。

相反，美国现今经济的发展，很大一部分可以充分体现为相互信任，产品和金融上的互换和交往，扩大而不是破坏了经济的进程。

……

所以，对“是不是存在一个新经济”这一问题，一个关键就是，现在对未来稳定的预期，是不是被现实经济中的变化证明是可靠的。现在市场上的“未来稳定”，明显地比十年前要好得多。如果人们对更加稳定的预期在市场上得到满足，投资必会更为踊跃，经济必会发展更快。

总之，对更高的经济增长来说，有两个因素至关重要：第一，技术进步的发展势头是不是能持续下去；第二，消费者和投资者对未来是否稳定的信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保持。

【3. 全球市场经济中的危机格林斯潘 1998 年 9 月 23 日给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的报告（节录）】

一年多以前在泰国发生的市场经济危机，发展到了东亚各国和俄罗斯的经济，最近又给几个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带来压力。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一传染已经停止。

而且，亚洲出口市场的下降，使得已经与银行危机苦苦作战的日本更是雪上加霜。所有这些困难都加剧了这样的前景：大战后最持久的一次经济衰退。

正如我在几个星期前在一个大学讲演时说过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美国，或许在这个意义上还有欧洲，竟能固守在繁荣的绿洲上，没有被一个正在经历着越来越大压力的世界所影响。

由于没有迹象表明，去年在亚洲爆发的金融危机已经减退，或快要减退，全世界的政策制定人都不得不对全球那些可能影响到他们本国经济的危机迹象的加剧特别敏感。俄国不是世界贸易大国，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也不是很关键的国家，但是，俄国危机的严重，当局对控制局面的无能，反应出东南亚危机影响之大。

俄国危机极大地影响到以美元为主的国际债券市场，席卷了韩国、巴西、波兰、南非以及中国等国家这些根本不同的经济体，极大地影响到美国证券。

几个星期来，国际局势的变幻，又加上了担心美国发生危机的上升，反应出对危机会影响我国经济的恐惧。

7月间我在国会面前作证时曾说过，国际危机的某些因素，实际上对美国金融市场和经济的影响是正面的。比如，降低了房主和企业所付的长期利率。但是，最近出现的更为恶性的情况，也侵害了我们的市场。对企业盈利的担心，以及在全球局势如此动荡不定之中要避免风险的本能，已使股票价格下降，债券利率上升。通过金融市场进行的基金流动也不畅了——起码是一时不畅了。银行在贷款给各公司时，据说也更谨慎、利息更高了。

不过，从整体来看，在美国国内市场上，外国金融的问题或者吃紧的状况，尚未对美国经济造成太大的削弱。劳工市场仍然紧张，加班收入继续在上升。

但是，在往前看的时候，最近发展的对美国经济的抑制作用很可能在加强。我们已经看到制造业的衰退给周边产品带来的侵害。财产抵押价格的下降和借贷成本的上升，会抑制房主和企业的消费，风云莫测更加剧和对风险的惧怕也会导致更为谨慎的消费行为。

当我在7月间就货币政策作证的时候，我解释说，联邦开放市场委员会担心，对劳动力的高需求可能会对我们的经济产生成本压力，破坏现在的经济增长。我还说，联邦基金的高利率是金融市场状况的必要补偿。但是到了8月中旬，委员会认为，国外的现状和国内投资人的谨慎行为，意味着经济发展的风险不仅是一方面的。从那时起，恶化着的外国经济及其对国内市场的影响，可能会使美国经济成长出现缓慢的程度大于通货膨胀的威胁。

正如我以前表明的，过去十年来电脑和传讯技术突飞猛进的进步，促进了跨越国境的投资和贸易的迅速成长，加入这个被称为我们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各个国家，都因此极大地提高了生活水平。正是因为有了新的技术，市场价格对价值取向的微妙变化更加敏感了，因此对这些变化的反应也就比过去更快速了。这个金融体系便成了一个不断提高的生活标准和对资本误用更为敏感的产物。

于是，出自这个金融结构的危机，就展现出与过去不大相同的特点。到目前为止，还看不清楚，最近的这些危机是比过去的危机更深，还是只不过发生得更迅速。

附录四 在联储会的头脑里 ——艾伦·格林斯潘通向新经济的旅途

理查德·史蒂文森原作 季思聪摘译

【本书作者按：联储会在 1998 年 9 月 29 日、10 月 15 日和 11 月 17 日不到两个月时间里，先后三次调低利率。《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等美国权威大报，均在第三次降低利率前后，对格林斯潘的政策和格林斯潘其人发表了长篇评述。

这里，我们摘译《纽约时报》1998 年 11 月 15 日周末金融商业版上的长文，作为附录，以供读者了解格林斯潘的思想转变。文中小标题为译者所加。】

按通常的惯例，星期二的早上快到 9 点的时候，格林斯潘必会从他的私人办公室走进联储会华丽的会议室，他会在那张长达 27 英尺的红木大会议桌的上首坐下，召集他当联储会主席 11 年来的第 91 次联邦开放市场委员会讨论利率会议。

整个过程几乎是一成不变的。

但是，亚洲国家去年爆发的金融风暴，在世界极大范围内引起了恐慌，美国本国的市场和经济也动荡不定，格林斯潘和他的联储会现在所面临的形势，已经变得不可预测了。

格林斯潘在消灭通货膨胀使命上的成功，使他达到了偶像的地位。现在的问题是，在一个不论是经济本身，还是经济所面临的威胁，都在以使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变化着的形势下，他还能不能同样成功地制定相应的政策。

到 1998 年底，美国的经济连续发展将达七年加九个月，除了 60 年代因越南战争的刺激带来的长时期发展，这一次持续发展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个记录。

对于格林斯潘来说，还有一层意义。他现年 72 岁了，尽管他尚未表明，到 2000 年夏天期满时，他是否还想再度连任，今天的经济形势都已经产生了一种挑战，其结果将决定他将如何被史书所记载。

在激流中格林斯潘想的是什么？对于这一点，任何试图解析他公开言论的人都会很快地发现，他很少正面回答问题。所以，经济学家、投资人、以及政治家们，自从他 1987 年接任沃尔克出任联储会主席以来，就一直在试图解读他的头脑。他们已经学会挖掘出政策上的任何重大改变，然后便期待着利率的变化。现在的猜想是，尽管经济有持续强势的迹象，格林斯潘将在两天后，在今秋已经两次降低利率的情况下，再次将利率降低 0.25%，以确保逐渐到来的经济缓慢不致导致为一次萧条。

不过，人们一向很少将注意力放在格林斯潘对经济现实所做的评估上面。格林斯潘在过去几年来，曾多次在公开场合里，在国会的讲坛上，在与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们的私人谈话中，对当今的改变着的经济，多次进行过一种更为广泛的和近乎哲理性的评估。

评估的核心，是金融市场。格林斯潘一度沉迷于从看似不重要的数据里找到出现通货膨胀的线索；现在，他引用金融市场上的数据，来表明他对投资人心理的担心——他担心投资人的心理可能会使经济偏离轨道。

格林斯潘很久以来被视为是个“一根筋”，或许还是一片窄筋的通货膨胀斗士，他一向小心，对价格稳定出言谨慎，他把价格稳定称为一个健康经济的“基本的先决条件”。但是通货膨胀现在已退潮，他也变得更为关注新的经济特点了：技术的进步正如何对经济产生着影响，技术与更强大的市场相结合，怎样可能会带来繁荣，或是带来全球性的大破坏。

新技术与全球金融市场：两大新因素

格林斯潘认为，随着技术的进步，对于提高生活标准来说至为重要的指标——生产率的明显提高，体现了企业界对电脑以及其他新技术多年来的投资，正开始收到回报。他相信，最易于产生衰退倾向的一些经济因素，比如工业生产力和库存量，现在被管理得更有成效得多了。

但是，格林斯潘又认为，现在的经济也越来越容易受到反复无常的金融市场的影响。联储会能够避免市场危机，却不见得能够把一个头脑发热的市场拉回正确轨道。

他的底线是这样的：全球的经济形势使得货币政策的制定更加困难，但是也促进了一种虽然不舒服、从长远看却是有益的向市场资本主义的转变。市场资本主义，是格林斯潘从身为爱恩·兰德信徒的50年代起，就大力为之奋斗的一个目标。

“不论是好是坏，一个无情的资本主义进程都在驱动财富的产生。”格林斯潘在1998年初的一次演讲时说：“对于那些希望实践一个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较为‘关照性’（caring）的资本主义的政策制定人来说，让他们认清当今经济的全部潜在内容，已是越来越困难了。结果，各个国家就选择了开放自己去竞争，去成为能够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生产者。”

格林斯潘一向受到很多批评，现在也不例外。有人认为他以提高就业和提高工资为牺牲，继续过分地警惕着通货膨胀，怪他没能更早地降低利率，而加剧了全球性的危机。另外一些人却觉得，他一心盯在市场上，全不理睬通货膨胀的警告信号。

另外一群人则认为，他的结论是从经济上暂时的好运气时期草率地得出的。西欧左倾政府的崛起，加上从吉隆坡到莫斯科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反对，都对他针对经济历史所做出的结论提出挑战。

格林斯潘当然不是一个人就制定了政策，他在联储会的同事们，对整个经济形势也自有他们的看法。但是，从格林斯潘推断式的分析中，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在过去几年里，当美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超过由传统的预测模式和规则所约定的“时速限制”时，联储会仍然保持利率不动了。以他的考虑为基础，格林斯潘最近已经就债券市场上的恐慌迹象，表达了他对经济所面临风险的关切。而且，即使这种恐慌开始平息，以格林斯潘的考虑，他仍会继续严密关注金融市场的问题。

格林斯潘的思想还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这就是，他更愿意重新考虑他的对策，而不在乎会丢分，他并不像很多人长期以来以为的那样，只专注于经济上琐碎的细节。

“格林斯潘给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思想对事实是开放的：每个经济圈都是不同的，经济是在不断变化的，而我们并不像我们以为的知道的那么多。”经济学家威廉·杜德雷（William Dudley）说。

数据的下面是什么？

去年一月的一个早上，格林斯潘来到南中央洛杉矶，沿着佛蒙特大道走了几条街。这里是 1992 年洛杉矶暴乱的发生地。他和几位国会议员、政府官员一道，走过那些上了门板、空无一人的店铺，有感于曾给这个国家带来繁荣的经济发展，对重建这个被破坏的社区竟毫无一点儿帮助。

格林斯潘后来对记者说：“我们的立法者整天接触着各种各样的数据，我认为，注意数据的下面是什么，是至为重要的。”

那次短短的“访贫问苦”，可不是格林斯潘一向的特色。他对工作采取的是高智力和不动感情的方式。

他是一个经济奇才，把自己埋在大量的统计表、原始数据、华尔街来的数字以及直接或间接送到他面前的各种信息之中。他的公文箱里，常常是装满了诸如《航空周刊》(Aviation Week)之类的各种经济贸易期刊。

他鲜少到工厂的车间，或是快餐店的厨房里去。除了偶尔拜访一下劳工领袖，他接触的人中，除了政府里、经济界、商界和金融界的精英人物之外，来往较多的就没有什么人了。但是，他却能凭着三十年给各行业当顾问的经验，对那些数字和数据，在真实世界里可以如何运用，做出自己的评估。

曾在 1991 年至 1997 年担任过联储地区银行行长的劳伦斯·林赛 (Lawrence B. Lindsey)，在自己的书里曾回忆起联储会几年前的一次会议。在那次会上，讨论到一场洪水已经阻断了密西西比河上几乎所有桥梁，造成货运中断，只有一座桥幸免。“格林斯潘不仅知道那座桥的位置，而且知道各种可以用来做运输的改道路线。”

格林斯潘数据收集的广度，往往使他在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不依赖于某一种预测模式或成规。一般认为，有一个“天然的”失业率标准，低过这个标准，如果经济还在以正常速度成长，则不可避免地埋下通货膨胀的祸根了。格林斯潘却对这一标准的存在表示质疑。被其他决策人看做通货膨胀主要决定因素的指标，在格林斯潘看来只是“指标之一”，而且还不是很可靠的一个指标。

官员的干才和学者的视野

不过，在避免依赖以往成规的同时，格林斯潘对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还是非常敏锐的。经济学家大卫·黑尔 (David Hale) 说：“他身上有学者的一面。我们商业界里的很多人，都被金融市场上的风云消耗尽了，他却能有历史的视野。”

格林斯潘正是从历史中寻找答案，来解释为什么前几十年的电脑革命以及其他技术进步，没有如预期的那样，伴随生产能力的大提高，而是伴随了 70 年代的下降——直到今天，才现出了翻身的迹象。

他经常引用两位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保罗·戴维 (Paul David) 和内森·罗森伯格 (Nathan Rosenberg) 的著作，他们认为，新的技术被商业界完全地吸收和利用，往往需要几十年时间。例如，利用蒸汽动力的工厂，敌不过电力发展带来的优势；而只有当新的工厂都使用电力为动力的时候，它们的产量才会提高。

“我们在现代环境里可以看到的是很多重要技术，有些甚至很成熟，它

们互相促进，最终产生出具有极大意义的新机会。”

如果技术开始转化为生产能力了，便可以解释过去几年的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失业率那么低，经济又稳步增长，为什么没有出现通货膨胀？可能实际生产能力的增长，要高于官方统计数字所显示的，而对这一可能性的这一层考虑，似乎就是格林斯潘在过去几年里都并不急于提高利率的一个关键原因。

格林斯潘认为，高技术还改变了经济圈的运转。高技术允许商家更迅速地调整库存，缩短新进货的设备投入使用的周期，使通常伴随衰退而来的不平衡被减弱了。

不过，高技术同时又赶不上金融市场的成长规模和威力，金融市场正在反过来更直接、更强有力地影响着经济。

在过去几年里，当股票市场不断地上升的时候，消费者出手便大方得多；而如果市场持续下降，人们自会比较地节省一点，这是常识。

企业家们已经越来越转向股票和债券市场来使金钱升值。正如资本的充分刺激了经济的发展一样，信贷在市场中的紧张也可能使经济的发展停滞。

最难应付的是市场非理性热情

而且，随着技术的进步，投资人可以把钱从一个地方任意转到另一个地方，任何国界都不能阻挡金融股票的流动。用格林斯潘在一次演讲时说的话：“新技术已经从根本上降低了跨越传统国界把钱借进借出的花费。”金融的全球化，在提高了生活标准的同时，也“迅速而决断地暴露和惩罚了潜在的经济弊端”，也使金融危机的传染比以往更方便得多了。

而政策制定人由于必须关注市场的波动，就不得不面对投资人心理的复杂性了，这是一个就连格林斯潘也不能完全把握的变数。

从两年前起，格林斯潘就花了不少脑筋，来考虑如何应付市场的“非理性热情”。他试图通过讲话给市场降温，但只在短时间里有效，他似乎也觉得没有什么好办法，来减少金融市场上的泡沫了。

林赛在自己的书里写道，今年4月，股票市场先是下跌，然后又反弹，在此前不久，他曾与格林斯潘进行过一番谈话。格林斯潘说：“你要市场干预打破泡沫，可这里存在一个根本性难题——你得比市场知道得多才行得通。”适当的时机是又一个难题，你可能打破得太早了，于是它又鼓胀起来；下一次，你又可能让泡沫胀得太大了。谈到中央银行是不是适当地干预着市场，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有人就问了，我们是管什么的，对于是不是真的存在泡沫，谁来做出判断。”

几个月前，白宫南草坪一次集会上的一位来宾，回忆起那天看见格林斯潘和他的太太，NBC的记者安德丽·米切尔。他们站在离克林顿总统不远的地方，当时克林顿先生愉快地摆好姿势，准备照相，米切尔在和朋友聊天。格林斯潘尴尬地站在那里，仿佛在担心有人会走过来问他，现在是不是投资的好时机。

格林斯潘对公众那张郁郁寡欢的脸，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个面具。他酷爱棒球，具有音乐天才，在纽约大学拿到经济学位前，他还在乐队里演奏过萨克斯管呢。

克林顿临危不倒归功于谁？

他与克林顿内阁的关系最为密切，他对现在的政府的影响，远比对首次任命他的里根总统，或布什总统内阁的影响更大得多。共和党人常常怪他对1990到1991年的经济衰退反应过慢，造成1992年布什总统竞选的失败。

克林顿在历史上的地位，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格林斯潘在过去六年里治理经济有方，也要看在今后两年里经济保持得怎么样。有人说，克林顿今年能临危不倒，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选民们对繁荣的格林斯潘时代的满意。

于是，如果格林斯潘本人愿意，他几乎肯定能够指望被克林顿提名，在2000年第四次连任。格林斯潘受够了压力和批评了吗？

现在这个责无旁贷的人没有说话。不过，要是华尔街和华盛顿都想象不出来，一个后格林斯潘世界会是什么样的话，不妨想想当年，他们也曾无法想象过没有沃尔克的日子。

附录五 格林斯潘批评香港政府入市干预 引发要求国际金融正义的强烈呼声

【格林斯潘批评香港特区政府，碰了个不硬不软的钉子。其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借用中国内地过去的术语，是“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至少包括两个方面内容：其一，是否应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的游戏规则？其二，政府干预、采取保护措施是否与自由经济水火难容？】

格林斯潘赫赫有名，但他的名声主要是震响于西方经济界。中国人因为不了解美国政治经济体制，不了解联邦储备体系，对格林斯潘的权力与影响力也就不大了然。被亚洲金融风暴袭击了数次的香港，国际大炒家乔治·索罗斯的名气要远远高过格林斯潘——此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正不压邪”。

但没想到，格林斯潘 1998 年 9 月，却卷入了香港的一场大争论。香港报刊将格林斯潘译为“葛林斯潘”，“葛老”这个带点诙谐的昵称，一段时间频频出现于香港多家报刊的头版。

香港再次成为“提款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布雷顿森林会议”为基础而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致力于国际经济稳定有序。经过 70 年代改组重整后，一个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时代宣告到来。但就在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即开始对全球化资本的威力忧心忡忡，1978 年，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托宾教授发表了一篇经典性论文，探讨跨国金融资本可能为害。他指出：“汇市上的投机，常常给各国经济造成严重而痛苦的后遗症，各国的内政政策对此均无法逃避或驱离。”托宾提出一个主张：对跨国金融交易课以税捐，人称之为“托宾税”。

主流的跨国资本集团却无意被捆住手脚，因而拒绝缴纳。然而托宾不幸言中：一个跨国金融资本为害的时代果然到来。它可以是图利少数人而为害多数人的投机筹码，甚至可以作为一种国际战略武器，其效用有时未必逊于核武器。1992 年投机客狙击英镑和意大利里拉，即不能说没有破坏“欧洲货币稳定机制”（ERM），以阻拦欧洲货币统一的目的。美国《华盛顿邮报》自由派评论家威廉·伐夫，1997 年也曾撰文，认为狙击亚洲各国货币的深远图谋，是借此摧毁亚洲政府维护其经济与金融自主性的功能。

跨国金融狙击集团对香港始终无法忘情。香港是中国伸出的一只脚，借着狙击香港而可以将政经后遗症投射到中国内地。从“九七回归”至 1998 年夏，一年之内香港已遭 4 轮狙击，被国际炒家视为“提款机”，攫取暴利。

香港百仕达控股助理董事朱军用了一连串颇带感情色彩的文学词汇来描绘国际炒家：他们“个个是身怀绝技的赌场老手，是伺机而动、一击即中的秃鹰，是游弋于大河中一见猎物即张开血盆大口的过江大鳄”。可见香港人对国际炒家恨之入骨！

索罗斯的“量子基金”（Quantum Fund）及朱利安·罗伯逊（Julian Robertson）的“老虎基金”被认为是狙击香港的主力。量子基金和老虎基金都属于“对冲基金”（Hedge Fund，台湾称“避险基金”），即替投资者对

冲投资风险的基金。当他们看淡市场，就会抛空一篮子股票，并融资买入股价偏低的股票。这种基金的特性是快、狠、准，对冲基金经理惯用“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交易技术，投资各种金融商品，寻找套利（Arbitrage）机会。目前全球估计约有 1200 个对冲基金，管理资产值约 1180 亿美元，其中全球宏观对冲基金有约 60 个，资产值约 300 亿美元。这类对冲基金紧盯着各国经济情况，若发现某国经济政策矛盾，难以维持币值稳定，就会大举抛空其货币。

该出手时就出手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但比真实的战争还有杀伤力，可以杀戮于无形。自 1997 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炒家连续利用先进的金融技术，在回归中国后的香港发动狙击，迅雷不及掩耳，在汇市、股市期货市场的 3 条战线同时行动，声东击西，移形换位，使香港蒙受巨大损失。

事不过三。到了第四次，哑忍已久的香港政府终于不甘坐以待毙。港府立下决心，挟 900 多亿美元庞大外汇储备的实力，对来犯的国际炒家迎头痛击，引发了一场国际经济史上最大型的金融战争。

据悉，“量子基金”、“老虎基金”以及另外两家美国投资证券公司，这次动用资金逾 50 亿美元。其目的即是企图借着跨国造势，炒作汇市、股市以及其他衍生性金融商品，如股价指数等。它在上海炒作黑市人民币，但这一黑市市场格局有限，仅将人民币由 8.28 元炒到 9 元，中国折损 4 亿美元外汇储备，接着中国每日又以 1 亿美元拉抬人民币价位，使之炒作之功未达目的。炒作港币战场，香港用外汇存底的抛售来承接掣压而出的港币，也使得对方炒作无功。

最后则是在股市炒作上的对决。特区当局终于决定以政府力量介入干预，大笔承接所谓的“蓝筹股”，其中又以左右香港股市的“汇丰控股”“和记黄埔”等为主。在 8 月 28 日天昏地暗的激烈攻防战中，疯狂的买卖创下历史纪录——平均每分钟的成交额高达 4200 多万美元，炒家接二连三狂抛卖盘，港府前仆后继泼命买进，全日成交额竟高达 101 亿美元。这天恒生指数是 7829 点，下跌 93 点，其中抛空股份交易数额达 9 亿 3000 万美元。港府的外汇基金接了价值几十亿美元的股票；期指成交数目达 44000 张，但转仓到 9 月份的期指超过 10 万张，可见国际炒家并未离场，而是策划打持久战。

和前三次狙击不同，这第四次狂袭，索罗斯集团没有隐姓埋名。索罗斯的“大弟子”——其属下基金的经理史丹利·德斯米勒公开向港府下战书：“我们手上有 200 亿美元，以我们的规模，从来不做无把握的事。”

港府也不打无准备之仗。8 月 14 日进场干预股市及期市时，已经做了两手准备，先买进多种影响股市升降的蓝筹股，买进 8 月现货月期货指数好仓（Long Position）合约，推高指数，同时大量吸纳 9 月份期货指数淡仓（Short Position），扩大 9 月份与 8 月份的指数差距，从而增加国际炒家的转仓（Roll-over）成本。假如股市及期市下跌，已拥有数量巨大期货指数淡仓在手的港府可以获利，抵销了部分风险。

港府还力争本地富豪支持，财政司曾荫权联络多位华资及英资富豪，希望他们进场吃进股票，或至少不要抛售手上股票及借出股票给国际炒家作抛空之用。8 月 27 日下午 4 时，港府政务司陈方安生也出面，把长江实业主席

李嘉诚次子李泽楷，太古集团主席萨秉达等多位华资及英资超级富豪请来恳谈，希望得到襄助。

香港富豪普遍支持政府的入市干预。李嘉诚表示：“大家一定要支持政府，因为政府是为股市好及稳定环境，政府没有别的选择。”虽然他拒绝透露是否买进了股票，但他强调本人持有的股票及长江实业系市值共 1500 亿港元的股票，在过去一个月没有卖出过一股，短期内没有计划减持，更没有借出股票给国际炒家。

针对炒家不断放出有关联汇将要脱钩的传言，港府大打宣传战，高官强调不会放弃联系汇率。北京也助一臂之力，中南海领导人反复说支持港府维持联汇，并重申人民币不会贬值。

港府出手介入，开始纯属自卫，后来演变成反击，在股市、期市兵分几路与炒家交战。初期“御用庄家”数目不多，默契也不够，被炒家突袭成功，未能完全控制市场秩序。及后“御用庄家”数目增加，有些股票及期货指数“御用庄家”配合需要，突击出手，作为奇兵，令国际炒家较难捉摸。“御用庄家”一位高层人员透露：港府“选择‘御用庄家’并不容易，既视乎是否有需要，更要确认是否信得过。兵凶战危，泄漏‘军事机密’，危害可大可小。”

港府最直接的用意，是要国际炒家付出高昂的买卖成本。8月28日，港府首先抽高香港银行拆息，由隔夜至6个月都收紧，一星期最高曾达30厘半，比前一天高出8成。目的是增加国际炒家抛空港元的借贷成本，减低他们抛售港元的力量。9月1日大规模股票交收工作大致完成后，拆息立即随着香港金融管理局注入资金而大幅回落，一星期拆息下跌至12厘水平，隔夜拆息更低至5厘，舒缓市场紧张的银根。

炒家惨败 港府惨胜

现代国际金融市场的运作，决定了任何金融干预都将是一种艰难措施。金融投机狙击通常皆为预付定金的期货交易，而金融保卫则需要以“实”来应“虚”，对防卫者极为不利。金融防卫战在国际形势不利之际应用，防卫者很容易就被套牢，因而失血，反而引来更多嗜血的“野狼”。

金融保卫战中的香港正是处于这种不利于防卫者的困境。8月14日开战之后两个多星期，香港暂时惨胜，但千亿港元却耗了进去。而就在此刻，俄罗斯经济危机迸发，全球震荡又起，各国股汇市再一次严重下泻，使得香港货币及股市又出现下滑的预期。也正因这种俄罗斯因素，9月起，香港的防卫策略开始改变，不再无量承接，逐渐往加重投机成本的方向移动。

特区政府财政司曾荫权在期货指数结算日举行记者会，解释港府的干预行动。他说港府透过金融管理局，在过去两星期于股市及期市进行活动，打击那些同时抛售港元、沽空港股和恒生指数期货合约的货币炒家。过去两星期内，港元稳定，恒生指数上升约1200点。曾荫权指出，国际炒家不但无法因恒指及期指暴跌而获利，更要为8月份的沽空期指合约进行结算，即使国际炒家选择把8月份期指合约转仓为9月份合约，也要付出高昂代价。

由于日元回软，俄罗斯、欧洲、拉丁美洲及美国金融市场混乱，吸引国际炒家的视线，总算令香港有了喘息机会。万国宝通银行财资推广部副总裁麦锦芬透露，9月1日下午已见到索罗斯在汇市平盘离场。但麦锦芬说：“国

际炒家徘徊不去，还在低位买入三、六、九个月期抛空港元的美电，香港难以安心。国际炒家目前在香港仍有利可图，不肯离开，相信仍想找袭击的机会。”

目前，参战双方各自改变战术。国际炒家准备把港府引入持久战；另一方面，港府已就打击国际炒家定下中长期策略，着数甚多，准备抗争到底。从9月开始，香港的金融保卫战已转变成长期抗战，香港将会更加艰苦，而随着这种“焦土抗战”，中国内地也注定无法置身事外。在亚洲金融联防尚未形成之前，香港与内地联防已成不可避免的趋势。

港府在这场大战中迎击国际炒家的战略得到广泛认同，但在战术上却有不少漏洞，例如，“敌暗我明”，收集炒家情报做得不够；而国际炒家却充分搜集了市场情报。虽然港府找来部分友好人士出手帮忙，但总像一盘散沙，欠缺默契。

最关键的漏洞是港府和中央结算公司、联交所、期交所没有做出配合协调，中央结算不能逼使无股票抛空者束手就擒，原先要把炒家赶入穷巷的战略功亏一篑。

香港法例禁止非法抛空股票，不准许无股票在手的人士在股市下跌时先卖出股票，然后在低位回补。不能依期交付股票予买方者，最高可罚款1万港元及监禁半年。这场金融大战后，港府已做好部署，向犯规者采取行动。可惜百密一疏，未能实现预期目标。香港法例本来规定股票买卖后两天内交收，但在大规模交锋之日两天后，却有75亿港元股票不能依期交收。而负责股票交收的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却容忍不能在9月1日交出股票的经纪，在过了限期的9月2日补购股票交收。

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指责中央结算这种做法极不公道：“不能交出股票的人非法抛空，实际上已经犯法，他们并且因延迟交收而获利，金管局一定要调查。”金融业人士把这种现象称做“一边捉人一边放人”，枉费气力。他们强调，港府应该统筹协调金管局、联交所、期交所、中央结算以及相关机构，成立跨部门组织，堵塞漏洞。甚至还有人呼吁：金融大战除了“外抗强权”，还需要“内除国贼”，港府应运用公权力，请廉政公署调查究竟有无“利益冲突”或内外勾结的“害群之马”，慎防整个金融系统“内神通外鬼”，莫名其妙地落败。

这一回合被形容为港府“惨胜”，但它毕竟守住了香港汇率长城。香港《亚洲周刊》9月初的文章说：香港金融大战的结局如何，诡谲难测，但至少港府当局已煞住了索罗斯这些大炒家的威风，使其不再以为香港是自动提款机，予取予求。初步估计，炒家已输掉13亿港元。

补疮剜了心头肉？

这场金融大战还有一个副战场，其刀光剑影之激烈，竟也不亚于主战场。这就是围绕港府是否应该入场干预进行的大辩论。

港府进场干预确实会产生非常复杂的后果，而香港主流舆论一贯珍惜自由经济，港府此种非常举动，不可能不引起巨大的震荡。批评港府此举破坏了金融自由原则，“倒掉洗澡水同时倒掉婴儿”的反对声浪一时铺天盖地。

一些著名的大学教授与学者纷纷指责港府的行动无异“自杀”，“浪费纳税人的钱”。香港著名经济学教授张五常表示，港府的行动是“担沙填海”。香港财经报章《信报》林行止评论更指港府“作法自毙，愚不可及”。批评

港府入市的香港学者，大多都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莱德曼（Milton Friedman）为宗师。这位芝加哥货币学派的大师认为，亚洲经济危机成因不是资本自由流动，而是资本流动不够自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是救星，而是毒药，它与央行及固定汇率都为不符合经济效益的投资提供温床。

而国际炒家也趁机发动宣传和心理战，煽动民众对港府行为合理性与正当性的质疑，引发对港府“入市干预”会使“香港自由经济沦丧，难保金融中心地位”的忧虑。另外也不断耳语流传，“人民币即将贬值”，“港元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不保”等。

但香港的大多数民意却支持港府的自卫反击战，恰与一些媒体和学者的看法成为强烈对比。根据民意调查，约 37%的民意认为港府反击行动正确，应入市干预，比不赞成者多 15 个百分点；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声望甚至因此而回升。

值得注意的是，后来舆论也慢慢有所转向，理解政府在非常时期的干预行动情有可原，站得住脚。《信报》林行止的评论也一改较早时坚决反对的立场，表示“管制并非一无是处”。

这场金融大决战因联系汇率而起，也显示港府保卫联汇的决心。炒家的最终目的是要搞垮香港股市，冲破联系汇率。曾荫权强调维持联系汇率是他的责任，因为稳定的货币政策是香港的资产。若任人肆意冲击联系汇率以图利，结果令香港 600 万人的经济利益受损，那就是他失职。曾荫权也再三解释，港府会尽量避免在公开市场进行干预，“我们对工商界一直保持最少干预和提供最大的支持”。他重申，政府行动的目的并不是要把股价维持在任何特定水平。

然而，金融界人士则认为政府此举将产生多种效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证券界人士认为，国际炒家来意不善，港人应团结起来支持港府，共同对敌。他叹道：“南韩及泰国去年遭受国际炒家侵袭，很多国民都捐出金器、美元去支持政府，虽改变不了现实，却是对政府的一分关心。”三洋证券（香港）有限公司业务副总经理龚豪东认为，一开始港府就处于两难中。他指出，引发这场大战的直接原因是联系汇率给炒家有机可乘，买入远期美电，吊起利息，压低股票，沽空期指，把香港当做提款机。港府如果不出手，将永远没完没了，香港整体经济必受影响，东南亚其他一些国家已见恶果。但港府干预迫炒家离场的目的没有达到，却陷入持久战。龚豪东担心这样一来，港府的干预也要持久下去，长此以往会影响香港自由经济的形象，股市被政府垄断，自由经济的概念不清，会吓退投资者，也把香港经济的复苏期拖长。

所罗门美邦董事总经理、亚太地区投资银行部主管宦国苍则认为，自由经济并非“神圣不可侵犯”，干预股市和干预汇市本质上没有差别，“国际上有很多政府干预的例子，只是大多不成功”。引人关注的焦点却是技术层面，“港府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无可厚非，但要考虑实际操作的有效性、效益和成本之间的关系。港府首战告捷，但赢得有限”。他说，二强相遇，政府改变了游戏规则后，要真正达到稳定汇市的目标，还需要有利经济增长的配套措施，在根本上消除隐忧。

宦国苍指出，政府干预市场应该达到 3 个目的：提高炒卖的风险、提高炒卖的成本、增加期货市场的透明度。宦国苍认为，投资者关注的是投资股市的价值，目前香港股市平均市盈率（本益比）仅 8 倍，对投资者有吸引力，只要上市公司保证质量，同样能引起投资者的兴趣，香港依然能保持内地吸

引海外资金窗口的功能。宦建议，中央政府可以考虑安排一些优质企业赴港上市，可以起到吸引资金稳定金融市场的作用。

香港许多媒体在国际炒家大敌当前之时，还纷纷向政府献计献策：办法之一是缩小投机炒卖的活动空间，增加炒家成本。香港已处风雨飘摇之秋，对外来炒家绝无必要装得比美国还要宽容、客气。另一办法就是尽可能增加市场透明度，尽可能置“敌”于明处，以健全港府的金融“预警系统”，也便于发现炒家动作是否违规。发现违规，说罚就罚，说抓就抓，说赶出场就赶出场。有些媒体埋怨说，有人老把“维护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挂在嘴边，但任由个别国际炒家把香港市场搞得天翻地覆，“金融中心”的招牌还能挂多久呢？

海峡两岸的目光交集

港府在行动前开会反复研究，和北京中央当局达成默契，取得北京全力支持。据称，中国人民银行派出两名高层人员督战。市场盛传北京已准备400亿港元（折合约52亿美元），随时进场协助香港退敌。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常务副主任刘金宝说：“中国的1400亿美元外汇储备，部分可以买港股。若港府提出，中国会全力支持。目前则没持有港股。”

国务院国家信息中心高级经济师李国斌说，北京对香港的支持是实在而有力的。北京当局确实没有真枪实弹加入港府与国际炒家的交战，暂时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港府有足够实力应战。但香港是“有钱出钱”，北京则是“有人出人”：一批金融智囊，其中不少从华尔街“退役”，实战经验丰富，在港府出手前后会给予不少专业意见。

北京全力支持保卫港元，出于一种唇亡齿寒的情结。当时正值全国千万军民和洪水搏斗之际，中南海已意识到更可怕的是“金融洪水”。8月28日，江泽民在外交部第九次驻外使节会议上特别强调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他说，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任何国家也回避不了。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谁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去发展自己的经济。但江泽民要求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保持清醒的认识。次日，朱镕基也在会上“交底”。朱说，新一届政府提出：保证人民币不贬值，保证经济增长8%，保证通货膨胀3%。当时根本没想到外部环境会这么恶劣，金融危机这么严重，形势很严峻，容不得乐观。

李国斌相信，中央政府和专家学者全力支持港府的主动出击。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内地是香港强大后盾，和炒家相比，实力绝对不弱，金融专家在技术上完全有能力与国际炒家抗衡。

中国的学者相信，明年初欧元出台，美元有调整息率的机会，可能舒缓人民币和港币贬值的压力。最近北京官员更明确提出人民币不贬值的时间表，再非以往口号式的承诺。8月20日，中国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李福祥首次指出，人民币一两年内不会贬值。专家认为，政府是向外界发出清晰讯息，让炒家再不要造谣以图把人民币和港元都拖下水。

在港府进场与金融炒家血战的问题上，海峡两岸的看法体现了难得的一致。台湾各界多赞同港府对付炒家，当局禁止索罗斯旗下基金登“台”买卖炒作。

台湾群益证券财务部协理林条指出，索罗斯集团以非经济因素来扰乱经

济市场运作，当然要用非经济因素加以解决，政府的介入不能视为违背自由市场经济的原则。林表示，索罗斯集团选择的攻击目标虽然都是一些经济及金融体制出现问题的国家，但这集团更善于利用媒体，大肆炒作负面消息，大幅提升投资人的恐慌心理，再借机趁虚而入，这种做法并不道德。

京华投信基金经理人郑世仁则指出，索罗斯的做法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他们透过包装过的武器来攻击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政府当然必须出面反击。但郑指出，港府采取干预期货指数、提高保证金比例等措施，短期内虽能遏阻炒风，但香港的经济情况若没有改善，投机客仍会伺机而动。

由于传言台湾将是索罗斯下一个狙击目标，台湾中央银行及财政部已提高警觉，除了禁止索罗斯集团旗下基金赴台买卖外，对于异常的大额外资汇入，银行必须通报央行，央行也全面监控。政府负责人指出，赚钱不能不择手段，更不能因此造成市场混乱及国家大乱，要特别提防索罗斯集团动向。台湾调查局已对索罗斯吸金情况展开调查。

全球分成两大派

香港金融大血战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对这场战役中双方作为的评论，见仁见智。

国际金融界、学术界批评香港政府“破坏自由经济”的炮火是相当猛烈的。但是，另一种声音也并没有被压住，使人感到香港金融保卫战并不孤独。甚至被香港舆论认为对亚洲一向不太友善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克鲁曼，这次也站到香港一边。国际金融投机集团的毒害已愈来愈影响到全球经济之稳定，他们假借自由之名所行恶事，已日益引起公愤。克鲁曼教授说：“自由市场并不表示就不存在滥用自由。故意操纵别国的金融是不对的事，香港的干预是惟一的可用工具。”只是即便支持港府行动者也都为香港担忧：香港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大卫”，敌人却是硕大的巨人“歌利亚”。

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的普莱特教授在《洛杉矶时报》发表专论，探讨香港正在进行中的金融保卫战。颇为称赞这场“大卫对巨人歌利亚的战争”：“香港企图驱逐投机者的策略，利用政府的金钱来拉高股价和支撑汇率，的确是勇敢的行为，当然也可能失败。但它若不失败，香港政府即将被视为一个天才，它终于设计出一个示范性的方法，可以驯化那些造成亚洲惨局的外来大野狼。”

“香港对国际经济稳定这个难题的贡献，在于它找到了股市和货币狙击间的关系，并企图让这两种狙击的效果能被减至最小。”由香港的举措，亚太国家的财长应当培育一种协同工作的团队精神。“只有这样，亚太国家才不会被金融投机者的‘行刑队’一一分化，并个别杀戮殆尽。”普莱特教授建议：这种金融防卫应发展为一种亚太的“区域联防”。

正当这一关键时刻，一言九鼎的格林斯潘，却对港府进场干预的行动表示不以为然。

“葛老”投下反对票

格林斯潘对中国、中国香港以及亚洲的金融情况，一直密切地注视着。

早在香港金融血战之前的7月22日，格林斯潘在半年一度美国国会作证，答复民主党参议员陶德的询问时就说，亚洲金融危机已使中共所厉行的

经济改革处于危险之中，由于中共对台湾、南韩、新加坡、香港和日本等亚洲国家的出口都大幅下降，中国内地国营企业已产生严重内部财务问题，使其企业盈余与现金周转受到严重压力。

他说，中国 1998 年经济成长率，官方的目标是 8%，但第二季实际数字换算成年成长率仅 6.8%，中国内地邻近经济体的金融危机，对中国“明显已造成问题”。

他说，中共了解继续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对于中国内地有更大利益，因此没有迹象显示中共有意退缩，只是眼前的亚洲金融危机造成更大压力，使中共全力推动的经济改革面临某种危险，“当你面对眼前短期危机时，通常都会把长期要做的事搁一边”。

当香港金融战暂告一段落，而争论则愈演愈烈之际，格林斯潘 9 月 16 日在美国众院金融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对香港干预股市的行动提出了明确批评，认为这是不智之举。

这次听证会上，格林斯潘认为，目前全球面临的重大危机是通货紧缩，经济发达国家有必要透过健全的国际金融体系，对饱受金融风暴之苦的新兴市场国家进行援助。但这种援助行动必须在严格条件之下进行，并且对国际资金的借贷进行严密监控。

在同一次听证会上，美国财政部长鲁宾指出，泰国及南韩的经济已见回升稳定，但印尼改革未见成功。他指出日本需要迅速采取措施刺激由国内需求带动的经济增长。鲁宾又说，国会应对援助国际货币基金（IMF）的资金松绑，拖延对国基会注资，损害了全球金融市场的信心。格林斯潘也认为美国的经济仍然强健，但由于全球通货紧缩力量使得农工原料价格下跌，这股力量逐渐侵蚀到美国经济。这番话似乎暗示美国终将调降利率，但在会后问答中表示目前暂不“联合调降利率”。

尽管格林斯潘特别指出，日本银行体系的问题以及疲弱不振的经济体，使亚洲的问题更加恶化，但他更对亚洲各国政府近来的举动提出抨击，表示控制资金并不是解决金融危机的正确方式，政府应该做的是强化金融体系。

格林斯潘表示，有些人从当前国际资金横扫全球市场的现象，就认为跨国资金的自由流动会伤害经济成长、降低生活水准。格林斯潘说，中国及印度对资金流动施加管制，使这两国较少受到冲击，但如果因此得出“资金自由流动危及增长及生活水准”的结论，就大错特错。例如，（中国与印度之外的）亚洲国家受金融风暴冲击，平均损失国内生产总值的六分之一，但其人均收入仍超过中印的两倍半。他呼吁亚洲国家不要放弃“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资金管制并非解决金融危机的妙策，而资金自由流动才是经济增长及提高生活水准的要素。尽管国际金融系统的新伙伴们目前正饱受国际资金流动之苦，但他希望这个现象能够有所改善，如此不但对新兴市场经济体有利，也对长期参与该体系的伙伴有利。

格林斯潘特别针对香港发表了意见，对香港政府近来动用外汇买股票，强力拉抬港股的做法颇不以为然。他认为，第一，港府的“托市”（Jack up）行动绝无成功希望；第二，港府这么做的后果，将严重损害金融管理局长期以来建立的卓越信用，很不聪明。过去香港的成功在于有一套固定而可信的货币及有关政策，但如今港府却做出毫无理据的事情。他希望这种事情只是一件个别事件，今后不会再发生。

“旁观者清”还是“不挑担子不知重”？

一般人的批评倒也罢了，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地位之崇高，开口点名严辞批评香港政府介入市场为不智之举，虽不能说有“一句顶一万句”的分量，也实在会造成重大影响。本来就反对港府此举的人，自然认为格林斯潘“旁观者清”，但是支持港府此举的人，则认为格林斯潘是“不挑担子不知重”。

香港政府对格林斯潘的批评不敢等闲视之，两位最高财经官员立即分头为港府行动作自我辩护。

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在立法会答复议员的质问时表示，炒家早就向一些在香港发行港元债券的国际大公司调借港元，伺机狙击港元。为了打击国际炒家的活动，政府不得不大举进场，承托恒生指数至某一个水平。他说：“政府买入的股票，是恒生指数 33 个成分股，而且都经过仔细的计算。”港府并非“托市”，只是想制止炒家作跨市场双边操控。他强调干预行动乃合理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任志刚还透露：曾与美国联储会的其他部分成员接触过，对方曾表示对港府干预行动的支持和谅解，但不知这些成员是不是曾将情况转告格林斯潘？如果真是如此，就表明，美国联储会委员在这一问题上看法是有所不同的。

而有“财爷”之称的财政司曾荫权，9月17日在立法会中回应议员有关格林斯潘批评的提问时则说，“一向以来，许多言论客观的评论员，称许香港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场。正因如此，我们8月在市场所采取的行动是一个非常困难但严肃的决定。我们当时所陷的处境，令我们相信已没有其他选择。”当数目庞大的对冲基金冲击像香港那样一个小市场时，若仍纯理想地为实行完全自由的市场机制，不但香港经济将会壮烈牺牲，并且更会引发亚洲其他地区以至俄罗斯及南美的另一场贬值潮，故此才做出干预行动。他还说：“我们必须捍卫香港的联系汇率，否则会在全亚洲区触发另一轮的货币贬值浪潮，甚至可能会在区外引发更大的灾难。”

不过，曾荫权表示并不会因此而怪责“葛老”，而是会“耐心向他解释”。他说：格林斯潘放话批评港府，这可能是他不完全了解事情的经过与背景。“我觉得有少少诧异，亦有少少惆怅！”他还透露，在“葛老”发表批评后不到24小时内，政府已发信给对方澄清自己的立场。事实上，一得知格林斯潘的指责，香港金管局即时发信。曾荫权保证，香港市场将继续自由、开放和监管完善。

除了写信澄清立场，曾荫权还表示9月底出外访问时，将向各国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解释入市干预的理据，以争取广泛的支持。

只许州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如果说官方几位负责人的态度还相当客气，那么民间就大不一样了。香港媒体针锋相对地指出，“葛林斯潘（格林斯潘）公开批评香港金管局介入市场，很明显，他是同对冲基金同一鼻孔出气”。

香港分析家具体分析了格林斯潘指责的依据，认为，格林斯潘无视老虎基金和对冲基金从“自由市场”予取予夺，对它们采取支持态度，认为对冲基金“给世界带来了可观的增长”；而香港与新兴市场受狙击，都是咎由自

取。格林斯潘的说法有 3 点是同东南亚、同香港的实际情况不相符的。

第一，香港并没有出现债务危机，也不存在未能如期还债问题。而东南亚的问题是由于短期债务被对冲基金狙击货币而出现大跌市。

第二，美国拥有巨大的金融体系，可以经受大量对冲基金热钱流动所形成冲击，但香港股市的体积仅为美国的 3%，东南亚的股市体积更小，无法抗拒拥有 3 万亿美元热钱大量流入流出所造成的冲击。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处于不同的经济金融发展阶段，也处于非常悬殊的实力地位，格林斯潘要求香港与东南亚国家像美国一样有能力应付资金流动的大量冲击，实际效果是让对冲基金“自由”获利。第三，对冲基金的狙击，造成了新兴市场的痛苦，庞大外来资金对新兴市场进行掠夺，是不道德的。如果倒果为因，说成是“高效率的金融体系，将失误高速传遍世界”，为对冲基金披上合理和合乎道德的外衣，是不妥当的。

香港舆论还分析了这次大血战的进程，认为格林斯潘所持的是双重标准，难以服人。对冲基金狙击港元汇率，靠的是资金庞大，靠的是高效率，靠的是香港债券市场和股票的高度开放，他们可以在香港债券市场套取 380 亿港元作为弹药，可以贷借股票抛空，从而获取 400 亿以上的港元现金，可以毫无透明度地积累近 10 万张期指淡仓合约，他们付 5% 的按金，可以抛空上百亿美元的远期美电。他们已经操控了汇、股、期市场，造成一面倒的形势，由于没有对手，市场机制已不起作用，加上大量散播“人民币贬值”、“港元与美元脱钩”的谣言，形势危急。任何负责任的政府皆要保卫汇率，打破操纵市场；美国一直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甚至出手在期货市场同白银大王亨特兄弟对抗，使之破产。最近外国有人抛售万国宝通银行之股票，美国证监会立即打越洋电话追逼外国经纪交出抛售股票者的名单、价位、交易数量。美国的法例也禁止散播金融谣言和造市，将之列为刑事罪行。“美国重视金融安全，却不准香港特区采取维护金融安全的措施，是何道理？”

媒体还进一步清算说，对冲基金在 90 年代以来，大量流入亚洲，大量贷出短期债务，大量购入亚洲股票，造成了泡沫经济，也迷惑了亚洲的借贷者和投资者，以为市场会一直“繁荣”。格林斯潘说是亚洲借贷者和投资者“失误”、“滥用资本”，又岂是公正和尊重事实因果关系？当对冲基金精心布置好走势陷阱之后，突然大量撤走资金，并向借贷者逼债，令股市、汇市一夜大跌，令银行负债和周转不灵，事后又指亚洲“无法维持收支平衡和如期还债”，责任主次、是非因果，都给颠倒了。这又怎能令人心服？

还有人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所谓援助做法提出了质疑。亚洲由于受狙击而出现了金融危机时，国际货币基金打出“救市”旗号，要求亚洲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由政府担保偿还外国银行的债务，免使美国债权人损失，造成亚洲平民一起损失；关闭银行和企业，提高利率，大举加税，压缩财政支出，加强经济和财政政策透明度，公布数据，结果，更多中小企业倒闭，更多存户血本无归，更多资金撤出亚洲，本来几个月可度过的短期债务风潮，变成了漫漫无期的严重经济衰退和通货收缩危机。这给对冲基金制造了更多的狙击机会，货币贬值浪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亚洲的灾祸更加深重。

“金融恐怖主义”

亚洲舆论还提出要反对“金融恐怖主义”的问题。分析家说，关于亚洲

的金融危机，学界有很多探讨，《时代周刊》《美国商业周刊》等等还以封面故事大幅探讨此事。西方提出的主张包括美国降低利率，以免各国抢购美元避险的趋势反而使全球危机更加扩大，美国作为“最后的市场”，必须扩大繁荣趋势，以带动其他地区脱困；各大工业国应制定新的经济规则，使各国的财政金融更加公开，更增加金融危机的预警能力等等。

但是许多人问：这些措施真的有效吗？当今全球都在痛斥恐怖主义，但为什么不指责当代最大的恐怖主义——“金融恐怖主义”？美国重要经济评论家库特勒最近即指出，大家都在指东指西的宣称亚洲的崩溃是结构出了问题，包括太多的国家干涉，太多的亲信裙带，银行的自有资本不足等。但这些指控疏漏了真正的理由，即是“充满了恶意的、完全不受节制的流动资金”。它携带着超国家的实力排山倒海而来，再健全的体质，再多的外汇储备，都将无法抵挡它的威力。库特勒说：

“绝大多数亚洲经济体都使人既羡又妒，它有高储蓄率，高程度和有纪律的劳动力，高度的生产力增长率。然而，一旦它被全球化的金融投机集团选为打击目标，它即突然地暴露在自己完全无法控制的力量中。热钱涌入，追求超级利润，在一番扰乱而不再有利可图后，它又快速流走，而国际货币基金又与这种投机资金唱和，以货币紧缩来因应困境，向金融市场屈膝的结果，乃是造成全面性的紧缩。”

库特勒指出，由于投机资金的毁灭力量，它必须被遏制及加以管束。“自由经济是商品劳务的自由化，而非投机干涉的自由化”。而现在只有从这一点着手改进，始有可能挽救即将到来的大萧条。若不慎重，世界的紧缩螺旋将造成与大萧条相同的结果。大萧条正在加速酝酿之中，亚洲的紧缩驱动出商品与原料的下跌。从1月迄9月，国际原油已下跌了26%，单单8月10日、11日两天，即跌了7.5%，铝则下跌14.9%，商品的综合指数则下跌35%。

人们都可预估到，恶意投机客，其目的即在于迫使人民币贬值，以瓦解中国内地过去十余年的成果。对于美国纵容投机资金的恶意炒作，包括中国内地及香港均已向美国提出了警告：其未来的外汇存底将移往欧洲，以欧洲货币的方式储存。

两条路线斗争的战场

香港力抗索罗斯，已成为国际社会的重大争论课题，西方媒体以“政府干预股市汇市，有失自由经济原则”而展开抨击，香港本地资本家及在地化的英资集团，则支持这种干预，认为某些人可以假借自由之名而干预他国市场，其他国家为何不能保障自己的自由而展开反干预？“自由市场”并不意谓是“被自由地宰割”。如果一切都能假“自由市场”之名而为所欲为，且不准其他国家自卫，国际经济秩序哪里还有公道可言？

格林斯潘这次算是碰了个不硬不软的钉子。然而其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则涉及极为广泛深刻的层面。借用中国内地过去的术语，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

所谓“两条路线斗争”，至少包括两个方面内容：其一，是否应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的游戏规则？其二，政府干预、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是否与自由经济水火难容？

格林斯潘与港府的争论孰是孰非，可能最终还是要看中长期效果。但是

随着亚洲金融风暴肆虐，国际金融界、经济界的两条路线斗争是激化了。

香港明报集团《亚洲周刊》以感情强烈的语气宣称：自从 1997 年 7 月国际金融投机集团炒翻了亚洲，接着一路延伸，让整个世界都陷于危机之中。香港在这样的时刻奋起迎击，不仅是护卫自己的权益，更有其巨大的指标性意义。香港是在“替全亚洲进行一场前哨战”，是在“替全球所有的金融弱者发言”，走到了保卫战的最前线。“香港金融战线的守军是值得喝彩的！”香港的金融防卫使得国际社会要求金融正义的呼声被推向日程表。《亚洲周刊》重点提出要“以区域性的联防来抵挡国际金融投机集团的杀戮”。

我和格林斯潘俩人可称为“奇异的一对”（语出美国名剧）。

美国总统克林顿

格林斯潘表现超过以往任何一位联储会主席。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莱德曼

克林顿总统在经历过性丑闻之后，支持率仍然奇迹般地高达百分之七十。可是这一百分比在和格林斯潘比，就算不上什么了——根据最近一次的统计，在全国四百多资深高级主管中，对格林斯潘的支持率，是百分之九十七。

《国家观察》杂志一九九八年三月号

经济如同军事，在这个战场上谁也不是，格林斯潘也不是无所不能、无往不胜的神明，但他却是一个高明的统帅，他的判断对的多、错的少，这就很难得了。

克林顿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珍妮特·叶兰

在美国这个有一亿两千五百万以上的投资股票，低失率，几近乎零的通货膨胀率，坚挺的美元，和我们的财富，都立下了大功。

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劳伦斯·库德洛

